

古代中國及歐亞文獻、圖象與 考古資料中的「胡人」外貌

邢義田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摘要】本文對傳統文獻和考古出土資料中有關非華夏之民，尤其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外貌形象作了一次初步比對，企圖找出其表現的特點和異同。主要結論如下：

1. 孔子以「被髮左衽」描述戎狄，並非毫無根據，只是實際的情況應遠為複雜。戎狄以及後來的胡在裝束特徵上和北亞、中亞或西北亞受斯基泰文化影響的游牧民族應有文化上的關係。
2. 從春秋戰國到秦漢，中國儘管曾面對種種裝束和面貌都不相同的外族，但是大約從戰國開始，一種頭戴帽尖微向前彎尖頂帽，身穿窄袖短衣和長褲，高鼻深目的胡人變成中國圖象藝術中胡人外貌的典型。這也使得漢代造型藝術傳統中的「胡人」形象，和由士人掌握的文獻傳統所呈現的有了一定的差距。
3. 更有趣的是，若以出土的游牧民族服飾實物與前述文字與圖象描述的特點對照，則可以看出中國的文字和圖象傳統雖各有所尚，但對異族文化顯露的態度，卻有相當一致的印象化、簡約化、刻板化和頑強持續的特點。

關鍵詞：胡人外貌 斯基泰藝術 尖頂帽 髮型 左衽

一、前言：左衽的孔子像

南宋孝宗淳熙年間(1174-1189)奉使金國的陳益，和寧宗開禧二年(1206)入金國犒北征宋軍的岳珂，不約而同注意到金國廟宇中的塑像一律左衽。《日知錄》卷29「左衽」條云：

宋周必大《二老堂詩話》云：陳益為奉使金國屬官，過滹沱光武廟，見塑像左衽。岳珂《程史》云：至漣水宣聖殿，像左衽。泗水塔院設五百應真像，或塑或刻皆左衽。此制蓋金人為之。迄於國初而未盡除。^①

《日知錄》引錄較為簡略。經查《二老堂詩話》〈光武廟左衽〉條，^②知陳益係南

宋孝宗淳熙間奉使金國使者的屬官，出使後並有詩句云：「早知爲左衽，悔不聽臧宮」。臧宮是東漢光武帝時開國名將，建武27年嘗與馬武上書，力主棄文用武，北擊匈奴。^① 陳益藉臧宮之典，感歎宋人若奮以武力，阻金人南下，則華夏之民不必從金人淪爲左衽。滹沱則是光武入河北起兵發跡之地，故有廟，在今山西繁峙附近。^② 又查《程史》卷14〈開禧北伐〉條，南宋寧宗開禧2年(1206)北伐，岳珂奉命犒軍，至漣水(今江蘇清江市東北)，「城已焚蕩……獨餘軍學宣聖一殿，巋然瓦礫中。余謁宣參，錢溫父廷玉方病臥一門板上，在十哲之傍，視像設皆左衽，相顧浩歎。」^③ 從宣聖殿名及十哲配享可知，此殿乃孔廟之殿。又從「像設皆左衽」可知孔子亦不免於左衽。不獨此也，岳珂到泗州(今洪澤湖南，盱眙附近)，「親至僧伽塔下。……塔院在東廂，無塔而有院，……中爲巖穴，設五百應真像，大小不等，或塑，或刻，皆左其衽。」^④ 五百羅漢像或塑或刻，其衣襟亦皆左衽。

這兩件事發生在南宋不同的時間和地點，兩位官員不約而同爲金國塑像的左衽特點所吸引，爲之作詩、浩歎。佛教出自夷狄，羅漢像衣飾異乎中原，無可厚非；孔子本以左衽喻戎狄，而漢光武本儒生，以復漢家衣冠聞名，女真人竟令孔子、孔門十哲、光武俱衣戎狄之服，誠使講究夷夏之防的南宋士人觸目心驚。陳、岳二人一字不提塑像其餘部分的狀貌，將觀察和記述幾乎全集中於左衽，彷彿這就是所有值得觀察、記錄和感歎的。陳益和岳珂對衣衽的敏感和關注，不能不說是受到自孔子以後，儒家一套特殊夷夏觀薰陶的結果。自孔子說「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論語·憲問》)^⑤，「被髮、左衽」尤其是「左衽」即成爲千百年來華夷論述中最具典範性的用語之一。

① 顧炎武，《原抄本日知錄》(台北：明倫，1970)，頁826-827。

② 周必大，《二老堂詩話》(上海：商務，叢書集成初編，1936)，頁10-11。

③ 《後漢書·臧宮傳》(本文所引二十五史概據中華書局點校本)，頁695-696。

④ 《後漢書·光武帝紀》，更始二年正月條，頁12-13。

⑤ 岳珂，《程史》(北京：中華，1981)，頁163。

⑥ 同上註，〈泗州塔院〉條，頁164-5。

⑦ 《尚書》〈畢命〉有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似左衽一詞首見於此。然〈畢命〉篇一般列入偽古文尚書，成篇時代難定。參屈萬里，《尚書釋義》(台北：中華文化，1968，五版)，頁190。

陳益、岳珂的記述有沒有因用套語而描述失實呢？從其它的文獻和出土實物來看，契丹人建立的遼或女真人所建的金，的確都是以左衽為常服。《遼史·儀衛志》謂遼自太宗「定衣冠之制，北班國制，南班漢制，各從其便焉。」(頁905)《儀衛志》接著分遼代服制為國服、漢服兩大類，其國服類「田獵服」條謂：「皇帝幅巾，環甲戎裝……蕃漢諸司使以上並戎裝，衣皆左衽，黑綠色。」(頁907)契丹本來就是游牧狩獵民族，左衽戎裝的田獵服正是他們原本的民族服式。庫倫二號、六號遼墓壁畫中出獵的男子外著小袖圓領衫，內衣為左衽。^⑧再看金人。宋高宗紹興8年，秦檜主張與金人議和，樞密院編修官胡銓抗疏反對，他在上疏中沉痛地表示：「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污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左衽，朝廷宰執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胡服……」(《宋史·胡銓傳》頁11580)。他的話，初看像是以左衽作為夷狄化的象徵，事實上金人之服也是左衽。寧宗開禧2年，金人陷大散關。12月金人封向金求和之四川宣撫副使吳曦為蜀王。3年，吳曦僭王位於興州。《宋史·叛臣傳》記載他僭位後所做的第一件事是「議行削髮左衽之令。」(頁13813)從吳曦所令可知，金人之服確為左衽。這一點考古實物可以證實。黑龍江阿城巨源金代齊國王墓出土一件男用窄袖醬色織金絹綿長袍，一件駝色絹單男用上衣都是清清楚楚的左衽(圖1)。^⑨

陳、岳二人的話如果信而有徵，孔子說戎狄「被髮左衽」是否也言而有據呢？千百年來，為孔子這句話作注腳的很多，卻似乎從沒有人懷疑它的可靠性。戎、狄種屬不一，其服飾以「被髮左衽」一語概括是否適當？被髮左衽原指戎、狄，後人又用以形容游牧民族為主的胡人，是否符合事實？孔子像陳、岳二人一樣依據親身的觀察？還是襲用當時慣常的語言？或僅僅以「被髮左衽」作為異文化的象徵？

針對這些問題，這篇小文希望作些初步的探討。過去研究胡服的人不少。王國維寫〈胡服考〉，考證自趙武靈王以下，各朝各代的胡服。他利用傳統文

⑧ 參杜承武，〈談契丹小袖圓領衫為左衽——兼談圓領衫的款式變化和衣衽關係〉，收入陳述主編，《遼金史論集》，3輯(北京：書目文獻，1987)，頁203-212。本條資料承洪金富兄示知，謹謝。

⑨ 徐秉昆、孫守道編，《東北文化》(香港：商務，1996)，圖268。原出土報告見黑龍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龍江阿城巨源金代齊國王墓發掘簡報〉，《文物》，1989年10期，頁1-10、45及圖版2、3。本條資料承徐蘋芳先生示知，謹謝。

獻，考證惠文冠、具帶、華履、上褶下袴等，完全未提髮式和衣衽之左右，也未說明趙武靈王採胡服，是否曾變右衽為左衽。^⑩江上波夫以研究騎馬游牧民族著稱，曾論及匈奴和歐亞內陸其它游牧民裝束上的共通處，他們都左衽、辮髮，惜未更加深入。^⑪林巳奈夫〈春秋戰國時代の金人と玉人〉一文利用大量商周以降的考古材料，討論古代的服飾，對被髮左衽也僅點到為止。^⑫沈從文在《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中，利用和林巳奈夫大致相同的材料，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春秋戰國以來，儒家提倡宣傳的古禮制抬頭，寬衣博帶成為上層階級不勞而獲過寄食生活的男女尊貴象徵。上層社會就和小袖短衣逐漸隔離疏遠，加上短靴和帶鉤，一併被認為是游牧族特有的式樣了。事實上所謂胡服，有可能還是商周勞工人民及戰士一般衣著。由於出土材料日益增多，『胡服騎射』一語，或許重點應在比較大規模的騎兵應用，影響大而具體。」(頁16)沈先生沒有細論孔子所說的被髮左衽，不過推測所謂的胡服，可能原本是商周「勞工人民及戰士」的一般衣著。目前除了商周的甲冑，一般勞動人民的衣飾還很缺乏實物

⑩ 王國維，〈觀堂集林〉，《王觀堂先生全集》(台北：文華，1968)，卷22，頁1051-1095。町田章曾指出王國維未討論左衽的問題，參町田章，〈胡服東漸〉，《奈良國立文化財研究所創立40周年記念論文集》(京都：同朋舍，1995)，頁839。町田文提到《史記·趙世家》有一段預言式的傳奇故事，預言有一位「脩下而馮[上]，左衽界(介)乘」的「伉王」，也就是後來的武靈王會「奄有河宗，至于休溷諸貉」。這似乎意味著武靈王的胡服為左衽。可是武靈王在說服王公大臣接受胡服的議論裡，曾說：「夫翦髮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黑齒雕題，卻冠絺紬，大吳之國也，故禮服莫同，其便一也」。他明確以左衽為南方甌越之民的服裝特點，並沒有提到他所採的胡服是否也是如此。武靈王既要採胡服，不可能不知胡服是左或右衽。從上下文意看，胡服似應有不同於甌越之服的特色，才能呼應他「禮服莫同，其便一也」的論旨。因此，他所採的胡服是否為左衽仍不無疑問。

⑪ 江上波夫，張承志譯，《騎馬民族國家》(北京：光明日報，1988)，頁41；俄羅斯學者 V. I. Sarianidi 在其《阿富汗：無名國王的秘寶》(*Afghanistan: The Secret Treasures of the Unknown Kings*) (Moscow: 1983) 一書中曾提到左衽式的衣服是從斯基泰世界的東緣到阿爾泰地區最普遍的形式，參見加藤九祚日譯本，《シルクロードの黄金遺寶——シバルガン王墓發掘記》(東京：岩波，1988)，頁110。又參李國棟，〈兩漢時期匈奴服飾文化初探〉，《西北大學學報》，1993年4期，頁117-122。李文於衣衽左右僅簡略提到匈奴為左衽，並未深論。

⑫ 收入林巳奈夫編，《戰國時代出土文物の研究》(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85)，頁1-145。

或圖象資料去證實。他和林巳奈夫一樣，並沒有徵引中國以外的材料。周錫保著《中國古代服飾史》，書中指出「左衽是胡人衣式的特點」^⑬，並引用山西侯馬出土的人像陶範，以為武靈王採胡服「諒即取此式」。^⑭可是從武靈王以後的出土衣物或圖像來看，採胡服似乎並沒有改變華夏右衽的傳統。

本文的旨趣不完全在於胡服本身，而是打算比對文獻、圖象資料和考古出土的服飾等實物，看看從商周到漢代，中國人為戎狄或胡人塑造了怎樣的形象，這些形象和實際有何差距。文獻強調被髮、左衽，圖像中是否也是如此？如有異同，理由何在？其背景淵源又如何？中國人所模塑的「胡人」形象和胡人實際的外貌服飾或胡人自我展現的形象有無差距？差距何在？彼此可能有怎樣的關係？這一連串問題的解答，不僅有助於認識古代華夏與周邊民族的文化交流，也有助於我們去認識古代中國人如何建構自我認同，如何去塑造所謂的「華夏的邊緣」。^⑮

本文所謂的形象是以外在的服飾和容貌為限，並不涉及諸如性情等內在的品質。這個時期曾與華夏有過交涉的周邊民族甚多，本文暫以與華夏關係最密，生存競爭最烈的北方及西北方游牧民族以及較早的戎狄為對象。即使如此，問題仍十分複雜，目前能掌握的材料相當有限，其中不少富於爭議性。因此，以下的討論不過是一個初步的試探，旨在拋磚引玉而已。

二、中國古代文獻中「戎狄」、「胡人」的外貌

春秋戰國以來，以華夏自居的中國人即有不少區別「華夏」與「夷狄」的描述。這些描述多從飲食、衣服裝束、居住方式、生業、言語或是否知「禮義」著眼。^⑯以衣著裝束區別華夷，最為人所知，影響也最大的應即孔子（西元前

⑬ 周錫保，《中國古代服飾史》（台北：南天，1989），頁68。

⑭ 同上註，頁72，圖五說明。

⑮ 參王明珂，《華夏的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台北：允晨文化，1997）。

⑯ 以服飾、飲食、語言區分者如《左傳》襄公14年；以服飾、飲食、居住方式區分者如《禮記·王制》；以禮義、詩書、德行區分者如《戰國策》魏策三、趙策三；一個較全面可總結古人對華夷之別意見的見《漢書·匈奴傳》贊：「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隨畜，射獵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絕外內也」。

551-479年)。在夷狄交侵的春秋時代，管仲助齊桓公內合諸侯，外禦戎狄，孔子讚美他：「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被髮是指頭髮披散而下，諸夏貴族的成年男子一般束髮戴冠。^⑪左衽是指胸前兩片衣襟交叉，其中外側的一片由右肩向左腋斜下；諸夏右衽之制則方向正相反，由左肩向右腋斜下。^⑫姑不論諸夏與戎狄的裝束是否還有其它的不同，孔子特舉「被髮」和「左衽」，意味著髮式和衣襟的左右，在他看來似乎最足以標示當時華夏和戎狄在服飾外觀上的差異。

孔子以「被髮、左衽」比喻戎狄，似非偶然。早在周平王東遷之初，辛有到伊川，見有人「被髮而祭於野者」，就說：「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左傳》僖公22年，西元前638年)可見周人已視被髮為戎人裝束的重要特徵。辛有見微知著，見伊川之人被髮祭於野，失周禮用戎俗，因而預測其地不過百年就會變成戎人之地。魯襄公14年(西元前559年)，諸戎的戎子駒支對晉國的范宣子說：「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⑬。如果這確是戎子的話，意味著西元前七、六世紀之間，不論華夏之人或戎

⑪ 被髮即披髮或散髮，參《韓詩外傳》：「(趙)簡子披髮杖矛而見我君」，《太平御覽》卷436引《韓詩外傳》作「被髮」。又《莊子·漁父》：「有漁父者…被髮揄袂…」，成玄英疏：「散髮無冠，野人之貌。」還有將被髮釋為剪髮者。《淮南子·原道》：「九疑之南…民人被髮文身」，高誘注：「被，翦也。」王引之曾辨其非，參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卷1注引王引之說及劉之補證，又見王念孫，《讀書雜誌》，九之一，〈淮南子·內篇第一〉(台北：廣文，1963)，「被髮文身」條，頁767。唯陳奇猷釋《韓非子·說林上》「越人被髮」謂「被」，《說苑》作剪。案越人剪短其髮而被之，故古書或云越人被髮，或云越人剪髮，其義一也。」見《韓非子集釋》(台北：河洛圖書，1974年景印再版)，頁441。按《說苑》〈善說〉篇作「翦」，〈奉使〉篇作「剪」，《太平御覽》437又464引作「翦」。是漢代人確有以越人被髮為剪髮者。陳奇猷之說應可通。不過，以本文關注的北方草原民族而言，被髮應指長髮披散而下，而非剪髮。

⑫ 顧頤剛先生曾有一說以為左衽之衽有襟義，亦有袖義。據其所見蒙藏諸區人民雖衣有兩袖，但為工作便利，僅穿左臂，「故知『左衽』云者，謂惟左臂穿入袖中耳，其襟固仍在右也。」參《史林雜識初編》(北京：中華，1963)，「被髮、左衽」條，頁150-152。其說童書業先生早已修書質疑，見顧書此條。如自考古材料審視，西元三世紀以前似沒有資料可證顧說。考古資料反而證實「衽」指衣襟之舊說。其詳請見下文。

⑬ 《左傳》，襄公14年。

人都十分清楚彼此在飲食、衣服、言語上的差異，因而戎子駒支並沒有必要進一步說明到底有何不同。從這些先例可知，孔子以髮式、衣襟區別戎狄華夏，在當時或許不是什麼新鮮的提法。

孔子以被髮、左衽形容戎狄，除了可能是依循當時的語言習慣，是否也有可能是出自親身的觀察？齊桓、晉文相繼攘夷，戎狄在孔子之世卻仍然存在。前引戎子駒支的談話發生在孔子出生前八年。魯昭公元年（西元前541年），晉中行穆子敗無終（杜預注：無終山戎）及群狄于太原。這是孔子十歲左右的事。^{②①}《新序·雜事五》則記載孔子曾北之山戎氏，遇婦人哭之甚哀，引發他苛政猛於虎的感歎。此事亦見於《禮記·檀弓》。〈檀弓〉記此事發生的地點在泰山。呂思勉、史念海因而推定這些山戎或在今山東泰山。^{②②}姑不論此事是否可信，孔子一生周遊列國，在魯國之外也不無機會目睹戎狄之人。那麼「被髮左衽」不無可能是他依據親身觀察而作的事實陳述。問題是：齊桓公所征伐者不限山戎。春秋時代的山戎、北戎、西戎、赤狄、白狄、盧戎、驪戎、犬戎、伊雒、陸渾之戎、東山皋落氏等等，種落不一，互不統屬。他們是否都被髮、左衽呢？他們與華夏服飾之別是否僅在於衣衽和髮式？孔子所說的被髮左衽，到底有幾分是寫實？能否找到圖象或實物證據？這些應該是有趣，值得進一步探索的問題。

更有趣的是，從孔子的春秋時代到戰國之世，華夏諸邦所面對的異族已頗有不同。戰國之世戎狄逐漸消失，游牧騎射的胡人代之而起。深受東胡威脅的趙武靈王（西元前325-299年）爲了便於騎射，甚至下令改採胡服。孔子「被髮左衽」一語原本針對桓公曾征討的戎、狄而說，戰國以降的文獻不但用此語形容游牧民族，更擴大應用在中國周邊其它民族的身上，使「被髮」、「左衽」加

^{②①}《左傳》，昭公元年。

^{②②} 呂思勉，《呂思勉讀史札記》（上海：上海古籍，1982），〈山戎考〉條，頁180；史念海，〈西周與春秋時期華族與非華族的雜居及其地理分布（上篇）〉，《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輯（西安：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編輯部，1990），頁22-23。按《新序·雜事》「孔子北之山戎氏」，《禮記·檀弓下》作「孔子過泰山側」，《論衡》，〈遭虎〉、〈定賢〉謂「孔子行魯林中」、「魯林中婦哭」，呂、史因而以爲山戎當在魯或泰山。一般通說以爲山戎在今河北東北境，非在山東，參陳槃，《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誤異》（台北：史語所專刊，民國77年三版），頁505上下。

上「椎髻」、「文身」等少數語彙，愈來愈像一種加貼在非華夏民族身上，既方便又籠統的標籤：

《戰國策·趙策二》：「被髮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

《韓非子·說林上》：「越人被髮」。

《禮記·王制》說東方的夷和西方的戎都「被髮」。

《淮南子·原道》：「九疑之南……民人被髮文身」。

《說苑·善說》林既見齊景公，說：「西戎左衽而椎結」。

揚雄《蜀王本紀》曰：「蜀之先稱王者有蠶叢、折權、魚易、俚明。是時椎髻左衽，不曉文字」(《太平御覽》卷 166 引)。

《後漢書·西羌傳》東漢班彪上書謂：「羌胡被髮左衽」。

《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傳》謂西南夷「其人皆椎髻左衽」，苻都夷「被髮左衽」。

《後漢書·西域傳》移支國：「其人勇猛敢戰，以寇鈔爲事，皆被髮，隨畜逐水草」。

這些文獻對不同的外族還有飲食、生業、婚姻、社會政治組織、性情等各方面的描述，但在服飾外貌的描寫上往往偏重衣襟或髮式。

值得注意的是《史記》、《漢書》都沒有以「被髮」和「左衽」形容匈奴。匈奴、烏桓、羌和鮮卑等威脅漢帝國如此之鉅，接觸如此之多，《史記》等四史僅十分簡略地描寫他們的服飾外貌。以匈奴而言，《史記·匈奴列傳》僅說匈奴「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完全不提他們的外貌長像。《漢書·匈奴傳》照抄《史記》，未增易一字。^②《三國志》無匈奴傳。《後漢書·南匈奴傳》雖言及「匈奴俗」，也一字不提他們的服飾外貌。《漢書·李陵傳》提供一些零星的消息。漢使任立政往匈奴見李陵、衛律，「後陵、律持牛酒勞漢使，博飲。兩人皆胡服椎結。立政大言……動之，陵墨不應，孰視而自循其髮，答曰：『吾已胡服矣。』」兩人所謂的胡服與椎結應當就是匈奴的裝束。這裡沒有說明胡服的樣式，但知匈奴的髮式之一應爲椎結或椎髻。

關於烏桓、鮮卑的外貌，較早的記載見於《三國志》裴注引王沈《魏書》，其後的《後漢書》基本照抄。王沈《魏書》謂烏丸「食肉飲酪，以毛毳爲衣…

②《漢書·匈奴傳》提到武帝時漢使者王烏使匈奴，「匈奴法：漢使不去節，不以墨黥其面，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入廬，單于愛之。」這似乎意味著匈奴有黥面之俗，但也有可能黥面僅是針對漢使而設。目前尚難斷定。

父子男女，相對蹲踞，悉髡頭以爲輕便。婦人至嫁時乃養髮，分爲髻，著句決」(頁832)，鮮卑與烏桓(或烏丸)同屬東胡族，「其言語、習俗與烏丸同。」一個差異在鮮卑「嫁女娶婦，髡頭飲宴」，婦人至嫁時並不養髮(頁836)。這裡說鮮卑髡頭，也就是說剔去頭髮，但據《晉書·載記》禿髮利鹿孤條，東晉時鮮卑人鑰勿嵩卻說其先君起自幽朔，「被髮左衽」。他的話從下文將談到的和林格爾東漢護烏桓校尉墓中的壁畫看，知其借用套語的成分應多於寫實。至於西羌，《後漢書·西羌傳》謂其祖爰劍遇剽女於野，遂成夫婦。女恥其狀，被髮覆面，「羌人因以爲俗」(頁2875)。同書班彪上書則說「羌胡被髮左衽」(頁2878)。

總體而言，中國傳統史籍掌握在士人之手，對異族服飾外貌的描述基本上反映了士人官僚階層對外族的態度。他們只略述外族的頭髮和衣飾，幾乎完全不提匈奴、羌、烏桓、鮮卑等的體質容貌特徵。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

第一，這些外族在體質特徵上可能和蒙古種的中國人並沒有值得一提的差別。如果有，史官不會完全無動於衷。例如《漢書·西域傳》大宛國條即說「自宛以西至安息國…其人皆深目，多須頤…」(頁3896)。更明顯的一個例子見北齊魏收所寫的《魏書·西域傳》于闐國條：「自高昌以西，諸國人等深目高鼻。唯此一國，貌不甚胡，頗類華夏」(頁2263)。他以「深目高鼻」作爲胡貌的特徵，而以華夏容貌作爲相對照的另一種類型。由此可知，相對於大宛以西的胡人，以東的匈奴、鮮卑、烏桓和羌等雖也被稱爲胡，應並不具備深目高鼻，多鬚鬚的面貌特徵，而且面貌上應像于闐一樣「頗類華夏」。中國的史官因而也就不覺得有必要去記述他們的面貌。

另一個原因是傳統士人深受孔子「被髮左衽」一語的影響，將注意力集中在髮式和衣式等較具文化意義的特徵上，而較不注意體質上的特徵。被髮左衽之語雖甚簡略，對後世士人卻是經典性權威。漢代士人議論，每以「左衽」、「左衽之虜」或「被髮左衽」象徵非華夏之民或文化。或許因爲中國人在某些情況下也常被髮，「左衽」一詞用得遠較「被髮」爲多。²³ 例如東漢時，王充謂：

²³ 被髮一詞較少單獨用來指稱或象徵非華夏之民，因爲古代中國人一般平民也常被髮，如上引《莊子·漁父》中之漁父「被髮揄袂」。在許多情況下中國人也被髮，如想像中治世之民被髮，見《淮南子·本經》、《春秋繁露·王道》；狂人、高士、獨行之士或被髮，如箕子、屈原、《後漢書·獨行傳》中之雷義、向栩；行某些養生之道時須被髮，見《黃帝內經·素問·四氣調神大論第二》；童子被髮(《史記·日者列傳》司馬季主曰)，漢畫像中常見之七

「蘇武入匈奴，終不左衽；趙他入南越，箕踞椎髻。」^{②4}大將耿秉說：「匈奴援引弓之類，并左衽之屬。」^{②5}西羌反，邊章、韓遂作亂，朝臣議棄涼州，傅燮反對曰：「若使左衽之虜得居此地…此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②6}《華陽國志·巴志》：「羌復入漢，牧守遑遑，賴板楯破之。若微板楯，則蜀、漢之民爲左衽矣。」^{②7}從表面看，似乎匈奴、西羌都是左衽，南越即箕踞椎髻。事實上，這些深受儒家薰陶的作者在下筆之時，有很大成分是在套用成說。前引〈巴志〉的一段話「若微板楯，則蜀、漢之民爲左衽矣」完全套用孔子「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的句式，即爲明證。

他們利用這些語詞主要是取其文化象徵的意義。我們再舉《漢書·終軍傳》爲例。武帝時獲白麟、奇木等瑞物，終軍因而上對，曰：「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斯拱而俟之耳。」(頁2817)這裡的編髮、左衽並未指涉任何特定的外族。終軍用之與中國的冠帶、衣裳相對，無疑以其爲異族文化的象徵。杜篤〈論都賦〉謂：「若夫文身鼻飲緩耳之主，椎結左衽鑄錫之君，東南殊俗不羈之國，西北絕域難制之鄰，靡不重譯納貢，請爲藩臣。」^{②8}杜篤將文身、鼻飲、緩耳、椎結、左衽、鑄錫依文體的需要串聯在一起，也無非取外族異域殊俗的象徵意義。這樣象徵性的用法意味著他們不過是以傳統上既方便又富威權的語詞，表達一些既定的概念和印象。他們和他們的讀者似乎並不那麼在意這些語詞和事實是否存在著差距。

從而我們不難設想，一個更根本的原因，可能在於深具文化優越感的中國士人對異文化缺乏真正的興趣和好奇。中國古代的士人官僚雖和周邊民族有不少接觸和第一手觀察的機會，例如趙充國、李廣、李陵、班超等著名的將軍、

歲項託；施法術時須被髮，如息夫躬(《漢書·息夫躬傳》)、解奴辜(《後漢書·方術傳》)，又見《後漢書·光武帝紀》注引魏文帝《列異傳》秦文公伐樹故事。又古人夢中所見鬼神常爲被髮，如《左傳》成公10年「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莊子·外物》宋元君夢人被髮闕阿門，占之乃神龜等不一而足。

②4 黃暉，《論衡校釋》，〈譴告〉(北京：中華，1990)，頁642。

②5 周天游，《後漢紀校注》(天津：天津古籍，1987)，卷10，頁278。

②6 《後漢書·傅燮傳》，頁1876。

②7 任乃強，《華陽國志校補圖注》(上海：上海古籍，1987)，頁24。

②8 《後漢書·文苑傳》，杜篤條，頁2607。

邊郡太守以及張騫等數不清曾出使異邦的使者。他們對所接觸的外族必知之甚明，甚至有詳細的紀錄或報告。張騫即是如此。但是令人驚異的是《漢書·藝文志》收錄天下圖籍一萬三千餘卷，其中除雜賦〈雜四夷及兵賦〉二十篇在篇名中提到四夷，其餘從篇名上看不出有任何篇卷和當時的異國鄰邦相關！當時對「四夷」的風俗文化即使曾有不少著述，然而在史官的剪裁下，幾乎刪汰略盡。史官能如此刪汰或抄襲前代史書中對外族風俗文化既有的描述，反映的不只是史官的慣性和惰性，更反映了作為主要讀者群的整個官僚體對異族風俗文化的漠視與興趣缺缺。關於這一點，如果我們稍稍對照一下古希臘民族誌(logography)的傳統，以及如希羅多德(Herodotus)《波希戰爭史》中對希臘周邊的埃及、波斯、斯基泰等民族長篇累牘、鉅細靡遺的記述，^{②9}羅馬時代凱撒(Julius Caesar)《高盧戰記》對高盧、日耳曼人，塔奇土斯(Tacitus)、《日耳曼民族誌》對日耳曼民族的記錄，^{③0}中國士人官僚對外族文化的冷漠與缺乏好奇就更為明顯了。

三、漢代圖象資料中的胡人外貌

春秋以前，中國古代文獻主要是以戎、夷、蠻、狄稱述非華夏的民族，戰國以後，新名稱——「胡」逐漸取而代之。^{③1}從戎夷蠻狄到胡的出現，到底意味著什麼變化？仍然是一個至今未解的謎。一般相信一個主要的變化是大約在西元前八、七到三世紀間，華夏西北及北方的一些民族或部落（不論白種或黃種），

^{②9} 有關希臘民族誌的傳統可參 L. Pearson, *Early Ionian Historian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39), A. Momigliano, "History and Biography" in M. I. Finley ed., *The Legacy of Greece --- A New Appraisal* (Oxford: Clarendon Pres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A. Momigliano 在其文中曾深論希臘人對周邊民族風土文化的興趣以及民族誌傳統對希羅多德的影響。此文中譯見邢義田譯，〈歷史與傳記——古代希臘史學新估〉，《史學評論》，7期(1984)，頁1-46，收入邢義田編譯，《西洋古代史參考資料》，1冊(台北：聯經，1987)，頁87-134。

^{③0} 羅馬人記述異民族風土文化雖有抄襲的情形，一般而言比中國傳統正史的記錄要廣泛詳細得多，甚至正面肯定異族文化的優越之處，塔奇土斯的《日耳曼民族誌》就是最佳例證。

^{③1} 關於「胡」的含義，可參呂思勉，〈胡考〉，見林幹編，《匈奴史論文選集(1919-1979)》(北京：中華，1983)，頁37-53，或呂思勉，同註^{②1}，頁1177-1194；饒宗頤，〈上代塞種史若干問題〉，《中國文化》，8期(1993)，頁165-170。

從狩獵或亦農亦牧，轉而採取了以騎射游牧爲主的生活方式。^{③②}這樣的民族或部落依中國文獻的記載主要有東胡、樓煩、林胡、義渠、月氏和匈奴等(《史記·匈奴傳》)。他們在人種上和華夏諸邦是否相同，至今仍多爭議。一般相信游牧民的血統十分複雜，華北匈奴的人種成分和華夏諸邦較爲接近，同屬面形較扁平的黃色蒙古種，而月氏則較可能屬於深目高鼻多鬚，白色的高加索種或塞種。^{③③}戰國時期的北方諸國以及秦、漢王朝和這些民族有頗爲頻繁的接觸，對他們的真實面貌和裝束必然有第一手的觀察和認識。

以當時的繪畫或雕塑技巧來說，如果要爲「胡人」留下較爲寫實的形貌，應不是問題。《韓非子·外儲說左上》有一個畫工答齊王，認爲畫鬼最易，畫犬馬最難的故事。犬馬難畫是因爲「犬馬人所知也，旦暮罄於前，不可類之」。這個故事意味著當時相當注意「類之」，也就是像不像的問題。犬馬的樣子大家都熟悉，不能隨意描畫。鬼的樣子沒有人真正見過，沒有像不像的問題，因此最容易畫。此外，《國語·越語下》提到：「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

③② 較新的研究參王明珂，〈鄂爾多斯及其鄰近地區專化游牧業的起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5卷2期(1994)，頁375-434。

③③ 關於中國北方匈奴的人種分析，較可靠的研究仍屬潘其風和韓康信對內蒙古桃紅巴拉古墓、青海大通匈奴墓、內蒙古烏蘭察布盟東南涼城毛慶溝墓葬群人骨的分析以及與貝加爾湖地區人骨材料的對照。據他們研究所得，從西元前三世紀到西元後二世紀，匈奴人種成分雖然複雜，體質類型基本上與蒙古人種的北亞型較接近。參潘其風、韓康信，〈內蒙古桃紅巴拉古墓和青海大通匈奴墓人骨的研究〉，《考古》，1984年4期，頁367-375；潘其風，〈毛慶溝墓葬人骨的研究〉，見田廣金、郭素新編，《鄂爾多斯式青銅器》(北京：文物，1986)，頁316-327。關於月氏及匈奴人種又可參戴春陽，〈月氏文化族屬、族源芻議〉，《西北史地》，1991年1期，頁12-20；韓康信，〈新疆古代居民的種族人類學研究和維吾爾族的體質特點〉，《西域研究》，1991年2期，頁1-13；〈塞、烏孫、匈奴和突厥之種族人類學特徵〉，《西域研究》，1992年2期，頁3-23；〈新疆古代居民的種族人類學研究〉，《十世紀前的絲綢之路和東西文化交流》(北京：新世界，1996)，頁335-350；余太山，《塞種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1992)，頁63-64；陳健文，〈試論月氏考古的相關問題〉，《中國上古秦漢史學會通訊》，4期(1998)，頁41-55。關於匈奴人種幾類較早期的爭論可參《匈奴史論文選集(1919-1979)》，同註③①；較晚近的意見可參烏恩，〈匈奴族源初探〉，《周秦文化研究》(西安：陝西人民，1998)，頁832-841。

禮之」，韋昭注：「以善金鑄其形狀」；《戰國策·燕策二》提到一個木人像的故事：「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為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云云。錢鍾書指出「寫范蠡之狀」、「以寫寡人」的「寫」字，都是「傳移、模寫」，「移於彼而不異於此之謂」^{③④}，由此或可推想戰國工匠已能以木、金相當真實地去模寫人像。《說苑》佚文中有一則畫工敬君圖畫妻像的故事。敬君為齊王畫九重之臺，去家日久，其妻貌美，思念之，遂畫其像。齊王聞之，以錢百萬求其妻。^{③⑤}《太平廣記》卷210引作：「君久不得歸，思其妻，畫真以對之。齊王因睹其美，賜金百萬，遂納其妻。」^{③⑥}這是戰國畫工以壁畫「畫真」的例子。雕塑則有秦始皇陵兵馬俑坑出土上千的人俑。這些陶俑的臉孔各異，頗為寫實，具體證明了這個時代寫實的技巧。^{③⑦}

^{③④} 錢鍾書，《管錐編》，1冊（台北：蘭馨室書齋翻印本，無年月），頁254。

^{③⑤} 向宗魯，《說苑校證》（北京：中華，1987），頁536。

^{③⑥} 同上註，頁536。

^{③⑦} 有學者以「寫實主義的佳作」形容兵馬俑的特色，見王學理，《秦俑專題研究》（西安：三秦，1994），頁424-430；王玉清甚至認為秦俑曾以真人為模特兒。他曾仔細區分秦俑面形的三種情況：有部分相同，是模製的；也有五官基本相同，面部輪廓不同的以及面形不同的，其中以面形不同的佔多數。參王玉清，〈秦俑面形和表情〉，收入袁仲一、張占民編，《秦俑研究文集》（西安：陝西人民美術，1990），頁174；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編，《秦俑學研究》，藝術編（西安：陝西人民教育，1996）。西方學者如畢華雪 Michèle Pirazzoli-T'serstevens 也以寫實主義 (realism) 形容秦俑和馬王堆西漢初墓出土帛畫上的人物。不過她認為秦俑在寫實中帶有理想的成分，而馬王堆帛畫上的老太太則不能不令人重新評價中國古代畫工寫真的能力。參 Michele Pirazzoli-T'serstevens, *The Han Dynasty*, trans. by J. Seligman (N.Y.: Rizzoli, 1982), pp. 18, 212-213, 216-218. 楊泓以戰國帛畫為例，認為中國自戰國對人物的形貌已力求寫實，寫實的技巧達到了一定的水平。參楊泓，〈戰國繪畫初探〉，《文物》，1989年10期，頁53-59, 36。又參 Mary H. Fong, "The Origin of Chinese Pictori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Human Figure," *Artibus Asiae*, vol. XLIX, 1/2 (1988/1989), pp. 5-38. Dietrich Seckel 認為中國真實表現人物個性的肖像畫要到唐代才出現，不過他也同意早在西元前六至四、三世紀，合乎自然比例的人物描寫已經開始，儘管這樣描繪的不是特定的個人。參所著 "The Rise of Portraiture in Chinese Art," *Artibus Asiae*, vol. LIII, 1/2 (1993), pp. 7-21. ; Ladislav Kesner 則檢討了中外學者對秦俑是否寫實的正反意見以及「寫實」的定義，參所著 "Likeness of No One: (Re)presenting the First Emperor's Army," *The Art Bulletin*, vol. LXXVII, no. 1 (1995), pp. 115-132.

到了漢代，司馬遷曾親見張良的畫像「狀貌如婦人好女」(《史記·留侯世家》太史公曰)。張良這樣的開國功臣，外貌居然像婦人，出乎一般人的想像之外。因此，司馬遷才特別提到自己觀看畫像的印象。這幅畫像顯然相當寫實，能表現出張良的狀貌特質。景帝陽陵出土的上千陶俑，雖不及秦陵者龐大，面貌卻也栩栩如生。^{③⑧}《西京雜記》卷2說漢元帝時，畫工毛延壽「爲人形，醜、好、老、少，必得其真。」他爲王昭君畫像的故事不論是否可靠，基本上可以證明，能否「得其真」曾是漢代評價畫工的一個標準，而當時也顯然有過能「必得其真」的畫工。

我們這裡所謂的寫實並不意指「必得其真」或表現個性的肖像畫，而是指有據實描繪的意圖和能力，可以相當明確地呈現某一民族容貌和服飾的一般特色。那麼，漢代畫工是否曾爲胡人留下寫實的外貌呢？答案是否定的。除了極少數例外，絕大多數的漢代畫工似乎並無意以他們的技巧，描繪出匈奴、烏孫、氐、越、羌、烏桓或鮮卑等的真實形貌，或展現這些民族在容貌服飾上可能有的差別。他們反而比較可能是依循職業中的傳統，世代相傳，不斷翻版著一種籠統化、模式化了的印象中的胡人。^{③⑨}這種情形和自《史記》、《漢書》以後文獻中對四夷風俗、性情、外貌的記述有模式化和抄襲的傾向，其實是相當一致的。

此外，我們也必須強調，即使從先秦到漢代的畫工有寫實的能力，在漢代的壁畫和石刻中，事實上可以說得上寫實的作品並不多。^{④⑩}不論胡、漢，人物形貌衣飾都有格套化、當代化(先漢人物的衣飾外觀與漢代人無別)或者說定型化的傾向。因此，就某個意義上說，漢畫中胡人形象的模式化只是整個時代造型藝術風格特色的一環罷了。

1. 胡人形象典型的辨識

以下先來辨識一下漢代圖象藝術中胡人造型的特徵。^{④⑪}要確定那些人

^{③⑧}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漢陵考古隊編，《中國漢陽陵彩俑》(西安：陝西旅遊，1992)。

^{③⑨} 關於古代工匠世傳其業的情形參邢義田，〈從戰國至西漢的族居、族葬、世業論中國古代宗族社會的延續〉，《新史學》，6卷2期(1995)，頁1-44。漢代石工的情形參邢義田，〈漢碑、漢畫和石工的關係〉，《故宮文物月刊》，14卷4期(1996)，頁44-59。

^{④⑩} 例如河北安平壁畫墓中的墓主像是否稱得上肖像寫實，值得注意。

謂的「胡」，可以借助漢代畫像石的榜題。可靠的參考品有兩件：一是山東孝堂山石祠畫象中的胡漢交戰圖，二是山東微山出土的一件「胡將軍」畫像。孝堂山石祠是現存最早的一座漢代祠堂。依據題記，應建於東漢順帝(西元126-144年)以前。在其西壁，有一幅規模頗大的胡漢交戰圖(圖2)。交戰圖東端，在一位憑几而坐人物的背後有「胡王」二字榜題。過去僅有拓片刊佈，蔣英炬先生曾發表榜題摹本，^{④①}但從不見原石照片。1998年8月到孝堂山，有幸攝下榜題的清楚照片(圖3)，不但可以證明「胡王」二字無誤，而且可知二字明確為原刻。這位側面，憑几而坐的胡王，在外貌上最大的特徵是戴著一頂向前微彎的尖頂帽，帽後有飄帶，下巴有鬚鬚。其身前身後共有二十餘戴著同樣尖帽(但無飄帶)的胡兵，他們或站立，或騎在馬上，身上穿著短衣，腰束帶，下穿長褲。「胡王」二字明確告訴觀賞者，這樣裝扮的人就是胡。

另一件「胡將軍」畫像，曾經刊佈於《山東漢畫像石選集》(圖13)，可惜圖版中的榜題幾乎完全無法辨識。1998年9月到微山，承當地文管所楊建東先生厚意，得見原石。不但見到清晰完整的「胡將軍」三字榜題，而且得知《選集》所錄拓影不全，〈山東微山縣漢代畫像石調查報告〉、《微山縣漢畫像石精選》則曾刊佈較完整但模糊的拓片(圖4)。^{④②}依據殘石拓本，可知這也是一幅胡漢交戰圖。畫像中的將軍騎在馬上，頭旁右側有「胡將軍」榜題三字。他裝扮上的特徵也是一頂帽尖前彎的尖頂帽。在其前後則有戴著同式尖帽，或騎或步的兵卒。前方行進中的一位兵卒明顯穿著長褲。

另一件可供參考的資料是山東蒼山元嘉元年畫像石墓中，那篇有關畫象內

④① 可參杉原たく哉，〈漢代畫像石に見られる胡人の諸相——胡漢交戰圖を中心に——〉，《早稻田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文學藝術編)紀要別冊》，14集(1987)，頁219-235；高現印，〈淺論南陽漢畫中「胡人」特徵及相關問題〉，《漢代畫像石研究》(中原文物1996年增刊)，頁316-321；Zheng Yan, "Barbarian Images in Han Period Art," *Orientalism*, June 1998, pp.50-59；中文增修版見鄭岩，〈漢代藝術中的胡人圖像〉，《藝術史研究》，1期(1999)，頁133-150。

④② 蔣英炬，〈孝堂山石祠管見〉，《漢代畫像石研究》(北京：文物，1987)，頁215。

④③ 《微山縣漢畫像石精選》(中原出版社，1994)，圖3。參觀時攝影有所失誤，遺憾未能附上原石圖影。原調查報告見王思禮、賴非、丁沖、萬良，〈山東微山縣漢代畫像石調查報告〉，《考古》，1989年8期，頁699-709。

容的題記，以及相對應的胡人騎射畫像。題記提到「前有功曹後主簿，亭長騎佐胡使弩」。畫像中正有一車馬過橋圖，其左端有一騎馬回首使弩的胡人，高鼻深目，頭戴尖帽(圖5)。^{④④}由於出土畫像中只見到這樣一位裝扮的人物，他應該就是題記中所說使弩的胡。從以上三件人物裝扮上的共同特徵可以證明，他們應是漢畫象中典型的胡人。

其典型性可以從其它漢代圖象資料中大量同類裝束人物的存在得到證明。這樣的圖象資料，在山東、河南、江蘇可以找到一、二十例。以下只舉幾件為代表：

1) 河南洛陽金村出土模印畫象磚射鹿圖(圖6)。^{④⑤}在略呈三角形的磚面上模印著二、三位騎士，騎在奔馳的馬上，張弓瞄向正拚命逃走的鹿群。這些同模所製的騎士，頭戴帽尖前彎的尖頂帽，上身穿窄袖短衣，腰束帶，下身穿長褲。還可注意的是這位騎士的衣衽是清楚的左衽，表明他是漢人眼中的胡人。

2) 河南南陽出土畫像磚胡人圖(圖7)。^{④⑥}畫面中僅有一位立姿的胡人。頭戴一頂帽尖前彎的尖頂帽，兩手前伸，手中似握有一袋物品，身穿長衣。比較值得注意的是他的面貌。製模者明顯刻意以內縮的嘴和突出的下巴，突顯他的高鼻。此圖在刻畫一位高鼻深目的胡人殆無可疑。他戴的尖帽也是典型的胡帽。

3) 山東青州出土一件高 3.05 公尺東漢的巨大石胡人像(圖8)。^{④⑦}1998 年夏到濟南山東石刻藝術館曾有幸得見原石。此石人為跪姿，雙手抱於胸腹之前。頭戴典型尖頂帽。尖頂略有殘損，唯其微微前彎的特點仍很清楚。面貌上兩目深凹，鼻樑已損，但可明顯看出原本高鼻深目的樣子。臉的兩腮似有殘損，但從腮及下巴仍可看出原本似有意表現茂密的絡腮鬍鬚。更可注意的是他的衣衽。上身衣著的刻紋已不甚清楚，稍仔細則其左衽仍可明確無誤地辨識出來。此為

^{④④} 參《山東漢畫像石選集》，圖 403、407；相關研究見趙超，〈蒼山元嘉元年畫像石墓題記注釋〉，《中原文物》，1991 年 3 期，頁 18-24；Wu Hung, "Beyond the 'Great Boundary': Funerary Narrative in the Cangshan Tomb," in John Hay ed., *Boundaries in China* (London: Reaktion Books, 1994), pp. 81-104.

^{④⑤} W. C. White, *Tomb Tile Pictures of Ancient China* (Toronto: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39), pl. 2, 3.

^{④⑥} 《南陽漢代畫像磚》(北京：文物，1990)，圖 91。

^{④⑦} 此石已由鄭岩發表，見 Zheng Yan, *op. cit.*, pp. 50-59；中文版見鄭岩，同註^{④①}。

一胡人像殆無疑問。

4) 1998年9月6日在山東臨沂參觀白莊漢墓畫像石。畫像中出現的胡人頗多。他們服裝與面貌上共同的特徵和在山東其它地方所見相同：頭戴微微前彎的尖頂帽，身穿窄袖短衣和長褲，腰束帶。有一位一手揚鞭，一手控勒，騎在駱駝上的胡人即是如此。他的面貌清楚表現出大眼高鼻和多鬚鬚的特點。不過他的上衣並沒有兩片衣衽，而似乎是一種套頭的尖領衣。可是他前方另一位手持長勾驅象的人，光頭，身穿窄袖上衣及長褲，他的上衣清楚表現出來是左衽。他的顏面特徵一樣也是大眼高鼻和多鬚鬚(圖9)。

5) 1998年9月2日在山東泰安岱廟看見一石柱上有一擁簪的胡人立像(圖10)。畫刻在十分粗糙的石面上，以粗重的陰線刻出輪廓。胡人頭戴微向前彎的尖帽。帽後部似有一向上彎翹無以名之的裝飾。側面臉部凹凸有致的線條特別表現出人物的深目高鼻。如果仔細看，臉上有以陰線刻出一幾乎合口的圓圈，這和下文將提到河南方城臉上帶圓形黥記的胡人十分相像。胡人雙手持簪。身上的衣著線條簡單，除了腰中束帶，並無胡服的特徵。

6) 1954年發掘的山東沂南北寨畫像石墓的門楣上有一幅著名的橋上胡漢交戰圖，橋的左端有很多形象清晰，或步或騎，張弓射箭的胡人。他們深目高鼻，頭戴同式尖頂帽(圖11)。^{④8} 1998年9月7日參觀原石，畫像的細節較拓片更清楚，有些胡人甚至有鬚鬚。

7) 1964年在徐州十里鋪漢畫像石墓中出土甚多陶俑。^{④9} 其中有男俑深目高鼻，頭戴帽頂微微前彎之尖頂帽，作蹲坐狀(圖12)。

8) 1988至1992年伊盟文物工作站在內蒙伊克昭盟托克前旗三段地鄉西南發現近三十座西漢中晚期至東漢初墓葬。其中六號墓出土一件彩繪陶俑(圖13)，高眉弓，眉目外下斜，眼窩深下、鼻垂而鼻梁高，顴骨突出，尖下頷，八字鬚，兩手合抱胸前，內穿長袍，寬腿褲，外披拖地披風，頭戴尖頂風帽。^{⑤0} 其風帽

^{④8} 南京博物院，山東省文物管理處編，《沂南古畫像石墓發掘報告》(北京：文化部文物管理局，1956)，圖版24。

^{④9} 江蘇省文管會、南京博物院，〈江蘇徐州十里鋪漢畫像石墓〉，《考古》，1966年2期，頁66-81。

^{⑤0} 魏堅編，《內蒙古中南部漢代墓葬》(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1998)，頁150-152，圖15.1、17.3。

特色在帽簷周迴耳部及頸部；從側面看，帽尖微微向前。

9) 1996 年陝西省考古所和榆林地區文管會聯合在陝北神木縣大保當發掘漢墓二十四座，其中十三座於墓門及甬道兩側有石刻帶彩畫像。三號墓(M3)墓門的門楣上有一幅尚稱完整的車馬及狩獵圖(圖 14)。^①圖上方有左行馬車三輛，車前有導騎二人。前端一人回首仰射。圖下方兩端有山頭、樹木、手執便面的人三人，前端還有一騎彎弓射鹿。十分特殊的是在這個行列中有一人一手牽一駱駝，一手握一曲頭杖。他的帽子形式和其他的人都不相同，是漢畫中胡人常戴的尖頂帽。由於刻工並非十分細緻，這方石上的人物都沒有較細緻的面部或衣飾刻畫。

漢代圖像資料中所見對「非中國人」形象的刻畫雖有定型化的傾向，卻並不是千篇一律只有上述一種高鼻深目戴尖帽的樣子。有些我們可能還辨別不出來；有些高鼻深目，卻戴不同形的帽子，也有以其它服式或髮式出現的胡人。以下試舉數例：

1) 河南方城於 1985 年發現一方墓門柱石畫象(圖 15)，其上一人站立，一手持斧，扛於肩上，一手持簪。側面的人臉可以看出高高的鼻子，臉上有一圓圈，劉玉生、鄭岩認為是奴隸的黥記。頭未戴帽。頭上有線條，清楚描繪出一些頭髮身上的衣式不是很清楚，似乎是一種長及膝的深衣，膝以下露出長褲。這位人物的造型不同於上述典型的胡人，但這方石上有「胡奴門」三字榜題，其為胡人無疑。畫像以陰線刻出，筆法簡率，難以論其細節。我們可以肯定的是其髮並非披下的長髮，而似乎是有意剪過，只剩稀疏的短髮。這樣的髮型似與古來戰俘施刑之後為奴之俗有關。^②

2) 和林格爾漢墓前室至中室甬道北壁和中室東壁有連續的壁畫，即著名的寧城圖(圖 16)。圖中展現一群光頭垂首的人，魚貫由城外進入城內，兩側有成排手持戟或刀劍的官兵以及成排的武器。光頭垂首的人由幕府南門進入以後，由兩官吏押至墓主，也就是某一護烏桓校尉(從榜題知此為東漢某一使持節護烏桓校尉之墓)之前。他坐在一敞門的建築內。門前正有百戲表演，四周有圍觀的官吏和持戟的士兵。從孝堂山及其它許多漢畫可知，這是頗為典型用以彰顯墓

^① 韓偉、王煒林編，《陝西神木大保當漢彩繪畫像石》(重慶：重慶出版社，2000)，圖 21、22。

^② 劉玉生，〈淺談「胡奴門」漢畫像石〉，收入《漢代畫像石研究》，同註④，頁 286-288；

Zheng Yan, *op. cit.*, 頁 57。

主武功的獻俘圖。由於我們確知墓主身份是護烏桓校尉，這群俘虜很可能就是烏桓。他們的光頭特徵在畫中表現得十分清楚，與《後漢書》所說烏桓髡頭之俗十分相合。^{⑤③}

3) 被髮的胡人可見於1968年山東諸城前涼台出土的東漢孫琮墓畫像。^{⑤④}此墓石刻上原有完整的題記，原石題記部分在出土後殘損。幸好王恩田先生發表了1967年調查時所作的記錄，根據記錄中的題記，可知墓主孫琮是漢陽太守。^{⑤⑤}這一點對我們理解畫中的胡人身份極為重要。畫象中有一幅被定名為髡答圖的畫象(圖17)。畫像的下半部是漢像中常見的樂舞百戲，上半部的上端及右側外圍有一圈頭戴進賢冠，持笏而坐的官員。他們的面前放著酒樽和耳杯等物；左側外圍站著兩排拱手持笏的官吏。中間則有一群或站或坐或跪披髮的人。有些披髮人的頭髮正被兵士抓著，似乎是要被削去頭髮的樣子。因此過去有學者認為這是進行髡刑的「髡答圖」。王恩田加以修正，正確地指出這些披髮的人應是《後漢書·西羌傳》中所描述以被髮為俗的羌人。東漢明帝永平17年(西元74年)以後，今甘肅天水一帶的天水郡改稱漢陽郡，三國曹魏以後復稱天水。因此這位孫琮必是東漢中晚期羌患正烈時代的漢陽太守。如果將此圖和前述和林格爾護烏桓校尉墓中的獻俘壁畫對照，就不難發現它們在細節上或有不同，但都是透過百戲、飲宴圍觀俘虜的場面，彰顯墓主的武功。圖中的俘虜應該就是羌人。他們受髡刑，除去長髮，其中有三人頭髮已削，露著光頭。

4) 1992年在鄂爾多斯高原西部毛烏素沙漠北端，鄂托克旗巴彥淖爾鄉境內鳳凰山發現西漢晚期至東漢初墓十三座。^{⑤⑥}其中一號墓墓門、墓室東西後壁及墓頂共有保存尚稱完好的彩色壁畫十餘組(圖18)。壁畫中人物的服飾，尤其是帽式極具特色，不僅為內蒙古一帶漢墓所僅見，也不曾見於其它漢代圖象資料。在墓門、墓室後壁和東西兩壁中的人物多戴一種寬沿圓頂帽。圓頂旁或插一羽翎。人物面貌清楚，並沒有特別強調高鼻深目。較特殊的是髮式。東壁宴

⑤③《後漢書·烏桓鮮卑傳》：「烏桓者，食肉飲酪，以毛毳為衣…以髡頭為輕便。」

⑤④相關考古報告及研究見任日新，〈山東諸城漢墓畫像石〉，《文物》，1981年10期，頁14-21；黃展岳，〈記涼台東漢畫像石上的「髡答圖」〉，《文物》，1981年10期，頁22-24；王恩田，〈諸城涼台孫琮畫像石墓考〉，《文物》，1985年3期，頁93-96。

⑤⑤同上註，王恩田文，頁93。

⑤⑥《內蒙古中南部漢代墓葬》，同註⑤④，頁161-175。

飲圖中坐著的兩人，頭戴插翎寬沿圓頂帽，帽下左右兩耳前有清楚的垂髮。寬沿插翎帽常見於時代屬漢代前後的新疆墓葬，但形式並非完全相同。^{⑤7} 這樣髮式和帽式的人到底是那種外族？目前還沒有可供比對的資料。我們較確定的是他們應是非漢人，而且從壁畫的內容、風格和人物穿著右衽衣服看，他們有可能是某種漢化的胡人。

以上四例是漢畫中極少數變通格套去刻畫胡人的例子。由於第二、三例有榜題或題記，可以確知墓主是職掌外夷的護烏桓校尉，或是邊郡的太守。以他們的職守而言，他們生前必曾與烏桓或羌有過交涉。用圖畫表彰他們的武功，應不無真實的成份。兩幅獻俘圖的佈局雖然仍受格套的左右(關於表彰武功的畫象格套，詳見本文下篇〈漢畫中的胡漢交戰圖〉)，為了描繪得真實些，畫工刻意擺脫固定的模式，在人物形象上多多少少展現出烏桓和羌人在外貌上與文獻描述相合的特色。第四例沒有榜題，比較難以確定墓主的身份。但是從西漢晚期到東漢初，鄂爾多斯西部鄂托克旗一帶，也就是兩漢朔方、上郡、北郡之間的區域。在這裡漢與外族不斷拉鋸爭奪。當地人對外族有太多親眼目睹的機會，因此當地的畫工在描繪外族上較近乎實際，不同於一般格套是不難理解的。

另外還有例子表現出在中國為奴的胡人，改穿了漢服。湖南衡陽出土一東漢銅質牽馬胡俑(圖19)。^{⑤8} 銅俑高鼻深目，唇上有向兩邊飛翹的鬍子，下巴則有向左右捲曲的髭鬚，其為胡人無疑。但是他衣服除了腰帶，則是標準右衽的漢式長袍，頭上戴的也是漢代奴僕常戴的平巾幘。^{⑤9} 胡人來到中土，體質的特質無法改變，服裝卻不難改變。武氏祠有著名匈奴休屠王子金日磾的畫像。金日磾初入中國為奴，為武帝養馬，後深深漢化，以孝著稱。他在衣著上和祠堂畫象中其它的漢人一無二致。^{⑥0}

此外，在一些銅、陶器的器座上我們可以看到裸體的胡奴。例如1989年在

⑤7 新疆伊犁新源縣出土一尊銅武士俑，頭戴尖頂寬沿帽；蘇貝希古墓出土一頂牛皮質尖頂，大圓盤式帽緣的尖頂帽，其有寬的帽沿與鳳凰山所見近似，但尖頂不類。另新疆樓蘭、孔雀河皆曾出土插翎的帽子，但無寬沿。以上各式帽子圖影請參李肖冰著，《中國西域民族服飾研究》(烏魯木齊：新疆人民，1995)，頁48、60、64、66。

⑤8 參藝術家雜誌社編，《漢代文物大展》(台北：藝術家雜誌社，1999)，圖56。

⑤9 關於平巾幘，參孫機，《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北京：文物，1991)，頁229-232。

⑥0 休屠像已殘，以《隸續》(北京：中華書局據洪氏晦木齋刻本影印，1985)，卷6，所錄摹本為準。

雲南箇舊市黑馬井村出土的一件東漢銅俑燈座。銅俑跪坐，裸身、尖臉、深目，有連腮鬚和十分尖挺突出的高鼻，頭上所戴卻是一種形式較為特殊，在前額上呈前突圓椎狀的頭飾(圖20)。^{⑥1} 1955年在廣州珠海區大元崗出土一西漢後期陶燈。燈座由一位大眼高鼻，頭上梳髻，裸身吐舌的胡人一手撐著燈(圖21)。雲南箇舊和廣東廣州出土的這兩件「胡人」像，不覺令人詫異這樣高鼻大眼的胡人怎會出現在南方？他們到底是刻畫當地土人？還是工匠習慣地以他們心目中定型化的胡人形象製造燈器？這些問題或許還值得以後進一步討論。^{⑥2}

小結以上所說，漢代造型藝術中呈現的胡人外貌雖說是形形色色，不過除了體質上大眼高鼻或深目高鼻或多鬚的特徵，服飾上除了改穿漢人之服或裸體，內蒙鳳凰山出現一個戴寬沿圓頂帽的例子，可以說大部分以尖頂帽為服飾上最主要的特色。以下針對漢畫中胡人的尖頂帽稍作進一步的討論。這種尖帽的共同特色在於帽頂呈尖狀，微微朝前彎。如果細分，又可分出稍有不同的三型：

1) 第一型是單純的尖頂帽，除了尖頂，帽簷部分並沒有其它附屬物。其微微前彎的尖頂有時清楚地呈現出來，有時並不特別明顯。

2) 第二型則是帽簷另有類似護耳的部分。最清楚的例證就是在前述孝堂山石祠中所見到的。「胡王」和其前後胡兵所戴的帽子，在帽簷兩側都明顯有可遮住雙耳的部分。

3) 第三型則在帽子後方有微微下垂或微微飄起狀的帶子。在前述臨沂白莊的漢墓中可以見到這樣的胡帽。

這三型尖帽對我們探討漢畫中胡人和中亞、黑海北岸，甚至希臘、羅馬圖像資料中的斯基泰文化的關係甚有幫助。詳見下章。

2. 圖象與文獻資料中胡人外貌的比較

接著比較一下這些圖象中所見的胡人和文獻中所描述的異同。首先要指出以圖象和文字描述人物的外貌，有一基本上的不同：文字可繁可簡，也可只作重點或局部交待，例如只提髮式和衣式，完全不提容貌或其它。以圖畫描繪人物雖也可有重點和粗細，或只及局部，但比較須要將人體的體形和服飾的主要部分呈現出來，例如可以只刻畫頭部，卻不能只刻畫身軀，或者只畫衣飾而無

^{⑥1}《中國文物精華》(北京：文物，1992)，圖120。

^{⑥2}《漢代文物大展》，同註^{⑤9}，圖86。

頭，要畫身軀或腿腳，除非裸體，也就必要交待上下身的衣飾。因此在先天的性質上，文字幾乎可以隨意「留白」，傳統的造型藝術卻不能。也正因為如此，除非文字刻意作詳細的描述，否則不易如圖象一般傳達較多的形貌信息。比較一下圖象資料中所見的胡人外貌和文獻裡所強調的，其間的差異十分明顯：

1) 以衣飾而言，文獻強調胡人左衽，有時提到衣服的質料以毛皮為多。幾乎完全不提衣襟以外服裝其它的形式和特色。石刻或壁畫比較不易表現衣物的質料，漢畫似乎也不在意表現這些。青州胡人石像、河南畫象磚和山東臨沂白莊漢墓是較清楚呈現左衽的例子。其餘漢畫也不太在意表現衣襟的左右，反而常常描繪他們下著長褲，上著窄袖短衣，表明這些方面和華夏上層貴族官僚衣裳冠冕之制的不同。

2) 文獻從不提胡人或戎狄戴什麼樣的帽子，只說他們被髮、椎髻或辮(編)髮。漢畫卻以帽頂微向前彎的尖頂帽作為胡人形象的主要標記。內蒙鳳凰山漢墓壁畫甚至細緻地描繪出他們戴著寬沿圓頂帽。我們不難想像在冰封的草原上，使頭部保暖的帽子必不可少。圖象呈現了文獻所不當忽略的重要部分。當然在器物的紋飾中也有不少著漢裝的「胡奴」。

3) 《史記》、《漢書》等漢代文獻從未提到匈奴、烏桓、鮮卑、羌等外族容貌上的特色。如前所說只有《漢書·西域傳》大宛國條提到「自宛以西至安息國…其人皆深目，多須鬚…」。而漢畫中的胡人面容常常以深目或大目、高鼻、多鬚為典型。不過，有時又並不特別強調深目高鼻，而以髮式、尖帽或長褲區別畫中的胡漢，如上述和林格爾護烏桓校尉墓壁畫中的烏桓、諸城孫琮墓中受刑的羌人和孝堂山石祠胡漢交戰圖中的胡人。換言之，漢畫中的胡人容貌基本上有兩種可能：一是依據烏桓、鮮卑、羌或匈奴人的長相，另一種是以蒙古種以外，某種有深目、高鼻、多鬚面容特徵的民族為藍本。

漢代的畫師工匠如依和漢人接觸最密的烏桓、鮮卑、羌或匈奴人為胡人容貌的藍本，應該是較自然的事。但漢畫中深目、高鼻、多鬚模樣的胡人偏偏遠多於面貌「頗類華夏」的胡人。當時僱請畫工的社會大眾，似乎也能接受這樣與現實中常見的匈奴或鮮卑等形象不同的「胡人」。畫象中為何又要去強調那頂尖帽？這尖帽又從何而來？這迫使我們不能不去猜想古代中國在由士大夫掌控的文字傳統之外，是否另有一個由畫師工匠主導，具有相當自主性的圖象工藝傳統？^③在這個傳統內，畫工可以不受儒家「被髮左衽」經典權威的限制，而依循本身職業的傳統(例如世傳的圖譜、作坊的行規)和圖象呈現的需要(例如圖象上必須突顯胡、漢在外觀上的差異，也必須使這樣的差異定型化，使觀眾

易於辨識)，去塑造「胡人」的形象。這樣的形象不一定於事實無據，也不一定完全貼合事實，卻符合漢代社會集體記憶中的胡人，能使當時的顧客接受和滿意。

四、斯基泰文化和漢畫中胡人形象的關係

漢畫中胡人長褲、窄袖短上衣以及尖頂帽的裝束，使我們不得不注意這樣裝束的胡人和歐亞草原上受斯基泰文化影響的民族之間的關係。古代中國與歐亞草原游牧世界的關係是一個已有無數學者關注的大問題。商周以來中原地區玉器、青銅器在質材、製作技法、若干母題及表現形式上和西亞、北亞出土品的相似處，幾乎沒有人能夠否認。只可惜限於材料，這一段重要的文化交涉史裡仍有極多模糊不清的地帶。舉例來說，那時北方燕、趙、秦等國接觸的胡到底是何模樣？戰國時代的人物畫已甚為發達，各國的畫匠如何去描繪他們？諸胡之中，又是那些「胡」留給春秋戰國時代中國人最深刻的印象？這些印象又如何影響了後來漢畫中對胡人的描寫？老實說，我們目前並沒有足夠的材料去回答。以下的探討無非是嚐試，提出一些有待驗證的假說而已。

依目前的材料來看，從極古遠的時代中原地區即直接或間接和廣大的北亞、中、西亞一帶有文化上的接觸，否則不易解釋譬如殷商的戰車，商周墓葬中北方式的青銅器和來自新疆合闐的玉。此處想要強調的是這些接觸很可能不是持續不斷，而是斷斷續續的。西元前的一、兩千年裡，綿延數千里的歐亞草原上曾有太多我們至今不明的變動。考古證據目前還沒有辦法將這些變動勾勒出一個大家都同意的面貌。而這些變動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中國與這一地帶的接觸和接觸的頻率。張騫通西域曾被司馬遷喻為「鑿空」(《史記·大宛傳》)即可為證。司馬遷以當時人言當時事，他在《史記》中曾十分明白地描述了張騫通西域前後，中國對西域的認識如何從稀少、模糊到豐富而具體。如果我們再對照《穆天子傳》、《山海經》、《逸周書》和《史記》對西方世界的描述，就更可以證明「鑿空」二字並非虛語。^{⑥4}往西域的通道的確早已存在，只是受環

⑥3 關於工藝傳統以及傳統之自主性，限於材料，過去的研究極為有限。隨著出土資料的大量增加，相信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課題。我過去曾稍稍討論漢代的石工作坊集團和漢代畫像之間的關係，參〈漢碑、漢畫和石工的關係〉，同註③9。

⑥4 司馬遷曾在《史記·大宛列傳》太史公曰中評論《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

境左右，通斷無常。漢武帝以前必曾中斷過，張騫才歷經艱險，重新打通。

不知因何種機緣，循著怎樣的途徑，帶有歐亞草原斯基泰動物文飾特色的器物如金銀銅飾牌、青銅獸頭刀、柳葉形短劍、折背刀和管銎斧等出現在商周的墓葬中。^⑤這些受斯基泰文化影響的民族必曾和華夏諸邦，以及和華夏諸邦交雜的戎狄有所接觸。除了器物交流，他們之間還發生了什麼互動？至今仍不十分清楚。^⑥較可確定的一點是齊桓公(西元前685-643)所曾面對的戎狄，其「被髮左衽」的服飾特徵和受斯基泰文化影響的民族有相類之處。更明確的是到西元前四、三世紀，趙武靈王(西元前325-299)曾改採胡服和騎射之術來應付游牧民。所謂的胡服，王國維已清楚考證，主要就是便於騎射的窄袖短衣和長

敢言之也。」又認為《尚書》所記九州山川較近實。可見司馬遷即曾比較過古籍所記與張騫得到的新認識。他以鑿空二字形容張騫開通之功，必非任意輕率之言。關於張騫「鑿空」前後，古代中國與中西亞之關係可參陳慶隆，〈論「張騫鑿空」〉，《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歷史與考古組(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9)，頁403-416。

- ⑤ 自1922年，俄國史家M. Rostovtzeff首創以「動物紋樣」表述斯基泰文化的特色以來(參M. Rostovtzeff, *Iranians and Greeks in South Russia*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22); *The Animal Style in South Russia and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H. Mil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9))，已有難以計數的相關研究發表，一個代表性的書目可見V. Schiltz, *Les Scythes et les Nomades des Steppes* (Paris: Gallimard, 1994)，pp. 443-459。Rostovtzeff已注意到斯基泰動物紋樣和中國商、周青銅裝飾母題之間的關係，幾十年來也引起無數的討論。較新的討論可參烏恩，〈我國北方古代動物紋飾〉，《考古學報》，1981年1期，頁45-61；〈中國北方青銅透雕帶飾〉，《考古學報》，1983年1期，頁25-37；〈論我國北方古代動物紋飾的淵源〉，《考古與文物》，1984年4期，頁46-59；Emma Bunker, "The Steppe Connection," *Early China*, vol. 9/10(1983-85)，pp. 70-76；Lin Yün, "A Re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ronze of the Shang Culture and of the Northern Zone," in K. C. Chang ed., *Studies of Shang Archaeolog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pp. 237-273；同文中文本〈商文化青銅器與北方地區青銅器關係之再研究〉，見蘇秉琦編，《考古學文化論集》(北京：文物，1987)，頁129-155；Esther Jacobson, "Beyond the Frontier," *Early China*, vol. 18(1988)，pp. 201-240；杜正勝，〈歐亞草原動物文飾與中國古代北方民族之考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4卷2期(1993)，頁231-408。

- ⑥ 許倬雲師即曾劃分三期，概論歐亞大陸民族大移動和商周歷史文化之間的關係，詳參許倬雲，《西周史》(臺北：聯經，1984)，頁68-70。

褲。這些正是斯基泰服裝的特色。

這樣裝扮的胡人不知是在怎麼的情況下，打動了華夏畫工的心，形成難以磨滅的刻板印象。印象似乎不是一開始就定型化。各式各樣的「胡」原本可能是以各自不同的面貌出現在華夏的造型藝術中。陝西扶風召陳村西周建築遺址乙區灰坑曾出土兩件蚌雕人頭像(圖22)。^{⑥7}兩像頭頂都戴著形式類似的平頂帽，但帽頂的部分曾被削去。原形如何，目前已難以確實復原。^{⑥8}一號人像頭頂刻有一「巫」字。更值得注意的是人像的面形——高鼻深目，明顯非蒙古種。^{⑥9}林已奈夫曾以傳世的戰國青銅、玉人像為例，談到北方的非中國人及白狄等族不同的衣飾與面貌。^{⑦0}波士頓美術館(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所藏手握一雙鳥頭柱的青銅立人像即為一例(圖23)。此人面形圓大扁平，辮髮垂於兩肩，穿套頭及膝襦衣，腰繫帶，下穿長褲及靴。從臉形上看應屬蒙古種。他(她)既不被髮，也非左衽，其非華夏之民似可斷言，但其族屬則難確定。值得注意的是這樣造型的「胡人」並無它例可考。要辨別先秦遺物圖象中人物的族屬，極為不易。有很多目前尚無從辨識。

不過，胡人造型似有定型化的趨勢。定型化的指標可在燕下都出土的戰國陶器和金飾件，以及戰國時代齊臨淄出土的半瓦當上見到。燕下都辛莊頭墓區戰國晚期30號盜洞出土彩繪雙人陶盤，盤兩側各有一立人像。報告對人像的描寫是：「人頭戴尖帽，身穿圓領長袍，寬袖。領緣、袖邊飾花邊，腰繫塗朱寬帶。」細查《燕下都》報告所附線描圖，還可以看出其帽尖後仰，向一側傾斜，帽簷包住雙耳(圖24)。^{⑦1}同一墓又出一件人像金飾，報告中描述道：「平面略呈兩端尖的橢圓形，中部隆起較高，頭戴氈帽，彎眉突目，高鼻，闊口，有鬚。頭像兩側飾對稱連弧紋和卷雲紋。…背面刻記重銘文…『四兩十六朱四分分朱

⑥7 尹盛平，〈西周蚌雕人頭像種族探索〉，《文物》，1986年1期，頁46-49；陳全方，《周原與周文化》(上海：上海人民，1988)，頁20。

⑥8 劉云輝先生根據帽子下大上小的趨向以及帽子上刻畫的豎線推測，「最初帽子頂部是尖的，完整的帽子形狀應是帶護耳的尖頂硬高帽。」見劉云輝，〈周原出土的蚌雕人頭像考〉，《周秦文化研究》(西安：陝西人民，1998)，頁486-491。

⑥9 關於人種推測的各種意見參劉云輝，同上註，頁487-488。

⑦0 林已奈夫，同註⑫，頁72-73。

⑦1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北京：文物，1996)，頁698，圖405.2，彩版23。燕下都資料承杜正勝兄提示，謹謝。

三』(圖25)。^②可能受飾件造型的影響，其帽後仰，頂為尖形。1997年參觀沙克樂博物館時親見兩件未說明出土的半瓦當(圖26之1、之2)。瓦當中央有一樹，樹兩側各有一面面相對的騎士。模造的瓦當刻畫不是十分細緻，騎士的面容並不清楚，但頭上明顯戴著帽尖前彎的尖帽，騎士鼻子高聳。同樣形式和紋飾的半瓦當，關野雄在其《半瓦當の研究》中也曾收錄一件(圖26之3)。這件是昭和15年關野在臨淄齊城調查時所獲。當時他不能理解這是什麼形式的帽子，僅說瓦當上的人物「戴著一頂奇妙形狀的帽子」。^③1976年臨淄桓公台工地第52探方出土同樣模式騎馬人物紋的圓瓦當(圖26之4、之5)。^④李發林曾描述道：「畫面分兩個半圓，內容相同。正中一樹，樹幹粗壯有結節，不直，樹枝僅一對。樹左右各有一騎。騎者雙手執武器，似矛或劍，面面相對。騎者頭戴尖頂帽，雙足垂于馬腹下，可知當時尚無馬鐙。」^⑤這些瓦當是以模型大量製造，比個別製造的青銅、金、玉器更容易成為圖象定型化和模式化的載體。因此這幾件戰國瓦當，可以說是斯基泰人物造型和東漢胡人畫像在形象關連上頗有意義的連接線索。瓦當上人物的衣飾雖不夠清楚，但他們1.騎在馬上2.頭戴尖帽3.鼻子高聳。這三點特徵相當清楚。儘管漢代面對的外族以蒙古種的匈奴為主，瓦當上這種帶有高加索白種人面貌特徵的胡人提醒我們，漢畫中胡人容貌的藍本最少應可追溯到戰國。

五、從考古資料看被髮、左衽與帽式

「被髮左衽」在傳統文獻中，固然常常只是象徵性的措詞，可是孔子說這話也有可能是依據對戎狄的親身觀察。換言之，所謂的被髮左衽也可能有若干事實的根據。那麼，是否也能像尖頂帽一樣在中國和中國以外找到考古證據呢？拜近百多年考古之賜，目前已有不少值得討論的線索。以下將這些線索粗分為：(1)中原及周近地區出土以及(2)中國「域外」出土者兩大部分。經初步考察，

② 同上註，頁719-720，圖417.1；彩版32.1、2。

③ 關野雄，《半瓦當の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52)，頁25、73、圖版VII.19。又參李發林，《齊故城瓦當》(北京：文物，1990)，頁39-40。

④ 李發林，同上註，頁113，圖138；又見安立華編著，《齊國瓦當藝術》(北京：人民美術，1998)，頁63、64，圖54、55。

⑤ 李發林，同註③，頁113。

被髮左衽確有證據，較堅強的證據卻見於長城以外。

在進入討論以前，或許應該先確定古代華夏諸邦以右衽為特色的服裝習慣。這一點可以說證據確鑿。商、周至戰國末墓葬中有不少人形的金、銅、玉、石器。這些人形器的衣著，有些有衣襟，有些分不出衣襟。只要是胸前有兩片衣襟的，幾乎全為右衽。沈從文《中國古代服飾研究》^{⑦⑥}一書收有三十餘件，林巳奈夫〈春秋戰國時代の金人と玉人〉^{⑦⑦}一文收錄四十五件左右。其中除少數衣襟形式不明或為對襟者，其餘凡屬商、西周時期的全為右衽，東周、戰國以下則有少數為左衽。山西侯馬牛村曾出土西元前六世紀末至五世紀初人形陶範(圖27)。^{⑦⑧}人形陶範有女子人形、武士、戴冠男子、裸身人物等數件，或全或殘。其中衣衽可辨的四件，衣式基本相同，其中兩件沈從文稱之為「齊膝曲裾短衣」(沈，頁15)，另兩件下半殘，不明。從陶範看，衣襟都是左衽，但從陶範翻製出來則成了右衽。^{⑦⑨}

接著還須要檢討若干戰國至漢左衽的人形玉器和石雕。左衽曾出現在不少戰國至漢代玉雕舞人的身上。可是稍一考究即可發現，這些應該是基於藝術設計上追求對稱之美所造成，並不能反映常人的衣衽方向。例如傳為洛陽金村韓墓出土，美國佛瑞爾藝術館(Freer Gallery of Art)所藏的長袖曲裾衣舞女玉雕。^{⑧⑩}兩舞女正面朝前，左右並立，姿勢上顯然作對稱的設計，一手在腰前，一手擗袖上揚。衣襟也是左右對稱，因此其中一人的衣襟成了左衽。1975年北京大

⑦⑥ 沈從文，《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台北：南天，1988)，頁2-92。

⑦⑦ 見林巳奈夫，同註⑫，頁57-145。

⑦⑧ 沈從文，同註⑦⑥，頁15，插圖三；又參林巳奈夫，同註⑫，圖2、3，頁88-89，圖5，頁91。有關考古發掘報告見侯馬市考古發掘委員會，〈山西侯馬東周遺址發掘大批陶範〉，《文物》，1960年8、9期；侯馬市考古發掘委員會，〈侯馬牛村古城南東周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62年2期；張萬鍾，〈侯馬東周陶範的造型工藝〉，《文物》，1962年4、5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馬鑄銅遺址〉(北京：文物，1993)；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馬陶範藝術〉(Princeton, New Jersey: 普林斯敦大學，1996)。

⑦⑨ 沈從文的線描圖作右衽，林巳奈夫的線描圖雖作左衽，不過他在論文中明確提到實際的方向應是右衽(林巳奈夫，同註⑫，頁60)。周錫保，同註⑬，頁72，圖五說明謂此二陶範人像之上衣一作左衽式，一作右衽式，實誤。

⑧⑩ 沈從文，同註⑦⑥，頁33，圖八上；又見林巳奈夫，同註⑫，頁125，圖26。

葆台二號西漢後期墓出土的一對玉舞人，^{⑧①}其舞姿和上述兩件相類，姿勢和方向左右完全對稱，衣衽也左右對稱。1983年陝西西安市西郊三橋鎮漢墓所土一對玉舞人^{⑧②}長袖舞姿和前述三件相類，二人衣襟呈左右衽。1986年河南永城芒山鎮僖山西漢墓所出二玉舞人。^{⑧③}這兩件整體姿勢上雖是左右相對，但刻飾不完全相同，原來可能分屬兩組玉飾。這兩組玉飾照漢代工藝的慣例，應該也是各自工整對稱的。因此仍然是左右衽對稱的情形(圖28)。出土或傳世的玉舞人，或單件或成雙，還有很多，不再細舉。總之，可考見的玉舞人在頭尾多有穿孔，它們本是某種成串飾物的一部分。爲了飾物的對稱之美，這些舞人的衣服才作了左右衽相對的特殊設計。

衣衽的對稱設計也見於漢畫象石刻。1998年9月訪山東臨沂，在吳白莊漢墓的石刻立柱上看見左右相對，頭戴尖頂帽，高鼻大目的胡人。他們的衣襟十分清楚，一爲左衽，一爲右衽(圖29)。從他們的帽式和面貌，可以很清楚知道當時的石工是要刻畫他們心目中的胡人，衣衽之所以一右一左，應該也是出於藝術上的對稱設計，而非完全寫實。

依文獻及考古資料來說，孔子及其以後，華夏諸邦的衣式以右衽爲主可以說不成問題。^{⑧④}秦漢時仍然如此。秦漢墓葬出土的彩繪或著衣俑極多，壁畫和石刻中的人物衣飾亦多可辨。舉例言之，秦始皇陵所出上千的兵馬俑，凡有衣衽可辨的全爲右衽；武威磨嘴子48號墓出土四件衣服，馬王堆一號墓出土十餘件衣服都是右衽，就是有力的證明(圖30)。漢代隨葬的衣物既爲右衽，可見生前所穿應該也是右衽。《禮記·喪大記》說人死，斂衣左衽。這在漢墓中還未見其例。^{⑧⑤}

⑧① 大葆台漢墓發掘組編，《北京大葆台漢墓》(北京：文物，1989)，頁71，圖69。

⑧② 盧兆蔭主編，《中國玉器全集》(石家莊：河北美術，1993)，圖228。

⑧③ 同上註，圖185、186。

⑧④ 許倬雲師指出由商代石刻人像到戰國木俑，古人上衣下裳，上衣右衽，基本上無大差別。參《西周史》，同註⑥⑥，頁260。

⑧⑤ 相關討論參顧炎武，同註①，卷29，頁826-827，〈左衽〉條論喪服左衽謂「死而左衽者，中國之法；生而左衽乃戎狄之製耳。」；彭美玲，《古代禮俗左右之辨研究——以三禮爲中心》(台北：台灣大學文學院，1997)，頁123-124；李如森，《漢代喪葬制度》(長春：吉林大學，1995)，頁15-16。

1. 中原及周近地區出土者

相對來說，戎狄為「被髮左衽」的可靠物證，在中原及周近地區發現的相當有限：

1) 左衽人像目前可考，時代最早的可能要屬四川廣漢三星堆祭祀坑所出的青銅人像。^{⑧6} 二號坑所出那尊連座通高262公分的立人(神?)像，穿著一件十分奇特的衣服，時代約在西元前一千三、二百年(圖31)。從銅像側面的衣褶和領口可以看出，衣服最少有內外兩層甚或三層：內層較長，至膝蓋以下，後身下擺兩側稍長彎下，呈燕尾之形。領口正背面都是倒三角的對襟。由於手臂有花紋，兩手手腕處又有環狀物，這樣的環狀造型可以理解為袖口裝飾，也可以是手環一類飾物。因此，不容易判定衣袖的長短。我推斷內衣較像是長袖，長及手腕。應注意的是外層衣。從正和背面可以清楚看出外衣下擺平直，長度只到臀部以下。外衣開領的部分如同僧侶的袈裟，由右肩斜下到左腋。^{⑧7} 著長袖內衣的左手及臂，伸出於外衣之外。這種外袒一臂的袈裟式上衣，也見於河北滿城劉勝墓出土的一件坐姿銅人。三星堆銅人從正面看，領口處內層為倒三角對襟，外層則像是左衽，實際上和華夏或戎狄之服因兩襟相覆造成的左右衽並不同。

2) 較明確的左衽人形器是雲南晉寧石寨山古墓群所出許多銅器上的立體人像。晉寧石寨山墓群的年代約在戰國末至西漢中、晚期之間。數十座墓中出土了不少具有滇西當地各部族及帶有北方草原文化特色的器物。如從十三號墓出土，帶有斯基泰式動物文飾的銅飾牌、馬銜、銅泡釘等馬具和一件具有北方游牧民窄袖長褲衣著特徵的銅人像扣飾(圖32)。^{⑧8} 此扣飾上的銅人是兩男子，手握圓盤，作跳舞狀，腰繫長劍，身穿窄袖上衣，腰繫帶，下著長褲。他們上

^{⑧6} 杜正勝，《人間神國——三星堆古蜀文明巡禮》(台北：太平洋文化基金會，1999)，頁13；陳德安、張光遠撰，賴玉人總編，《三星堆傳奇》(台北：太平洋文化基金會，1999)，頁52-54。

^{⑧7} 相關描述可參屈小強、李殿元、段渝編，《三星堆文化》(成都：四川人民，1993)，頁323-324；杜正勝，同上註，頁13-14。

^{⑧8} 雲南省博物館，《雲南晉寧石寨山古墓群發掘報告》(北京：文物，1959)，圖版陸捌：1。相關研究見Tze-Huey Chiou-Peng, *The "Animal Style" Art of the Tien Culture*, unpublished Ph. D. dissertation of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1985.

衣的衣襟都是清楚的左衽。張增祺指出他們可能不是雲南當地的土著，而是《史記·西南夷列傳》中的巂人，與中亞斯基泰人有文化上的關係。^{⑧9}

石寨山古墓群出土的所謂貯貝器上有場面極浩大，人物及場景極眾多複雜的立體銅鑄像。這些男女銅像，十分寫實生動地呈現出當地部族複雜多樣的服飾。其複雜程度遠遠不是《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所說「椎髻左衽」四字所能形容。依《雲南青銅器》一書的報告，髮式主要有梳髻和辮髮兩大類，也有披髮的情形。髻的形式又有「螺髻」、「椎髻」、「銀錠式髻」、「小髻」、「長髻」、「雙髻」、「圓髻」、「尖長形髻」、「尖角狀高髻」等之不同。^{⑨0}衣服樣式極為複雜多樣，難以盡述。有許多衣服是所謂貫頭式的，根本沒有衣衽。有衣衽的，則有對襟、左衽等不同的形式。是否有右衽的，報告未明確提到，從圖版也不太看得出來。穿左衽衣的可在石寨山一號墓的紡織場面貯貝器和十三號墓納貢場面貯貝器上見到。^{⑨1}此二器的時代分別當西漢或西漢中期。

3) 林已奈夫曾討論到一件未注明出土地的戰國銅人立像(圖 33)。^{⑨2}銅人頭戴一種緊包住頭部呈圓形的帽子，兩手合於腰前，身穿窄袖長袍，腰部繫帶。衣襟從右肩斜披而下向左至袍底的邊緣。林先生認為這一件反映了夷狄的衣著風俗。^{⑨3}此銅人未被髮，出土地點不明，林先生將其時代訂在西元前四世紀，但未說明證據。

4) 還有一個頗有爭議性的，這裡必須一提的是傳為洛陽金村韓墓(李學勤先生指出實應為周墓，見下引孫機文)出土，如今藏於日本的銀人。這件銀人頭頂似有一種形式和質地不明的冠或頭罩，其後有髮髻露出，身穿窄袖右衽齊膝上衣，腰束帶，下身穿長褲，跣足(圖 34)。梅原末治、容庚以為此為胡人像(見下引孫機文)，江上波夫認為此人衣飾及面部的體質特徵表現的是匈奴人，^{⑨4}林已奈夫則從衣飾及跣足以為係「非中國人」。^{⑨5}長期以來，中外學者多認定

⑧9 張增祺，〈關於晉寧石寨山青銅器上一組人物形象的族屬問題〉，《考古與文物》，1984 年 4 期，頁 88-92。

⑨0 參雲南省博物館編，《雲南青銅器》(北京：文物，1981)，頁 194-205。

⑨1 同上註，圖 14-17、24；解說見頁 194-195。

⑨2 林已奈夫，同註⑫，頁 133，圖 36。

⑨3 林已奈夫，同註⑫，頁 60。

⑨4 江上波夫，《ユウラシア古代北方文化》(東京：山川，1950 再版)，頁 11。

此像爲非中國人之像。如果此說正確，則戰國時的非中國人也有穿右衽衣的。但沈從文認爲這是中國古代統治階層形成初期，「統治階層人物尚未完全脫離勞動，爲便於行動的衣式」。^{⑨⑥}他雖然沒有明說此像人物的族屬，但無疑暗示他應是中國人。孫機則曾特寫一文，從面部特徵、髮式、服飾、跣足各點，辯正此像爲一華夏之人。^{⑨⑦}孫先生的一部分論證或有爭議(例如他認爲匈奴爲白種人，詳見後文)，我認爲其說可取。

以上這些資料，嚴格說，或出土不明，或時代難定，或是否爲「非中國人」尚有爭議，並不足以成爲華夏北方戎狄爲「被髮左衽」的有力證據。如果我們將目光轉移到長城以外廣闊的歐亞草原上，情況就不同了。在歐亞草原的斯基泰文化遺物中、甚至波斯、貴霜、希臘和羅馬的圖象藝術裡都可以找到許多耐人尋味的線索。

2. 中國「域外」出土者

關於從多腦河下游、南俄、中亞到西伯利亞草原帶上的斯基泰文化，過去一個世紀已有極豐富的出土及研究。這一草原地帶，民族極爲複雜，文化交流十分頻繁，不少人稱之爲草原絲路。^{⑨⑧}然而代表這一地帶的斯基泰文化，最令學者驚異的是其特徵上的一致性和延續性。^{⑨⑨}此一文化特徵如果較概括地說，

^{⑨⑤} 林巳奈夫，同註^⑫，頁72。

^{⑨⑥} 沈從文，同註^{⑦⑥}，頁16。

^{⑨⑦} 孫機，〈洛陽金村出土銀著衣人像族屬考辨〉，《考古》，1987年6期，頁555-561。

^{⑨⑧} 例如張志堯編，《草原絲綢之路與中亞文明》(烏魯木齊：新疆美術攝影，1994)；盧連成，〈草原絲綢之路——中國同域外青銅文化的交流〉，收入上官鴻南、米士光編，《史念海先生八十壽辰學術文集》(西安：陝西師範大學，1996)，頁713-723。

^{⑨⑨} 談到這一點的學者很多，例如江上波夫，同註^⑪，頁22；Esther Jacobson, "Beyond the Frontier: A Reconsideration of Cultural Inter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the Early Nomads," *Early China*, vol. 13 (1988), p. 228; V. Schiltz, *op. cit.*, p. 3; Sophia-Karin Psarras, "Pieces of Xiongnu Art," *Central Asia Journal*, vol. 40, no. 2 (1996), pp. 234-259, esp. 235. 江上波夫曾逐一討論歐亞草原游牧民在剃頭皮、髑髏杯、葬禮中髻面、截耳、剪髮等共通之俗，參〈內陸アジアの自然と文化〉，《江上波夫著作集》，10冊(東京：平凡社，1985)，頁298-318；莫任南曾簡略綜述歐亞草原游牧民在歃血爲盟、婚姻喪葬習俗、多神崇拜、占卜和思想文化上的共同特色，詳參莫任南，〈古代歐亞草原游牧民族的風俗和文化〉，《史學月刊》，1994年3期，頁

可以武器、馬具和其它金、銀、銅、木、皮、角器、石刻及紡織品上出現的動物文飾(animal style)為代表。它們不是全然相同，卻相當普遍地存在於西元前八世紀至西元後一、二世紀的草原地帶，甚至周邊綠洲或農業社會的墓葬遺存中。^⑩從這些隨葬器皿、石刻和紡織實物中見到的人物衣飾特徵，不能不使人聯想到中國古代被髮左衽的戎狄，以及此後所謂的胡服。

過去似乎還沒有學者從斯基泰文物為「被髮左衽」找佐證。^⑪目光一般多集中在斯基泰文物(包括紡織品)紋飾的本身，以及這些紋飾和希臘、伊朗、埃及藝術，甚至中國商周青銅器之間的關係，少有人注意草原民族和中國古代戎狄服飾之間的可能關聯。^⑫因此，以下羅列若干斯基泰文化中的服飾材料，並

80-86；匈牙利的中亞語文學者 J. Harmatta 在他主編的《中亞文明史》的結論中說，「在草原帶由於交通接觸的便利和頻繁，促使一種相當一致的游牧文化(a fairly uniform nomadic culture)的興起和散播」，見 J. Harmatta ed., "Conculsion,"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of Central Asia* (Paris, UNESCO Publishing, 1994), vol. II, p. 486。不過隨著考古材料的增加，也有不少學者認為「斯基泰文化」不是一個單一的文化，而是在草原地帶由不同民族所創造一系列不同的文化。他們彼此影響，在文化上有類似之處，也各有獨特的面貌。參見 A. Abetkov and H. Yusupov, "Ancient Iranian Nomads in Western Central Asia" in J. Harmatta ed., *op. cit.*, vol. II, pp. 28-30.

^⑩ 參注^⑥。

^⑪ 張末元，《漢朝服裝圖樣資料》(香港：太平，1963)；周汛、高春明，《中國服飾五千年》(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1984)；原田淑人原著，常任俠、郭淑芬、蘇兆祥譯，《中國服裝史研究》(合肥：黃山書社，1988)；華梅，《中國服裝史》(天津：天津人民美術，1989)；周汛、高春明，《中國歷代服飾》(上海：學林，1984、1991 第四版)；黃能馥、陳娟娟，《中國服裝史》(北京：中國旅遊，1995)；高春明，《中國古代的平民服裝》(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⑫ 曾有學者討論安息人和游牧民族的髮式，但完全沒有提到中國記載中戎狄的被髮，參 Paul Bernard, "Plutarque et la Coiffure des Parthes et des Nomades," *Journal des Savants*, 1980, pp. 67-84；1909 年，B. Laufer 曾在其著作 *Chinese Pottery of the Han Dynasty* (reprint by Rutland; Vermont: Charles E. Tuttle, 1962) 裡討論西伯利亞藝術對漢代藝術的影響，並認為漢陶器及石刻中胡服騎士所戴的尖帽為斯基泰帽(Scythian cap)(pp. 217-220)。唯江上波夫曾反對其說，見楊鍊編譯《中國歷代社會研究》(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 24 年初版，26 年再版)所收江上波夫〈漢代狩獵及動物圖樣〉一文，頁 7-28。江上日文原文見《アジア文化史研究》(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山川，1965-1967)，論考篇，1967。左右衽的問題未見討論。

論證中國古代文獻中以被髮左衽為特色的戎狄裝束，和歐亞草原斯基泰文化可能有淵源上的關係。

斯基泰服飾可注意之處，從上到下大約可分為六部份：(1)帽式、(2)被髮、辮髮或椎髻、(3)窄袖上衣、(4)腰帶、(5)長褲、(6)皮靴。王國維和一般服飾史的作者多少都已觸及男性的窄袖上衣、腰帶、長褲和皮靴，對衣衽形式、髮式、帽式較為忽略。下文將集中討論這三方面。又由於各地出土資料以男性為主，女性服飾雖不少，分佈較不平均，也更複雜，以下的討論暫以男性的衣衽、髮式和帽式為限。

1) 衣衽形式

受斯基泰文化影響的民族衣飾，不但有實物，也有不少器物上的圖像可以參證。從實物和圖像觀之，上衣以衣襟形式而論，可粗分為三大類。第一大類是對襟，兩片衣襟不交疊，相對合於胸前，腰間繫帶，下身穿長褲：

(1) 最早的例子見新疆南道且末扎滾魯克墓地出土西元前九世紀的一件圓領毛衣(圖35)。^{⑩③} 全衣用毛線織成，長53公分，腰圍74公分，窄袖，袖長20公分。衣襟兩片對開，圓領下端有兩條供栓繫衣襟用的同質料毛繩。從繫繩所在的位置可知，衣服穿上後，兩襟僅能於身前合攏，並不交疊。

(2) 其次是於義大利羅馬西北弗耳奇(Vulci)地方出土，西元前六世紀末的陶罐(圖36)。^{⑩④} 罐上十分細緻地描繪著一位頭戴尖帽，手持戰斧，穿對襟上衣及長褲的斯基泰人。

(3) 另一個例子是黑海北岸庫耳吉普(Kourdjips)塚墓出土屬西元前四世紀的一件金飾(圖37)。^{⑩⑤} 金飾上有一位被髮，一手持矛，一手握一人頭，衣穿對襟上衣、長褲及短靴的武士。

(4) 第四個例子是1992年新疆鄯善縣蘇貝希一號墓地4號墓出土的一件完整褐製淺黃色長袖立領對襟，長96公分的上衣。時代屬西元前500—300年(圖38)。^{⑩⑥}

^{⑩③} 參朝日新聞社編，《樓蘭王國と悠久の美女》(東京：朝日新聞社，1992)，圖版206。

^{⑩④} V. Schiltz, *op. cit.*, p. 393, 圖317。

^{⑩⑤} *Ibid.*, p. 432, 圖365。

^{⑩⑥} 馬承源、岳峰主編，《絲路考古珍品》(上海：上海譯文，1998)，頁90，圖12。其餘對襟式衣服出土的例子還可見於《中國西域民族服飾研究》，同註^{⑤⑦}，頁51-53、57、60-62。

(5) 第五個例子是外蒙古諾音烏拉六號墓所出絲和毛質的完整上衣，衣長117公分，窄袖口寬約24公分，兩襟對稱(圖39)。^⑩時代屬西元一世紀初。

第二大類是套頭式，領口在上，沒有衣襟，也無翻領：

(1) 最好的代表是西伯利亞巴澤雷克(Pazyryk)二、三號塚墓所出毛及麻製上衣(圖40)。^⑪二號墓出土兩件，三號墓出土一件。除了窄的長袖，衣體本身是由前後身共四片織物縫合，胸前無襟，上端有形式不同，供套頭的開口。衣長在104-90公分之間。

(2) 這種套頭式衣服在新疆尼雅也出土一件。1995年在民豐尼雅一號墓地8號墓中出土一件綴邊黃絹衣。衣長130公分，套頭、直領、窄袖、下擺開衩。這一帶屬古代的精絕、鄯善國，此墓時代在東漢末至魏晉之間(圖41)。^⑫

(3) 套頭式衣服在石刻資料中還有很甚多。中亞一帶出土，貴霜時代的人像石刻中有很多穿套頭上衣的。其中頭戴尖帽、身穿長褲和窄袖套頭上衣的，貴霜藝術史學者羅森福(J. M. Rosenfield)稱之為「印度-斯基泰式服」(Indo-Scythian costume)(圖42)。^⑬

(4) 青銅人像資料也有一件。在義大利羅馬以南卡蒲阿(Capua)出土，屬西元前六至五世紀，伊特拉士坎人(Etruscans)的青銅骨灰罐的罐蓋邊緣上有四位騎射之姿的「亞馬遜人」(Amazon)鑄像。她們頭戴尖帽，衣穿短上衣及長褲，腰繫帶。其衣領清楚屬套頭式(圖43)。^⑭亞馬遜人據希臘史家希羅多德的說法

⑩ 梅原末治，《蒙古ノイン・ウラ發見の遺物》(京都：東洋文庫論叢第27冊，1960)，頁55及圖版53、54。

⑪ S. Rudenko, *Frozen Tombs of Siber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 pp. 83-86, pl. 63.

⑫ 《絲路考古珍品》，同註⑩，頁136，圖49。考古報告見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民豐縣尼雅遺址95MN1號墓地M8發掘簡報〉，《文物》，2000年1期，頁4-40。另外新疆洛浦縣山普拉古墓遺址從1983至84年發掘19座墓，出土大量衣物。這些毛織為主的衣物在形式上「多套頭式，和所謂的漢式服裝，左衽胡服相差很大。」這些墓的時代分二期，第一期據碳十四測定年代在距今2295(75至距今2000年左右，第二期距今1960(80年至1715(100年左右。參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洛浦縣山普拉古墓發掘報告〉，收入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新疆文物考古新收穫(1979-1989)》(烏魯木齊：新疆人民，1995)，頁421-469。

⑬ J. M. Rosenfield, *The Dynastic Arts of the Kushan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pls. 22, 38, 58, 59, 136, 137, 137a, 138, 157, 158.

⑭ S. Haynes, *Etruscan Bronze Utensils* (British Museum Publication, 1974)，封面及圖3、4。

是與斯基泰人相鄰通婚，一種擅長騎射，以狩獵為生，極為慍悍的民族。^⑪

第三大類是兩襟相覆，在胸前交叉，而右襟總是在左襟之上，向左斜下形成所謂的左衽：

(1) 這類例子很多，分佈頗廣。當我留心到衣衽形式的問題時，這些幾乎一律左衽的上衣，確實令我驚訝，不能不令我想起孔子所說的左衽戎狄。先列舉幾件在黑海北岸塚墓中出土，由希臘工匠所製，屬西元前四世紀左右著名的金、銀或合金器上的人物裝飾：

a. 梭羅卡(Solokha)塚墓出土的一把金梳頭上有三位武士，其中一希臘騎士在馬上，正持矛與一持盾及短劍的武士戰鬥。騎士身後有一被髮，同樣持盾及短劍的武士。這位武士身穿長褲，窄袖短上衣，中繫腰帶。他的衣襟左右兩片，右襟稍稍疊壓在左襟上，形成左衽的形式(圖44)。^⑫

b. 庫耳·歐巴(Kul Oba)塚墓出土一人物立像金飾牌。此人被髮，一手握杯，一手持一弓袋。身穿長褲、短衣，衣襟明顯交叉，成為左衽(圖45)。^⑬

c. 庫耳·歐巴塚墓出土金項圈的末端各有一騎馬人像。兩人被髮，衣穿長褲，上衣為窄袖短衣，衣襟兩片疊壓，明顯為左衽(圖46)。^⑭

d. 庫耳·歐巴塚墓出土一時代稍晚，約屬西元前四至三世紀的合金罐。罐四周有人物浮雕裝飾。七位斯基泰的武士，或跪或坐，四人披髮，三人頭戴尖帽，但都身穿一式的長褲窄袖短衣。其中兩位因姿勢剛好露出衣襟，可以明顯看出屬左衽(圖47)。^⑮

e. 頓河(Don)上游沃羅列(Voronej)附近查斯帖(Tchastye)塚墓出土一西元前四世紀金銀合金罐。罐四周為人物浮雕裝飾。六位斯基泰的武士，或坐或跪，皆披髮，身穿長褲、窄袖短上衣，其中四人衣襟形式清楚，都是左衽(圖48)。^⑯

^⑪ Herodotus, *The Persian Wars*, translated by G. Rawlinson (N. Y.: the Modern Library, 1942) bk .iv. 110-117.

^⑫ Schiltz, *op.cit.*, pp. 135-6, pl. 102; p. 414, pl. 359.

^⑬ *Ibid.*, p. 192, pl. 142.

^⑭ *Ibid.*, p. 120, pl. 163.

^⑮ *Ibid.*, pp. 171-175, pl. 124-126.

^⑯ *Ibid.*, pp. 390-391, pl. 312.

f. 黑海北岸蓋·默古拉(Gaïmanova Moguila)塚墓出土一金銀雙耳合金缶。缶四周有人物浮雕裝飾。缶上最少有七位斯基泰武士。他們都披髮，身穿一式的長褲和窄袖短上衣，其中兩位衣襟可見的都是左衽(圖 49)。^{⑪⑧}

(2) 其次是1970年在巴爾喀什湖(Balkhash)之南伊塞克(Issyk)地方，發現了西元前五世紀的墓群。其中有一座墓出土一具男屍，穿著極其富麗，除了高聳尖頂的金冠，窄袖的上衣及腰帶上有數千大小的金片裝飾。發掘者依據遺存的金片作了服裝的復原(圖50)。根據復原圖，可知死者所穿是十分典型草原游牧民族的窄袖短上衣和較貼身的長褲。其衣衽是清楚的左衽。^{⑪⑨}墓主的族屬雖難確定，一般認為是沙卡人(Saka)或塞種。

(3) 此外，安息時代的石刻和青銅人像中也有衣襟明顯為左衽的。一件是在今伊朗東南邊境夏米(Shami)神廟出土屬西元前二世紀的青銅王子立像(圖51)。^{⑪⑩}這位王子身穿寬鬆長褲，左衽短衣，腰繫帶。

(4) 另一件是在今伊拉克境內哈特拉(Hatra)出土不明身份的神像石刻(圖52)。^{⑪⑪}此神背有羽翼，右手持一短劍，身穿長褲和左衽窄袖上衣。同一地出土的另一件石刻中的人物，頭戴鷹冠，一手持斧，一手握劍，身穿長褲及窄袖左衽上衣(圖53)。^{⑪⑫}

(5) 1978年在今阿富汗巴克特瑞亞(Bactria)西北不遠的西伯爾罕(Sibergham)發掘到六座約屬西元前後一世紀間的貴霜墓葬，出土金器達二萬件以上。其中四號墓為男性，其身上衣物已朽壞，但從原鑲在衣著上的金飾，仍可完整復原出其衣著的式樣。他的衣著是貴霜統治者所穿典型的窄袖短衣，腰繫帶，下著長褲。衣衽形式據復原圖及發掘者的描述則是「貴霜游牧民典型的左衽」(folded over to the left in typical nomadic Kushan fashion)(圖54)。^{⑪⑬}

^{⑪⑧} *Ibid.*, p. 176, pl. 128.

^{⑪⑨} Renate Rolle, *The World of the Scythian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 49 附有復原圖，但方向顛倒，容易使讀者誤認其衣為右衽。正確的圖版可參見東京國立博物館、大阪市立美術館、日本經濟新聞社編，《シルクロードの遺寶——古代・中世の東西文化交流》，圖版 18。

^{⑪⑩} J. M. Rosenfield, *op. cit.*, pl. 130; J. Harmatta ed., *op. cit.*, p. 148, fig. 11.

^{⑪⑪} *Ibid.*, pl. 145.

^{⑪⑫} *Ibid.*, pl. 143.

(6) 1980年3、4月，新疆樓蘭考古隊在樓蘭古城東北孤台墓地發掘屬東漢時代的墓葬兩座。二號墓(MB2)出土絲織品錦、綺、絹、刺繡等達75件。其中一件絹質冥衣身長15公分，寬8.5公分，袖長6.5公分。腰部兩側各有三根供繫結用的絹帶，領、袖和下擺以黃色絹貼邊，中為褐色絹，其衣襟為左衽(圖55)。^⑬

在上述所涉及的廣大區域內，民族眾多。其民族服飾在衣領上的變化必多於以上所說的。有沒有和中原華夏同樣右衽的呢？以我耳目所及，也有不少：

(1) 第一例是南西伯利亞貝加耳湖西側，時代遠在西元前第三千紀前半期，位於茵亞河(Inya R.)中游左岸的列比笛二號墓葬群(Lebedi II cemetery)。^⑭發掘七座墓中的第七號墓，出土六十歲左右完整男屍一具。身上衣物已朽爛不存，但成排原縫在衣帽上裝飾用的熊、鹿、狼牙仍在，衣服部分的牙飾從頸椎向下排列，到骨盤處向右斜至橈骨，再下至於膝。考古家根據這樣的排列復原出一件窄袖，右衽及膝，腰部束帶的毛皮衣(圖56)。這樣的衣式在當地有多少代表性？資料不足，暫難評斷。但可以肯定右衽在南西伯利亞極早即已存在。

(2) 其次是1992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鄯善蘇貝希墓群一號墓地，發掘一批時代屬戰國至西漢，衣服保存甚好的殘骸。在一號墓地的第十號墓(M10)中出土一具成年男性乾屍，身穿「開襟長袖毛織衣，外套皮大衣，下身穿毛織

⑬ Victor. I. Saridanidi, *The Golden Hoard of Bactria* (New York: Vienna, 1985), *Bactrian Gold* (Leningrad: Aurora Art Publishers, 1985), "The Golden Hoard of Bactria," *National Geographic*, vol. 177(1990), pp. 50-75, esp. 62-63. 較詳盡之報導見 V. I. Saridanidi 原著，加藤九祚譯，〈シルクロードの黄金遺寶——シバルガン王墓發掘記〉，頁110。中文報導可參林保堯，〈西伯爾罕遺寶記〉，《藝術家》，1983年4期；吳焯，〈西伯爾罕的寶藏及其在中亞史研究中的地位〉，《考古與文物》，1987年4期，頁90；林梅村，〈大夏黄金寶藏的發現〉(上、下)，《文物天地》，1991年6期，1992年1期，收入林梅村，〈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語言和宗教新論〉(北京：東方，1995)，頁267-278；陳健文，〈試論月氏考古的相關問題〉，《中國上古史秦漢學會通訊》，1998年4期，頁41-55。

⑭ 附圖見《中國西域民族服飾研究》，同註⑤，頁78，圖129；考古報告見新疆樓蘭考古隊，〈樓蘭城郊古墓群發掘簡報〉，收入穆舜英、張平主編，《樓蘭文化研究論集》(烏魯木齊：新疆人民，1995)，頁106-121。

⑮ Vladimir V. Bobrov, "On the Problem of Interethnic Relations in South Siberia in the Third and Early Second Millennia B.C.," *Arctic Anthropology*, vol. 25, no. 2 (1988), pp. 30-46.

褲」。據所附線描圖，其皮大衣是清楚的右衽。但同一墓地的第十一號墓(M11)葬成年男女及小孩各一人，其中成年男性所穿的同式皮大衣從線描圖看來又是左衽。^{②6}這種左衽皮大衣在同地三號墓地的六號男女合葬墓(M6)中也可看見。^{②7}這些左衽皮大衣應歸入前一大類，為行文方便，附錄於此。值得注意的是同一墓中的人分穿左右衽的衣袍(圖 57)。

(3) 其次是前述新疆營盤15號漢晉之際墓所出的兩件冥衣和墓主身上所穿之衣。兩件非實用的冥衣，據報導在形式上一件是「圓領、右衽、直裾」(編號M15:7)，另一件是「交領、右衽」(編號M15:8)(圖 58)。此墓墓主頭戴面罩，身穿長袖紅地對人獸樹紋，交領、右衽、下擺兩側開衩屬袍，下身著長褲。報導者據死者面罩，隨葬冥衣、四肢纏帛的習俗推測，墓主「可能是一位來自西方從事貿易的富商。」^{②8}如果這個推測可信，則西土亦應有穿右衽衣裝的民族。此衣右衽雖與中國同式，但其下擺開衩至胯，內著長褲，衣式又與中土判然有別。

(4) 1995年在新疆尼雅一號墓地3號墓中出土完整錦袍兩件，分穿於男女墓墓主身上(圖 59)。^{②9}同墓還出一雙有「世母極錦宜二親傳子孫」漢字的織錦手套。男夾錦袍錦面絹裡，斜交領，窄袖，寬擺，兩側開衩，長122公分；女絲綿錦袍錦面絹裡，錦、絹間薄襯一層絲綿，斜交領，窄長袖，長135公分，兩件外衣衣衽方向都是右衽。據研究，此墓墓主係尼雅綠洲精絕國的統治貴族，時代當在漢晉時期，或如王炳華分析應在東漢中晚期。^{③0}另外在男屍身旁的木

^{②6}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鄯善蘇貝希墓群一號墓地發掘簡報〉，《新疆文物》，1993年4期，頁2-3，收入王炳華、杜根成主編，《新疆文物考古新收獲(續)1990-1996》(烏魯木齊：新疆美術攝影，1997)，頁138-149。

^{②7} 同上註，此墓地其它一些墓的衣物亦保存良好，惜附圖十分不清，文字未交待，難以斷定衣襟的形式。

^{②8}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尉犁縣營盤墓地15號墓發掘簡報〉，《文物》，1999年1期，頁15。

^{②9} 附圖照片承王炳華先生提供，謹此致謝。又據出土照片及王先生來函(88年7月11日)，才知《絲路考古珍品》收錄圖版(參註^{③0}，頁111，圖31)顛倒，看起來像左衽，實為右衽。圖版說明說是左衽也是錯誤的。發發掘報告見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尼雅95一號墓地3號墓發掘報告〉，《新疆文物》，1999年2期，頁1-26。

^{③0} 《絲路考古珍品》，同註^{③0}，頁55。參加發掘的王炳華先生相信一號墓地「很可能就是漢精絕

袖上掛著一件長期穿用過的錦面深衣，斜交領，左衽，^⑬長袖，直裾，腰繫絹帶，繫連衣襟。女屍另有一件貼身絹上衣，高領，右衽，衣短，袖長。出土時，女屍身上除了外面的錦袍和貼身的絹上衣，兩衣之間還有一件綢夾衣。這件夾衣絹面絹裡，斜交領，長袖，衣長85公分，袖通長190公分。可注意的是這件衣服的衣服領卻是左衽（圖60）。換言之，同一人身上所穿的內外衣，同時可有左衽的也有右衽的。同一墓地8號墓出土同棺男女乾屍各一具。他們身穿極其華麗的織錦及絹質衣袍，男下身穿棉質，褲角緣錦的長褲，女則著裙。男女上衣長袍都是右衽。^⑭

（5）另一例見於羅森福所著《貴霜的王朝藝術》（*The Dynastic Arts of the Kushans*）一書。書中收有一百六十餘圖，絕大多數為人物像。其中衣衽可考而且為右衽的有一件。這是一件時代較晚，屬西元三世紀末，秣荼羅（Mathura）出土的人物坐像殘石（圖61）。^⑮頭部已殘，身體上的衣飾十分完整。其衣襟為清楚的右衽。這一件為何如此？是特例？或還有其它右衽的例子？目前能掌握的資料太少，有待進一步查考。

長城以外的左或右衽衣式資料，目前能蒐集到的還極不完整。不過從時間和地域的跨度看，我們恐怕必須承認，從西元前第三世紀的南西伯利亞到西元後三世紀的新疆和中亞，衣衽的形式是極其複雜的。籠統分成左、右衽、對襟

王室的墓地」，這些紡織品「均屬漢代風格」，在斷代上，他雖然認為整個尼雅遺址文物可晚到晉，但我們所討論的這一部分應屬漢代，參王炳華，〈尼雅考古收穫及不足〉，《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30期（1998），頁70-79。又林梅村最近根據大英博物館藏斯坦因最後一次在尼雅發掘所得尚未發表的漢簡證明，現在的尼雅遺址雖以三、四世紀以後鄯善時期的文物為主，但此地原為漢代的精絕國所在，遺址時代有可能可以上推到西漢中期以後，參林梅村，〈漢代精絕國與尼雅遺址〉，《文物》，1996年12期，頁53-59；尼雅出土書寫有「漢精絕王」字樣的漢簡簡影可見林梅村，〈漢唐西域與中國文明〉（北京：文物，1998），彩圖18。

^⑬〈尼雅95一號墓地3號墓發掘報告〉（參註^⑫，頁18）圖13·1的線描圖是右衽，報告文字卻作「左衽」。據王炳華先生來信（2000年3月24日）見示，附圖13.1有誤。信云：「圖有誤。據聯綴之衣帶，平日服用，應為左衽。」

^⑭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民豐縣尼雅遺址95MN1號墓地M8發掘簡報〉，《文物》，2000年1期，頁4-40，圖14、15、63、65。

^⑮J. M. Rosenfield, *op.cit.*, pl. 48.

和套頭等形式，實不足以窮盡其變化。我目前所見到的材料似以左衽者稍多；還不容易斷言，何者是其中的主流。鄯善蘇貝希一號和尼雅一號墓地同時存在左衽和右衽衣服，清楚提示我們最少在戰國至東漢這一階段，當地人的衣式特徵或不在衣衽的左右，而在其它方面。^⑬我懷疑早期的毛皮或其它質料的衣服，在衣襟的剪裁上有些可能有左右衽之別；有些則很可能左右襟形式一致，穿著時可左右隨意交疊，因此根本不存在形式上必須左衽或右衽的問題。以後者而言，穿成左或右衽，可能只是習慣而已。

2) 髮式

從斯基泰遺存中所能見到的髮式似不外披髮、辮髮和椎髻三種。所謂披髮，長長的頭髮任其披散而下。披髮的例子在前節中已看到很多，不再多舉。須要補充的是其中又可分為兩種情況：

(1) 頭髮披散而下，不加任何約束，

(2) 雖披髮，在頭上加一環狀髮帶或髮箍，使頭髮可以稍受約束。

前文提到庫耳·歐巴出土合金罐上有披髮的武士。其中兩人對坐，左側一人雙手握矛，披髮。仔細看則可見其頭頂有一圈髮箍或髮帶。這種披髮加髮箍或髮帶的情形，在另一件屬西元前四世紀在黑海北岸托·默古拉(Tolstaia Moguila)塚出土的金質頸圈雕飾人像的頭部也可看得很清楚(圖62)。兩人相對跪著，正在整理一件毛皮的衣服。右側一人完全披髮；左側一人亦披髮，但頭上有一圈清楚的髮帶。貴霜石刻中也有不少戴髮帶或髮箍的例子，前文所引夏米出土的青銅立像即是其中之一。^⑭1984年從新疆洛浦縣山普拉一號墓出土一件，時代斷為漢代的武士像壁掛(圖63)。^⑮原物被剪斷，縫接在一條褲子的下端。出土後經拼對復原，得知它應是毛織壁掛的殘片。上端有一希臘風格的馬身人首怪

⑬ 王炳華先生認為尼雅一號墓男屍的衣服是生前穿著左衽，死後變作右衽，遵循《禮記》的規定，見〈尼雅95一號墓地3號墓發掘報告〉，同註⑭，頁25。但這難以解釋女屍身上內外衣同時有左衽也有右衽的情形。這反而證明精絕國人衣著兩襟交疊，可左可右，不像漢人非右衽不可。王先生在今年3月24日的來信中表示：「關於尼雅三號墓的衣服，我的觀察是：各種式樣(左衽、右衽、套頭等)均見，同時存在。其文化內涵應作怎樣的透析，則可以討論。」

⑭ 其它的例子可參 Paul Bernard, *op.cit.*, pp. 77-79 及附圖。

⑮ 《絲路考古珍品》，同註⑭，圖65。

物，正吹奏一長管樂器。下方是一三分之二臉朝右，手持矛的武士。武士大目高鼻，額頭束帶，繫住披下的頭髮。

此外，1924-1925年蘇俄考古家在內蒙古烏蘭巴圖北約130公里的諾音烏拉(Noin-Ula)發掘到墓葬二百餘座。墓葬曾被盜，出土文物仍極豐富。這些墓中曾出土西漢末及王莽時之漆器銘文，時代應屬西元一世紀初。其中出土的衣服和帽子已見本文它節，其中一件毛織殘片出自第廿五號墓(圖64)。此件甚殘，衣服除部分尖形的領口，基本上已無法看出衣服的樣式。所幸頭部大致完整。頭髮頂部稍殘，從額上的髮箍及耳、頸後的髮髻可以推知他應沒有戴帽，而是用髮箍約束頭髮的頂部，背後的長髮則梳成髻。這樣的髮式在前述黑海北岸出土的合金飾片上已曾見過。

椎髻則是將長髮梳起，盤結於頭頂或腦後，而形成兩種不同的外觀。高聳於頭頂者像秦始皇兵馬俑坑所出土兵頭上所梳之高髻。這正是《史記·陸賈傳》〈集解〉引服虔所說：「魋音椎，今兵士椎頭結」(頁2698)。梳於腦後者則如孫機所說像錘，中國古書中皆名之曰椎髻或椎結。^⑬《漢書·李陵傳》提到匈奴的髮式即為椎髻。^⑭斯基泰人梳髮為髻的習慣可於文獻中考見。羅馬史家蒲魯塔克(Plutarch, 約西元46-120年)在其《希臘羅馬名人傳》的〈克拉蘇傳〉第24節中曾提到：

安息人(Parthians)的樣子十分可怕。他們像斯基泰人一樣，將散亂的頭髮結成一團在頭上。^⑮

這個記載僅說安息人和斯基泰人一樣梳髻，對髮髻的形狀說得並不夠清楚。列寧格勒冬宮博物館收藏一件金飾牌，刻畫一人騎於馬上，正張弓射向一頭奔

⑬《漢書·西南夷傳》顏注：「為髻如椎之形也。」同書〈陸賈傳〉顏注：「椎髻者，一撮之髻，其形如椎。」《後漢書·度尚傳》李賢注：「椎，獨髻也。」孫機引《尚書帝命驗》注：「椎，讀如錘」，認為椎與錘通，並以西安客省莊140號墓所出金飾牌為證，認為椎髻是一種單個的，像一把錘子一樣拖在腦後的小髻。」(孫機，同註①7，頁556)

⑭《漢書·李陵傳》：漢使任立政往匈奴見李陵、衛律，「後陵、律持牛酒勞漢使，博飲，兩人皆胡服椎結。立政大言…勸之，陵墨不應，孰視而自循其髮，答曰：『吾已胡服矣』。」兩人之胡服與椎結當即匈奴之裝束。

⑮ Edmund Fuller ed., Plutarch: *Lives of the Noble Greeks* (New York: Dell, 1959), p. 169. 有關這段話的理解，學者間有些不同，可參 Paul Bernard，同註①2。

逃的野豬，另一騎士似站在樹上拉著樹下的馬。如果注意看張弓騎士的頭髮，就可以發現其垂在腦後的髮髻(圖 65)。

另一件梳髻的例子是從庫耳·歐巴出土的人物金飾牌。金飾牌上兩位持弓而射的武士背對背跨足而立。他們身穿窄袖短上衣、長褲和靴子，衣式和其它黑海一帶出土的金器上所見的完全相同。唯一不同的是他們的髮式。兩人都不披髮，而將頭髮梳起，在腦後束成略呈尖椎狀高高的髻(圖 66)。^④中國古書和圖像中所呈現的「椎髻」，從這兩方金飾牌可以得到印證。椎髻的圖象資料雖然僅見兩例，卻十分珍貴。這證明斯基泰人不完全只是任由頭髮披散而下或加髮箍、髮帶而已。

此外，內蒙古諾音烏拉六號墓室壁上懸掛的一件毛織殘塊(圖 67)也可見到椎髻。殘塊上有頗為寫實，織出的人馬圖像。前方是四匹或回首或低頭，繫有韁繩的馬，其後有三人。其中左端一人僅見部分上身，另二人則可見頭臉和上半身。二人身穿對襟的衣服，衣服上似有菱形的花紋。這種花紋和貴霜王所戴尖頂帽上的花紋十分類似(參圖 75)。右側一人臉朝前約三分之二，眼鼻約略可見，頭上似戴有略呈圓形的帽子，但也有可能僅是頭髮。前額頂露出一些膨鬆的頭髮，頸後露出髮髻。中間一人臉為正側面朝左，頭頂前方也有一些膨鬆的頭髮，腦後有同樣式樣的髮髻。這種髻的形式和黑海北岸出土金飾牌上所見的椎髻(參圖 65、66)相近。

辮髮也是重要的一類髮式。為引證和行文的方便，這一類將於後文再說。不論辮髮或椎髻都需要先用梳子梳理頭髮。梳子也曾出土，前文所引那件有武士格鬥裝飾的金梳即為一例。

綜合以上對衣衽和髮式的追索，我們或許可以暫作如下結論：孔子說戎狄或山戎被髮左衽，應非憑空虛構。目前雖然還找不到任何戎狄被髮左衽的直接可靠證據，但這些「域外」的線索可以幫助我們想像歐亞草原上的服飾特色以及與戎狄服飾的可能關係。從這些域外的資料，我們也認識到孔子的話只是舉戎狄服飾的一二特徵而言。戎狄的服飾樣式應非全然披髮，也不僅是左衽，應遠比孔子所說的複雜。

3) 帽式

受斯基泰文化影響的民族很多，他們的帽式正如他們的衣式、髮式，應該

^④ Schiltz, *op.cit.*, p. 180, pl. 130.

是多種多樣的。即以草原游牧及周邊地區出土的實物和圖像資料而言，在質料和形式上就很不一律。^⑭不過，其中有一種尖頂帽特別值得注意。因為它出現的較多，也較為普遍，幾乎可以當作斯基泰帽式的代表。

最早提到這種帽式特徵的是希臘史家希羅多德。他在記述波斯軍隊的組成份子時，曾提到斯基泰人的裝束和裝備：^⑮

沙卡人(Sacae, Saka)或斯基泰人，穿著長褲，頭戴一種高而尖頂的帽子。他們配備具特色的弓和短劍。此外，他們也使用一種稱之為沙格瑞的戰斧。他們事實上是阿米奇·斯基泰人。可是波斯人稱他們為沙卡人，因為波斯人稱呼所有的斯基泰人為沙卡人。

他對裝束的描述可以說相當準確。從希臘、義大利、黑海北岸、中亞一直到中國的新疆都可以找到相關的物證。沙卡或斯基泰人的青銅短劍和戰斧，也有不少實物出土。^⑯波斯人稱他們為沙卡人也完全證實。波斯王大流士(Darius)於西元前510年以前，在今伊朗畢西斯屯(Behistun)地方留下有文字題記的紀功石刻畫(圖68)。^⑰這幅巨大的崖壁雕畫描繪成列被細繫的俘虜出現在大流士王的面前。俘虜的最後一人穿著和其他的人都不相同，長袖短上衣配長褲，頭戴高高的尖頂帽。他的身旁有多種語文的榜題「Sakuka Saka」，指明他是「戴尖帽的」沙卡人的王 Sakuka。^⑱

⑭ Elis H. Minns 曾收集游牧民族的服裝資料，繪成圖，可參其 *Scythians and Greeks: A Survey of Ancient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on the North Coast of the Euxine from the Danube to the Caucasus* (Cambridge [Eng.]: University press, 1913), reprinted by Biblo and Tannen (New York, 1971), chapter IV, 圖8、12 新疆也曾出土不少西元前約一千年至三、四百年左右西域民族的衣帽，可參《中國西域民族服飾研究》，同註⑤⑦，頁50-67；巴音格楞蒙古自治州文管所，〈且末縣扎洪魯克古墓葬1989年清理簡報〉，《新疆文物》，1992年2期，頁1-14；〈鄯善蘇貝希墓群一號墓地發掘簡報〉，《新疆文物》，1993年4期，頁1-13；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魯番地區博物館，〈鄯善縣蘇貝希墓群三號墓地〉，《新疆文物》，1994年2期，頁1-20、32。

⑮ Herodotus, *op. cit.*, bk. vii. 64.

⑯ 例如 Max Loehr, "Ordos Daggers and Knives," *Artibus Asiae*, vol. 12 (1945), pp. 23-83；杜正勝，同註⑥⑤。

⑰ Schiltz, *op. cit.*, p. 367, pl. 274；較清楚的原石圖版見 Renate Rolle, 同註①⑨, p. 50.

自 1920、30 年代以後，陸續有不少新材料出土，也有許多新的研究。本文只打算補充若干較新或較爲大家所忽略的資料，說明這種帽式不但在草原游牧民族間有代表性，也深深印在周邊農業、綠洲民族，尤其是古代地中海、中亞和東亞中國人的腦海裡，成爲藝術傳統的一部分。以下列舉的材料大致以所屬時代的早晚爲序：

(1) 1985 年新疆且末縣扎滾(或作洪)魯克五號墓出土一頂尖頂棕色氈帽(圖 69)。^{④⑥} 1998 年 9 月在上海博物館的絲綢之路的特展上有幸親見目睹。帽子高 32.7 公分，口緣直徑 28 公分。用兩片不等邊三角形的棕色毛氈，以黃色毛線對縫而成，形成一個不等邊細長的尖頂。尖頂內填充有氈塊，口緣兩側有外翻的邊。由於尖頂斜向一邊，我曾希望判定此帽戴在頭上的方向，但難以斷定。展覽圖錄說：「這種尖頂向後彎曲的氈帽是扎滾魯克墓葬出土的多種樣式帽中的一種，是古代游牧民族喜愛的一種帽子樣式。」^{④⑦} 爲何說這是一頂「向後彎曲」的氈帽，並不清楚。不過在前引畢西斯屯石刻中的斯基泰俘虜，的確戴著一頂帽尖向後彎的尖帽。這種向後彎的尖頂帽在更早亞述人的石刻中也曾出現。因此我們可以知道尖頂最少有朝前彎和朝後彎兩式。^{④⑧} 扎滾魯克尖帽的時代據判定屬西元前 800 年。如果這個斷代可靠，這可能是歐亞草原出土品中較早的一頂尖帽實物。^{④⑨}

^{④⑤} 對石刻銘文較早的研究見 A. Campbell Thompson, *The Sculptures and Inscriptions of Darius the Great on the Rock of Behistun in Persia* (London: British Museum, 1907)。此書不得見，相關研究轉見 Ellis H. Minns, *op.cit.*, pp. 58-61; Renate Rolle, *op.cit.*, p. 47; Julius Junge, *Saka-Studien: der ferne Nordosten im Weltbild der Antike* (Leipzig: Dieterich, 1939, 1962), pp. 62-66. 較新的討論見 M. A. Dandamayev, "Media and Achaemenid Iran" in J. Harmatta ed., *op. cit.*, pp. 43-52.

^{④⑥} 《絲路考古珍品》，同註 ^{④⑥}，圖 11。

^{④⑦} 《絲路考古珍品》，同註 ^{④⑥}，頁 246-247。其餘帽式請參《中國西域民族服飾研究》，同註 ^{⑤⑦}，頁 58。

^{④⑧} 向後彎的帽式可參 Julius Junge, *Saka-Studien: der ferne nordosten im weltbild der antike* (Scientia Verlag Aalen, 1939, 1962)，附圖一：沙卡與斯基泰人帽式之對照圖。

^{④⑨} 據新疆考古學家王炳華在〈孔雀河古墓溝發掘及其初步研究〉一文中的報導(見《新疆社會科學》，1983 年 1 期，或其論文集《絲綢之路考古研究》(烏魯木齊：新疆人民，1993)，頁 183-201)，指出 1979 年在孔雀河下游羅布泊地區古墓溝發掘古墓 42 座，其中較早的墓群中

這頂尖帽對印證西元前五世紀希羅多德的記載和希臘陶瓶上戴尖頂帽的斯基泰人可以說有極大的幫助。新疆且末和希臘人所熟知的黑海北岸雖相隔甚遠，但在活躍的草原絲路上，民族移動和文化流播不可謂不頻繁。相類似的帽式在兩地出現，應該不是偶然的巧合。因為在廣大的草原區和周邊世界還可以找到其它的證據。例如黑海北岸出土西元前四世紀的金銀器上，就有不少戴尖帽的斯基泰武士圖像，前文已及，不再重複。

(2) 大英博物館藏西元前510-490年間伊特拉士坎骨灰罐罐蓋青銅騎士像(圖70)，^⑮義大利卡蒲阿出土。1997年12月參觀大英博物館時得見實物。骨灰罐已失，僅餘蓋上的騎士像，其中類似造型的共四件，置於同一展覽櫃中。頭戴長尖帽的騎士坐在前腿躍起的馬上。騎士作出回身彎弓射箭的姿勢。這種回身射箭的姿勢也見於前文提到同出於卡蒲阿的伊特拉士坎骨灰罐。俄國古史學者羅斯托夫茲夫(M. Rostovtzeff)曾對此姿勢作過特別研究，指出這是斯基泰藝術的特色，稱之為「Parthian shot」。^⑯這一點很重要，因為在下文中，我們

有死者頭戴尖頂氈帽，氈帽上或插鳥羽，據C14測定時代屬距今3800年左右；1978年在哈密五堡發掘古墓29座，C14年代為距今3000年上下，死者頭戴尖頂氈帽，身穿皮大衣，腳登高筒皮靴。所言如屬可信，則尖帽實物之時代可上推到西元前一千餘年。可惜同墓出土不同物件的C14年代測定數值差距頗大，是何原因，不明。墓葬時間因此至今仍有不同的意見。據王炳華文所附插羽的尖頂帽圖，尖帽之頂較低矮，在形式上和扎滾魯克所出之高聳尖頂頗不相同，反與樓蘭出土的插羽尖帽極為類似(古墓溝出土尖帽較佳圖影見《樓蘭王國と悠久の美女》，同註^⑩，頁73，圖180；樓蘭尖帽有多件，可參F. Bergma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es in Sinkiang* (Stockholm: Tryckeri Aktiebolaget Thule, 1939), pls. 10, 11, 26; Vivi Sylwan, *Woollen Textiles of the Lou-lan People* (Stockholm: Tryckeri Aktiebolaget Thule, 1941), pls. VII, VIII)。樓蘭古墓時代據信在西元前二世紀至西元後四世紀之間。

^⑮ 大英博物館藏品編號：GR 1856.12.26 796-800。

^⑯ M. Rostovtzeff, "The Parthian Shot,"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vol. 47, no. 2 (1943), pp. 174-187; T. Sulimirski 認為這種姿勢的斯基泰騎士已出現在西元前九世紀兩河流域寧祿(Nimrud, 885-859 B.C.)王宮的浮雕裡，參所著"Scythian Antiquities in Western Asia," *Artibus Asiae*, vol. 17 (1954), pp. 282-318; 較新的研究可參Esther Jacobson, "Mountains and Nomads: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Origins of Chinese Landscape Representation,"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vol. 57 (1985), pp. 133-180, esp. 137-138.

將會看到這種騎射之姿在漢代的畫象石中也經常出現。這裡想強調的是西元前六至五世紀伊特拉士坎人印象中的亞馬遜人是戴著高而尖的帽子。這種帽子的特點在於稍稍呈弧形往前彎曲。這個特點在前引庫耳·歐巴出土的合金罐上，以及中國境內出土的戰國瓦當和青銅器上也可以看見。後二者請詳見下文。

(3) 巴黎羅浮宮藏西元前四世紀銀質鑲金野豬頭形角杯(圖71)。^⑫此器原出土地不明，一度收藏於德國，後流入羅浮宮。其造型風格和列寧格勒冬宮博物館所藏黑海北岸希臘殖民地所出金銀杯器基本一致。杯底作野豬頭形，杯口部分有斯基泰裝束之人物裝飾。其中一人手持矛，腰繫弓袋，頭戴一微微前彎的三角尖帽。其帽式與前文提到庫耳·歐巴出土合金器上者基本相同。值得注意的是他們的尖帽有同樣形式的護耳。

(4) 1995年在新疆尼雅一號墓地第8號墓中出土一頂完整織錦尖頂帽，帽後有兩條軟質的帶子(圖72)。帽頂呈尖形，並沒有微微前彎的帽尖，但帽的前部較陡，後部較緩，仍給人一種帽尖前傾的感覺。這種帽式和許多漢畫中所見的極為類似。其時代據王炳華先生之說，當屬漢代。但考古簡報認為應在魏晉前涼時期。^⑬

(5) 頭戴尖帽的人物圖像在西元前、後一世紀的西亞、中亞及印度的貴霜王朝錢幣和石刻中甚多。他們尖帽的帽頂微微前彎的特徵和我們在義大利卡蒲阿、黑海北岸、山東臨淄所見十分相近。舉例言之：

a. 西元前一世紀中期，在今土耳其寧祿·達(Nimrud Dagħ)地區，由安提歐克一世(Antiochus I, 69-34 B. C.)修建的眾神及陵墓石刻建築群中，有許多安提歐克一世為紀念其先祖而修的巨大神像及國王的立像。立像旁有些榜題尚存。從安提歐克自己和其波斯先祖(可能是Xerxes)的像，我們可以清楚看見他們都戴著尖頂，頂尖向前彎的帽子(圖73)。^⑭帽子上有類似菊花瓣的圖案裝飾。

^⑫ 此件資料承畢華雪教授(Michèle Pirazzoli-T'serstevens)示知，謹此致謝。相關報導見J. Charbonneaux, "Rhyton Greco-Scythe," *Revue du Louvre*, vol. 12(1962), pp. 295-296.

^⑬ 見注^⑫王炳華文及注^⑩。1987年湯池在〈孔望山造像的漢畫風格〉一文中(參《考古》，1987年11期，頁1013)曾蒐集不少材料，並進一步分出無翅、單翅和雙翅三種。翅似乎意指一種硬質的帽飾，畫像中的表現方式有些也容易使人產生這樣的印象。現在從出土實物可知所謂的帽翅應該是軟質的帽帶。

^⑭ J. M. Rosenfield, *op.cit.*, pls. 151, 152.

b. 波士頓美術館(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收藏有一件安那脫利亞高原東部出土青銅製之尖帽，其形制和寧祿·達石刻上所見國王戴的尖帽，極為相近(圖74)。^⑮

c. 在恒河上游新德里東南秣荼羅(Mathura)出土西元一世紀人物戴帽頭像殘石(圖75)。^⑯其帽表面有菱形及圓圈構成的紋飾，帽形高聳，帽頂呈尖形而微微前彎。這樣的帽式在秣荼羅出土的石刻人像中頗為不少(圖76)。^⑰值得注意的是秣荼羅另一立柱上的全身立像。此一人物身穿套頭窄袖短衣、長褲，腰繫帶，頭戴一尖頂帽，帽尖亦微微前彎(圖42之2)。從此像人物的全身穿著更能看出和斯基泰文化之間的關係。

d. 在印度河上游，史瓦特(Swat)南方龐尼耳(Buner)一佛教建築出土三件階梯扶手上的浮雕。其中一件是一群著斯基泰裝束的樂人(圖77)。^⑱這些樂人手中拿著不同的樂器，衣上穿著窄袖短衣，長褲，頭上戴著微微前彎曲的尖帽。時代屬西元一世紀。他們所戴尖帽的一個特色是帽子口緣近兩耳處有長長的帶子，似是護耳或可繫在頸部的帽帶。同樣帽式和裝束的斯基泰人除了可見於西元前六、五世紀的希臘陶瓶，也見於西元一至三世紀羅馬帝國時代的石棺裝飾雕刻中(圖78)。

e. 在貴霜及貴霜建立王朝以前中亞的錢幣上有許多統治者的肖像或騎馬像。這些人物裝束上的一大特色就是身穿和上述石刻人物同式的衣服，頭上戴著尖頂帽(圖79)。^⑲

(6) 江上波夫著《ユウラシア古代北方文化》一書中曾著錄一件他稱之為「匈奴騎馬像」的青銅器(圖80)。^⑳書中未說明出土地及時代。護雅夫在《世界考古學大系》中以為此器為西元前五至二世紀之物，來自內蒙古之綏遠地方。

⑮ 此件照片承杜德蘭教授(Alain Thote)贈送，謹此誌謝。

⑯ J. M. Rosenfield, *op.cit.*, pl. 16.

⑰ *Ibid.*, pls. 4, 14, 15, 19, 22, 73.

⑱ *Ibid.*, pl. 58; S. Czuma, *Kushan Sculpture: Images from Early India* (Cleveland, Ohio: 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 1985), pl. 87.

⑲ J. M. Rosenfield, *op.cit.*, 附錄錢幣圖版: nos. 14, 208-250, 281。

⑳ 參江上波夫，同註⑨，圖版四。我向多位日本學者以及江上波夫氏打聽這件器物的下落，迄今尚無結果。

⑥①從刊佈的不甚清楚的圖版看，這確是一件北方游牧民族的遺物。一位騎士騎在一匹停息狀的馬上，正張弓射箭。其弓的形狀和在黑海北岸出土的騎射像(圖 81)以及前文提到義大利卡蒲阿青銅骨灰罐上的那位騎士所用的弓相當類似。更有趣的是他的衣裝。他的衣裝不是很清楚，不過尚可辨認出上身穿窄袖短上衣，下身穿長褲，腰部有束帶。頭上的帽子和臉部已分不清，但帽子微微前彎的尖頂尚清晰可見。這位騎士是不是「匈奴」則難斷言，下文將再細論。

現在我們可以再將前文所說漢畫胡帽的三種類型和斯基泰藝術品上所見的帽子作一對比，可以發現它們在帽型上有頗為對應的關係：

例如第一型最單純的尖頂帽，沒有護耳或帽後的飾帶，不但可見於秣茶羅出土的石刻人像(圖 42 之 2)，義大利卡蒲阿出土的騎射人像上(圖 43)，也見於羅馬圖拉真皇帝(Traianus, 西元 98-117 年)紀念擊敗多腦河下游達西亞人(Dacians)的錢幣上(圖 82)。^{⑥②}從錢幣背面銘文(Dacia capta)可確知錢上描繪的是被俘虜的達西亞人。他低頭坐著，一手支著臉頰，另一手旁放著戰斧，兩腿交疊，身上衣服的形式不很清楚，頭上卻明白戴著一頂形式簡單的尖帽。達西亞人所在的多腦河下游正是斯基泰文化分佈的西緣。

第二型尖頂帽有護耳，可見於西元前六世紀末義大利弗耳奇出土的彩繪陶罐(圖 35)，黑海北岸庫耳·歐巴出土的合金罐(圖 47)和羅浮宮所藏的羅馬石棺雕像(圖 71)。這些護耳頗長，垂下的部分似乎可以繫於頸部。這樣戴護耳尖帽的斯基泰人像在西元前六、五世紀的希臘陶瓶上出現的十分普遍，可見之例超過四百。^{⑥③}

第三型尖帽在帽後部有可飄起的帶子，可見於尼雅出土的錦帽實物(圖 72)，也見於許多貴霜錢幣(圖 83)。^{⑥④}以圖 78 所見這枚貴霜銀幣來說，兩面各有一戴帽的人像。一位騎在馬上，一手前舉，頭戴前彎的尖頂帽，帽後有二飄帶；另

⑥① 江上波夫，《世界考古學大系》(東京：平凡社，1962)，卷 9，頁 150。Otto J. Maenchen-Helfen, *The World of the Hu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p. 205，謂此像來自鄂爾多斯地區。中國歷史博物館主編，《中國古代史參考圖錄——秦漢時期》(上海：上海教育，1990)，頁 57，說明此器出土於諾音烏拉匈奴王墓，則顯然有誤。

⑥② Lino Rossi, *Trajan's Column and the Dacian Wars*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71), p. 40.

⑥③ Maria F. Vos, *Scythian Archers in Archaic Attic Vase-Painting* (J. B. Wolters / Groningen, 1963).

⑥④ 轉見 J. M. Rosenfield, *op.cit.*, pl. XV, no. 281.

一面的人為立姿，一手前伸，一手握杖，頭戴完全同形有二飄帶的尖帽。這枚錢幣上刻畫的帽形十分明晰。而有這樣戴飄帶尖帽人物的錢幣可以上推到貴霜入主印度的早期，也就是西元一世紀的早期。據羅森福研究，這類的銅錢分佈甚廣，在印度的秣荼羅、白夏瓦(Peshawar)和俄屬土耳其斯坦(Russian Turkestan)都曾大量發現，證明發行此幣的貴霜王朝在中亞一帶必曾一度甚有勢力。^{①⑤}他們的影響力也一度深入中國的新疆，已有無數出土物可以證明。^{①⑥}在新疆南路的尼雅出土幾乎完全同型的帽子，並不令人驚訝。

一 型	 參圖 7	 參圖 42 之 2	 參圖 43 之 2	 參圖 82
二 型	 參圖 3 之 2	 參圖 36	 參圖 47 之 2	 參圖 78 之 2
三 型	 參圖 29	 參圖 72	 參圖 83	

三種帽式比較表

^{①⑤} Ibid., pp. 18-19.

^{①⑥} 可參王炳華，〈古代新疆塞人歷史鉤沉〉，《絲綢之路考古研究》，同註^{①④}，頁210-230；小谷仲男，〈關於在中國西域發現的貴霜硬幣的一些想法〉，收入《十世紀前的絲綢之路和東西文化交流》，同註^{③③}，頁383-391。

以上新疆尼雅出土的尖頂帽實物以及貴霜錢幣上所見到的尖帽，使我們不能不注意到月氏。匈奴興起前，勢力原本甚大的月氏可能正是戰國及漢畫中胡人形象的一個藍本。月氏原居地何在？學者間頗多爭議。不過據文獻，戰國時月氏原居敦煌、祁連之間，東與匈奴、東胡為鄰，匈奴一度受其節制。後匈奴之冒頓擊敗月氏，月氏西去，匈奴才成為西域及華北草原帶的盟主。換言之，在匈奴興起前，月氏的勢力應曾一度遠遠東伸（燕下都出土的尖帽人，江上波夫在綏遠所獲之戴尖帽張弓騎士不知是否即是他們的身影？），而與華夏諸邦活動的區域相鄰，並有頗多的接觸。月氏人高鼻深目、戴尖頂帽的特徵很可能令蒙古種的華夏諸邦印象特別深刻。中國的畫工、石匠就以他們的外貌特徵為典型，留下了像齊臨淄半瓦當上所見那樣的騎馬尖帽胡。月氏西遁，草原盟主易為匈奴。中原的畫工並沒有太多機會見到真正的胡人，似乎也無視於歷史的流轉而固守職業中的傳統，仍以月氏的形象代表胡人。在漢代邊塞如內蒙的和林格爾、鳳凰山地區，不論是畫工或僱請他們的主人，都有機會見到真正的胡人，因此描繪胡人就有可能較近乎真實。目前資料不夠充分，姑立此說，俟考。

在更早的西周甚至殷商時期，華夏民族即可能已和高鼻深目的白種人有所接觸，並在藝術品中留下痕跡。例如前引陝西扶風召陳村西周建築遺址中所出的具有白種人特徵的蚌雕人頭像。^{①⑦}由於商周時代這樣的資料太少，我們尚難以估計這件雕刻在造型藝術傳承上的意義。有一派意見認為中國史上的月氏可能即是斯基泰人的一支。如果此說可信，又如果饒宗頤先生認為「胡」係來源於最早利用馬和戰車的胡里安人(Hurrian, Hrw, Hur)，商、周時之混夷或緄夷即胡之說可信，則華夏之民與白種人之接觸可以上推得更早，^{①⑧}那麼漢畫胡人形

^{①⑦} Victor H. Hair, "Old Sinitic Myag, Old Persian Magus, and English Magician," *Early China*, vol. 15(1990), p. 32, 曾引用一件安陽出土的骨雕頭像，被髮高鼻深目大嘴，面型上有白種人的特色。但此頭像的來歷不甚清楚，是否必為商代之物，有待查證。

^{①⑧} 初步討論可參 K. Enoki, G. A. Koshelenko and Z. Haidary, "The Yüeh-Chih and their Migrations," in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 vol. II, pp. 171-189, esp. 174; A. K. Narain, "Indo-Europeans in Inner Asia" in Denis Sinor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151-176; 饒宗頤, 〈上代塞種史若干問題〉, 《中國文化》, 8期(1993), 頁165-170; 陳健文, 〈月氏民族及其與早期東西交通的關係〉,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1996, 頁105-113。

象的來源也就要跟著上溯。這樣的線索目前畢竟太過模糊，須要等待更多的材料來證明。

綜合起來看，在漢帝國出現以前，凡曾與受斯基泰文化影響的游牧民接觸的周邊民族，不論是地中海的希臘人、羅馬人、西亞的波斯人、中亞的貴霜和東亞的中國人，都曾相當一致地注意到這些不同游牧民在裝束上的類似特徵。類似之處約而言之不外：

- (1) 被髮、辮髮、椎髻或戴尖頂帽
- (2) 上身穿窄袖短衣，衣領有套頭、對襟、左右衽交疊爲主的三式。以受斯基泰文化影響的遺物而言，左衽者似乎較多。
- (3) 腰束帶
- (4) 下身穿長褲
- (5) 腳穿靴

這樣的裝束特點不但在草原游牧民族間延續極久，有些爲周邊農業或半農半牧的民族所接受(如中國的趙武靈王、波斯的統治者)，甚至在周邊民族的圖象藝術中留下記錄。兩漢時期壁畫和石刻中所描繪的「胡人」，從其面貌和衣裝可以證明當時的畫工並不是如實地描繪當代的胡人，而是依據一種自漢代以前即已形成，深植於漢民族記憶中的「胡人典型」。這個典型很可能是與斯基泰文化有關的某些白種民族。他們可能是月氏或更早於月氏的民族。

4. 漢畫中「胡人」的種屬問題

限於資料，目前我們還無法較明確地掌握不同時代、不同地域游牧民在外貌和服飾上的特徵，要認定漢畫中的胡人到底是誰？仍是一個十分困難的工作。過去有不少學者認爲漢畫中的胡人是匈奴，^{①⑥}也有人認爲是烏桓、鮮卑，^{①⑦}還有人但以胡名之，不特別指實其種屬。^{①⑧}如果前文所說漢畫中胡人的形象多出自格套之說尚可接受，一個不可避免的結論是：漢畫中的胡人，除少數例外，

^{①⑥} 孫機，〈洛陽金村出土銀著衣人像族屬考辨〉，《考古》，1987年6期，頁555-561；李衛星，〈論兩漢與西域關係在漢畫中的反映〉，《考古與文物》，1995年5期，頁55-56；趙成甫、赫玉建，〈胡漢戰爭畫像考〉，《中原文物》，1993年2期，頁13-14。

^{①⑦} 李逸友，〈略論和林格爾漢墓壁畫中的烏桓和鮮卑〉，《考古與文物》，1980年2期，頁109-112。

^{①⑧} Zheng Yan, *op.cit.*, pp. 50-59.

並不能真實反映特定的匈奴、烏桓、鮮卑或其它種屬民族的外貌，我們只能含糊籠統以胡人去認識他們。

漢代胡人的形象，絕大部分見於西元二世紀的石刻、壁畫和器物。其造型淵源則見於先漢的歐亞草原及周邊國家的文化遺存。令人困惑的是，戴著各式尖帽的胡人並不見於時代屬戰國至西漢初的鄂爾多斯式金屬飾牌。過去幾十年從鄂爾多斯到遼東出土了不少這時期游牧民族的墓葬和文化遺存。腰帶飾牌有些以游牧民的形象和活動為內容，最能反映出游牧民如何塑造自我的形象，或者說草原周邊社會的工匠依游牧民的喜好，去塑造他們的形象。

依目前所能考見的，飾牌上的人物幾乎都披髮或辮髮，沒有戴帽的。例如遼寧西豐西岔溝出土的飾牌上有左右相向的二人，二人騎在馬上，一手握轡，一手上舉，衣飾不清，無法看出左右衽，但頭髮都清楚是披髮(圖84)。^{①②}同地所出另一件飾牌(另盧芹齋舊藏一件，J. Rawson, E. Bunker 編《中國古代與鄂爾多斯青銅展覽》(*Ancient Chinese and Ordos Bronzes*)收錄一對)，其上有二人坐在馬車中，一人站立於車前。站立的人穿窄袖上衣、長褲、靴，衣衽不明，腰佩短劍，披髮；車中兩人身體不可見，亦為披髮；西岔溝另一件飾牌上只見一人騎於馬上，約略可見其人為披髮(圖85)。^{①③}陝西澧西客省莊140號戰國末至西漢初墓中出土兩件內容相近的銅飾牌，(另盧芹齋有兩件，J. Rawson, E. Bunker 前引書收錄一件)兩側有兩馬，中間有二人相抱角力。二人上身衣飾不明，下身皆著長褲，兩人的頭髮也是披髮(圖86)。^{①④}在這些游牧民自己製造或由其

①②《鄂爾多斯式青銅器》，同註③③，頁73；孫守道，〈匈奴西岔溝文化古墓群的發現〉，《文物》，1960年8期，頁25-35。

①③《鄂爾多斯式青銅器》，同註③③，頁96；Alfred Salmony, *Sino-Siberian Art in the Collection of C. T. Loo* (Paris: C. T. Loo, Publisher, 1933), pl. XXI; Jassica Rawson, Emma Bunker, *Ancient Chinese and Ordos Bronzes* (Hong Kong: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of Hong Kong, 1990), pl. 228.

①④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澧西發掘報告》(北京：文物，1962)，頁138-140及圖版103。《鄂爾多斯式青銅器》，同註③③，頁83。M. I. Rostovetzeff, *Le Centre de l'Asie, la Russie, la Chine et le style animal* (Prague: Seminarium Kondakovianum, 1929)，著錄的一件銅飾牌(該書圖版XI, no. 55)，和澧西客省莊140號出土者(K140: 7)幾乎一樣。又見A. Salmony, *op. cit.*, pl. XXI; J. Rawson, E. Bunker, *op. cit.*, pl. 221.

他民族為他們製作的銅飾牌上，^{①75}披髮可以說是典型的髮式。

此外，辮髮也是重要的髮式之一。最近《文物》報導，^{①76}1973年在內蒙古翁牛特旗解放營子鄉泡子村出土一對透雕長方形銅牌飾，邊框內有馬車，馬車前立一人。構圖形式和前述西岔溝出土及盧芹齋舊藏者十分相似。不同的是站立者的長髮，很清楚不是披下，而是梳成長長的辮子拖在腦後(圖87)。在遼寧平岡出土的一件幾乎和解放營子鄉泡子村一模一樣，但僅存右半的銅飾牌上，也可以看見腦後拖著長辮的人物立像(圖88)。^{①77}這幾件銅飾牌加上前文提到波士頓美術館所藏手持鳥頭柱，垂辮的青銅立人，以及內蒙古諾音烏拉六號墓中所出四條剪下的髮辮實物，^{①78}說明中國北方的游牧民除披髮、梳髻，毫無疑問也辮髮。^{①79}

有人或許會指出在諾音烏拉發掘的西元前後的匈奴墓中曾出土了尖帽，^{①80}

①75 關於游牧民的冶金技術可參 Karl Jettmar, "Metallurgy in the Early Steppes," *Artibus Asiae*, vol. 33(1971), pp. 5-16. Emma C. Bunker 以河北燕下都第30號墓出土的為例，認為有些應該是燕人為了和游牧民交易，特別依游牧民的需要和喜好的式樣製造的，這正如同希臘工匠為黑海北岸斯基泰人所製的金銀器一樣。他也提到燕的工匠也可能在燕亡之後北入草原，為游牧民服務，而製造月氏和匈奴墓中飾牌等物的工匠則可能游牧民和中國人皆有，參所著 "Dangerous Scholarship: On Citing Unexcavated Artefacts from Inner Mongolia and North China," *Orientalism*, June 1989, pp. 52-59, esp. 58-59; "Gold Belt Plaques in the Siberian Treasure of Peter the Great: Dates, Origins and Iconography" in Gary Seaman ed., *Foundations of Empire: Archaeology and Art of the Euroasian Steppes*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Press, 1992), pp. 201-222.

①76 龐昊，〈翁牛特旗發現兩漢銅牌飾〉，《文物》，1998年7期，頁42-43、78。

①77 《東北文化》，同註⑨，圖146，頁127。

①78 參梅原末治，同註⑩，圖版83。

①79 另一件值得注意的例子是雲南晉寧石寨山一號墓出土的銅斧上有一刻畫清晰，作風十分寫實高鼻深目的人頭像。參《雲南青銅器》，同註⑨，圖121。這個人頭上梳著兩條又長又大的辮子。此人面貌絕非當地土著，而應屬高加索白種人。這樣裝束的人為何會出現在西漢中晚期中國西南部墓葬出土的青銅器上，十分值得玩味。

①80 例如《匈奴史論文選集》，同註⑪，頁398，提到諾音烏拉六號墓在「通道南邊還有一頂相當粗劣的帽子。它的形狀，道爾吉蘇榮認為與現時蒙古人戴的尖頂帽差不多」。

可見匈奴人也戴尖帽，只是未見於飾牌而已。可是在此地發掘的上百座大小型墓葬中，出土的幾頂帽子沒有一件和漢畫所見的相近，有人以「尖帽」形容這些帽子並不正確。梅原末治曾對諾音烏拉的發掘有較詳盡的報導。^⑧根據他的報導，諾音烏拉六號墓出土兩頂毛皮帽，一頂絲帽。兩頂毛皮帽兩側有護耳，帽頂皆幾乎為平頂(圖89)。絲帽兩側有繫帶，帽頂從正面看狀若尖頂，從側面看則接近梯型，平頂較窄，前後呈弧形向下擴大成為帽簷(圖90)。第十二號墓也出土絲帽一頂，帽子周圍為圓形，頂完全為平頂，梅原末治稱之為平圓帽(圖91)。第四號墓所出殘帽帽蕊，因過於殘碎，帽形已難辨認。漢畫中的人物通常都是側面，戴的帽子也是側面形象，和諾音烏拉以上所見帽形可以說完全不同。

近幾十年在內蒙鄂爾多斯一帶發掘了不少從春秋至兩漢之際，被認為是戎狄、林胡、樓煩或匈奴的墓葬。^⑨這些墓葬沒有出土衣服或帽子，但出土不少動物紋的金、銅、鐵質帶勾、腰帶牌飾和一件精美的金冠飾(圖92)。這件金冠飾出土於內蒙古伊克昭盟阿魯柴登以南的古墓中。此地分佈著密集的早期匈奴墓葬。金冠飾包括鷹形冠頂飾和冠帶兩部分。冠頂鷹體以金片打成，鷹頭及頸部則是松綠石所製。冠帶部分為厚金片錘打成半球面體，其上有浮雕的狼咬羊圖案四組，前後左右對稱。^⑩我們關心的是這樣的冠飾如果復原，應是一頂什麼樣的帽子。可以幫助我們推測帽形的是鷹形冠頂底部的扇形斜面以及和金冠帶之間的關係。事實上《鄂爾多斯式青銅器》一書的圖(該書圖一(1))已依斜面的角度和冠帶的關係擺出帽形可能的面貌。從圖看，這頂帽子有一個緩緩的金質尖頂，頂上站一隻驚鷹。從帽頂到冠帶的部分不可能太高。這樣貴重的帽子不可能是一般游牧民所戴，只可能屬於他們的領袖。發掘報告認為金冠主人可能是林胡或匈奴的王或酋長。如果此說可信，我們也就可以結論：林胡或匈奴王所戴的帽和孝堂山漢畫中所見「胡王」的前彎尖頂帽十分不同。漢代畫工偏好胡人戴著微微前彎的尖帽。這種帽子在迄今所謂的匈奴墓遺存中一無所見。

⑧ 梅原末治，同註⑦。

⑨ 參《鄂爾多斯式青銅器》(見註③)一書所附桃紅巴拉、水澗溝、呼魯斯太、毛慶溝、阿魯柴登、西溝畔、玉隆太、補洞溝墓葬發掘報告，頁204-402；秋山進午著，魏堅譯，〈內蒙古高原的匈奴墓葬〉，《內蒙古文物考古文集》(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1994)，2輯，頁375-392。

⑩ 〈內蒙古高原的匈奴墓葬〉，同上註，頁343。

這是我不能不否定漢畫中的胡人爲匈奴的一個原因。

其次，如鄭岩所指出，漢畫中的胡人，除了出現在胡漢交戰圖中的，也有任守門奴、騎或牽駱駝、馴或騎象的、表演百戲的、狩獵的、懷抱小孩或飛昇在天作神仙狀的。^⑮他們以不同的身份，出現在不同的場合，除了部分在服飾刻畫上較不明確，一般有著甚爲相近的裝束外貌。外貌上最易辨認的共同點即是他們頭上戴著帽尖微向前彎的尖頂帽。這些相關的畫象分佈在山東、江蘇、河南等地，我們很難斷言這些胡人都屬於某一特定的民族，只可能假定他們原本有相近或不同的民族服飾，但在漢代畫工、石工的刀筆之下，卻以幾乎相同格套化的外形出現。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勢必無法從畫像去指認畫中人物的族屬。

除了格套，漢畫常以榜題標明內容。榜題是我們理解漢畫內容較可靠的另一依據。不論傳世或出土的漢畫，以屬於各種外族入侵頻繁的東漢時代爲最多。匈奴之外，還有羌、烏桓、鮮卑等等。理論上，如果漢畫要真實刻畫這些不同的外族，不但可以在外形上加以表現，也可以以榜題標示他們是匈奴、羌或其他。可是迄今出土的畫象中不見匈奴、羌、烏桓或鮮卑這樣的榜題，^⑯反而只有較籠統的名稱「胡王」、「胡奴門」、「胡將軍」、「胡使弩」或「隸胡」^⑰。由此看來，除了少數例外，漢畫呈現的似乎只是當時一般人概念中典型化的「胡」。他們有共通外形上的特點（窄袖短衣長褲、深目高鼻、多鬚或再加上尖頂帽），這樣的外形特點並不能反映真實的匈奴、烏桓、羌或鮮卑。

^⑮ Zeng Yen, *op.cit.*, p. 52.

^⑯ 《隸續》卷18提到荊州刺史李剛石室殘畫像「…少前六騎，形狀結束，胡人也。其上亦刻數字，惟『烏桓』二字可認。漢長水校尉主烏桓騎，又有護烏桓校尉。此以烏桓爲導騎，必二校中李君嘗歷其一。」參《隸續》，同註^⑮，頁2上。惜未錄畫像，不知烏桓外貌如何。《隸續》卷6頁9，錄武梁祠堂畫像有「休屠像」。榜題與畫像俱全，今石已泐。據《漢書·金日磾傳》及《論衡·亂龍》，此休屠是指匈奴休屠王子金日磾。如果《隸續》所錄畫像尚屬準確，則畫像中的匈奴人金日磾已著右衽寬袍大袖之漢人服飾，與武梁祠中其餘人物無別。

^⑰ 1998年9月7日我在山東莒縣博物館見到一方莒縣東莞出土的「畫像碑」。畫像中有胡騎及清晰隸書榜題「隸胡」二字。關於此畫像，我將於〈文獻、榜題與畫像解釋——以一個失傳的「七女爲父報仇」漢畫故事爲例〉一文中介紹並討論。

七、結論

以上將傳統文獻、圖象和考古出土中有關非華夏之民，尤其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外貌形象作了一次初步的比對，企圖找出其表現的特點和異同。根據以上的比對，或許可以暫作以下的結論：

1. 孔子以「被髮左衽」描述戎狄，並非毫無根據，只是實際的情況應遠為複雜。戎狄以及後來的胡在裝束特徵上和北亞、中亞或西北亞受斯基泰文化影響的游牧民應有文化上的關係。「被髮」和「左衽」在受斯基泰文化影響的文化遺存中可以找到蹤影。但他們也椎髻、辮髮，甚至穿右衽之衣。這使我們不得不考慮孔子所說的「被髮左衽」應該只是戎狄在裝束上的部分特徵，並不表示當時的戎狄都是如此，或僅作如此裝扮。

2. 服飾不是孤立的文化現象。在民族文化接觸的過程裡，服飾的流播和相互影響，必然是和其它的文化因素牽連在一起。因此戎狄被髮左衽的服飾問題必須放在整個古代中國和歐亞草原民族文化互動的大框架中來看待。要解決服飾的淵源問題，必須和諸如中國古代北方式青銅器的斷代和淵源、草原帶出土文物與族屬辨認等問題一併考慮，才可能得到較妥善的答案。⁽⁸⁷⁾

3. 從春秋戰國到秦漢，中國儘管曾面對種種裝束和面貌都不相同的外族，但是大約從戰國開始，一種頭戴帽尖微向前彎尖頂帽，身穿窄袖短衣和長褲，高鼻深目的胡人變成中國圖象藝術中胡人外貌的典型。到了漢代，除了少數例外，大多數的畫工似乎並無意以他們具備的寫實技巧，描繪出匈奴、烏孫、越、羌、烏桓或鮮卑等的真實形貌，或展現這些民族在容貌服飾上可能有的差別。他們反而依循職業中的傳統，世代相傳，不斷翻版著一種可能自戰國時代即漸形成的籠統化、模式化了的印象中的胡人。漢畫胡人形象的格套化，使得胡人的真實面貌反而只能在少數較特殊的情況下被保留下來。

4. 這也使得漢代造型藝術傳統中的「胡人」形象，和由士人掌握的文獻傳統所呈現的有了一定的差距。文獻傳統較注意衣襟和髮式，偶爾提到衣服的質料，面容上僅提及某些胡人(如大宛以西民族)有高鼻深目，多鬚的特徵。漢

⁽⁸⁷⁾ 杜正勝在研究中國北方古代民族和歐亞草原動物文飾的關係後，也指出「在歐亞草原帶考古年代學未精確化之前，獸頭刀劍原鄉的爭議，恐怕還不會停止。」見杜氏，同註⁽⁶⁵⁾，頁327。

代造型藝術中呈現的胡人外貌雖說形形色色，不過除了體質上大眼高鼻、深目高鼻或多鬚的特徵，服飾上除了改穿漢服或裸體的，最主要的特色在於那頂文獻從來不提的尖頂帽。漢代文獻雖然繼續以「被髮」、「椎髻」、「左衽」形容非漢民族或胡人，可是漢畫似乎並不刻意以此為特徵去描繪他們。

5. 由此可以推知，在代代相傳的工藝傳統內，畫師工匠似乎較少受到儒家「被髮左衽」經典權威的限制。他們可以依循本身職業的傳統(例如世傳的圖譜、作坊師徒家傳的行規)和圖象呈現的需要(例如圖象上必須突顯胡、漢在外觀上的差異，也必須使這樣的差異定型化，令觀眾易於辨識)，去塑造「胡人」的形象。這樣的形象不一定於事實無據，也不一定完全貼合事實，卻符合漢代社會集體記憶中的胡人，令當時僱請他們的人能夠接受和滿意。我們今天所見到的漢代畫象背後牽涉到委造者、工匠、觀賞者彼此複雜的互動和流行的風氣。他們和掌控「文字傳統」，委託他們裝飾刻畫墓室或祠堂的士大夫關係如何？漢代以石、陶、銅器為代表的藝匠以及從事石刻、壁畫的畫工是否自有職業上的傳統？他們享有多少程度專業的自主性？這些問題很大而且複雜，值得文化史家和藝術史家從不同的角度切入分析。以上所說不過是一點極初步的觀察。^⑬

6. 更有趣的是，若以出土的游牧民族服飾實物與前述文字與圖像描述的特點對照，則可以看出中國的文字和圖象傳統之間雖各有所尚，但對異族文化顯露的態度，卻有相當一致印象化、簡約化、刻板化和頑強持續的特點。草原游牧民族的髮式和服飾都十分複雜，中國文獻和圖象傳統不約而同都只截取和強調不同的一部分，而置其它於不顧。某種刻板的記述或呈現方式一旦形成，即相沿成習，甚難改變。《史記》、《漢書》以降，傳統文獻描述域外民族的風俗文化都相當簡略，甚且抄襲。這是因為士人、工匠的慣性和惰性？或是古代中國人傲慢的文化優越感造成了不分階層，對異文化普遍地的冷感？這是值得深思和玩味的。

(後記：本文得以完成必須感謝顏娟英、謝振發、林聖智、黃沛榮辛苦代攝許多照片，前輩徐蘋芳、王炳華先生，好友杜正勝、鄧淑蘋、洪金富、陳光祖、陳健文、丁瑞茂、杜德蘭(Alain Thote)、畢華雪(Michèle Pirazzoli-t Serstevens)提供頗多寶貴的資料和意見，學棣施品曲、紀安諾(Enno Giele)、助理姬健梅代閱法、德文資料，林蕙敏、楊依萍小姐代摹拓本。唯論文中一切錯誤由作者自行負責。)

^⑬初步探討見邢義田，〈漢碑、漢畫和石工的關係〉，同註^③，頁44-59。



圖 3 之 1 「胡王」榜題照片 顏娟英攝 87 年 8 月 29 日



圖 3 之 2 「胡王」榜題摹本 邢義田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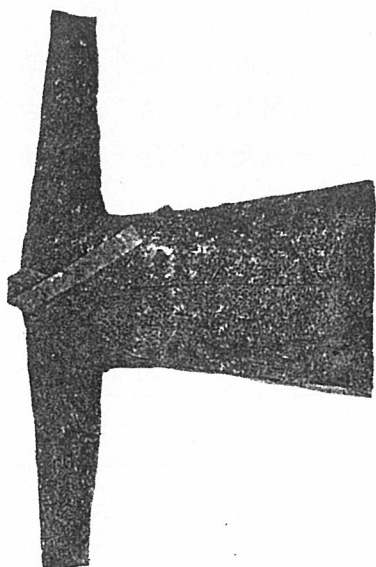


圖 1 《東北文化》圖 2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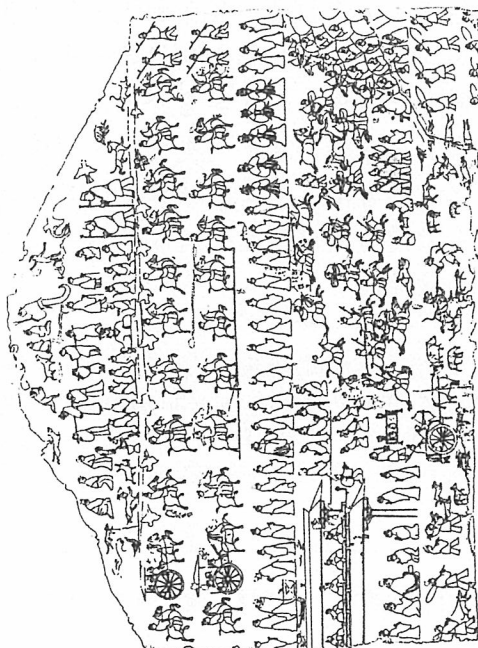


圖 2 孝堂山胡漢交戰圖摹本 邢義田摹



圖 4 《微山縣漢畫像石精選》圖 3



圖 5 《山東漢畫像石選集》圖 403、4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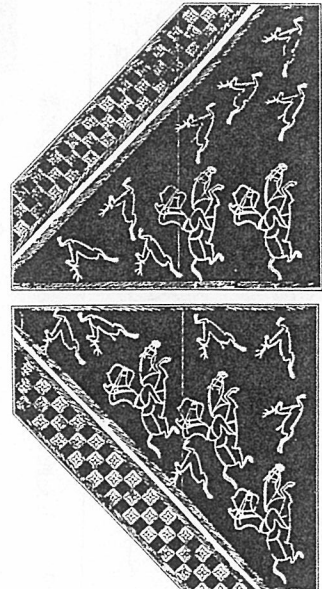


圖 6 *Tomb Tile Pictures of Ancient China, pls. 2, 3*



圖 7 《南陽漢代畫像碑》圖 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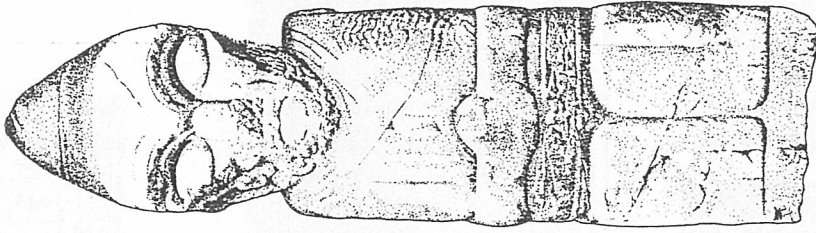


圖 8 山東石刻藝術館
(濟南)藏石摹本
楊依萍摹 邢義田修改



圖 9 山東臨沂白莊漢墓胡人像摹本 邢義田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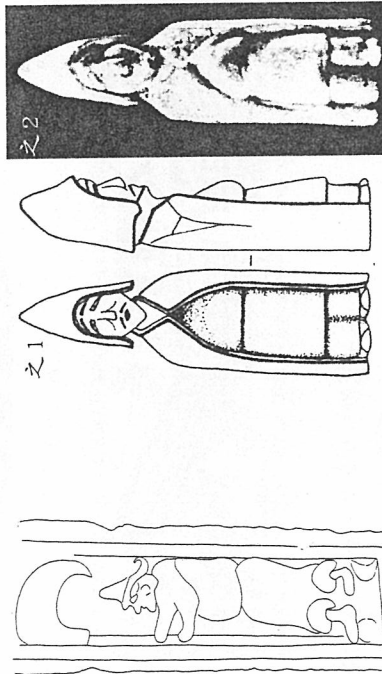


圖 10 山東泰安岱廟藏石 邢義田摹本
之 1 頁 150 圖 15 之 1 之 2 頁



圖 11 《沂南古畫像石墓發掘報告》圖版 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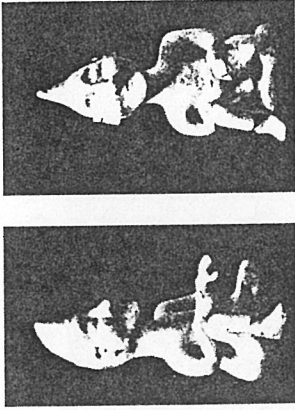


圖 12 《考古》1966 年 2 期 頁 66-81

圖 13 《內蒙古中南部漢代墓葬》
之 1 頁 150 圖 15 之 1 之 2 頁

圖 14 《陝西神木大保當漢彩繪畫像石》圖 21、22 局部合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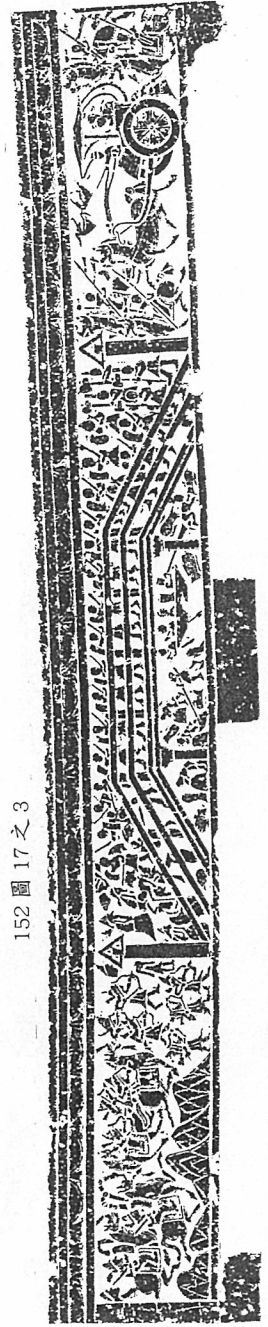


圖 15 152 圖 17 之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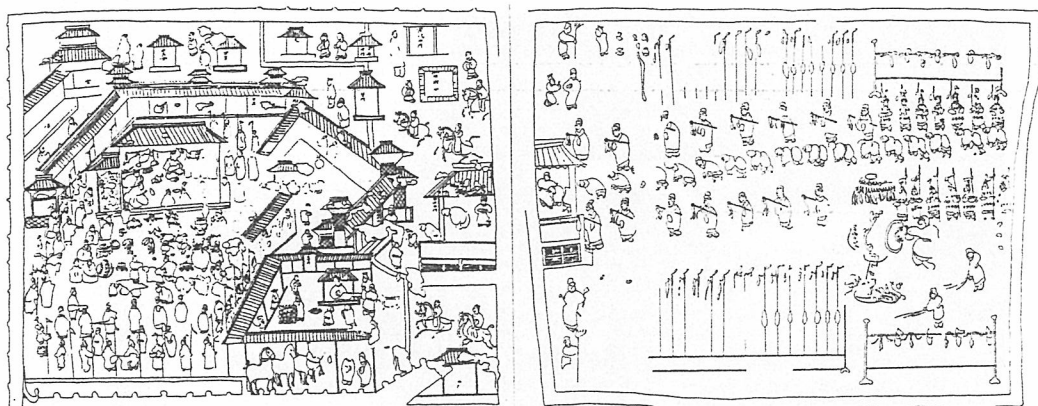


圖 16 《和林格爾漢墓壁畫》寧城圖重摹本 邢義田摹



圖 15 《漢代畫像石研究》
據頁 287 圖版重摹
邢義田摹



圖 17 邢義田藏拓片摹本 林蕙敏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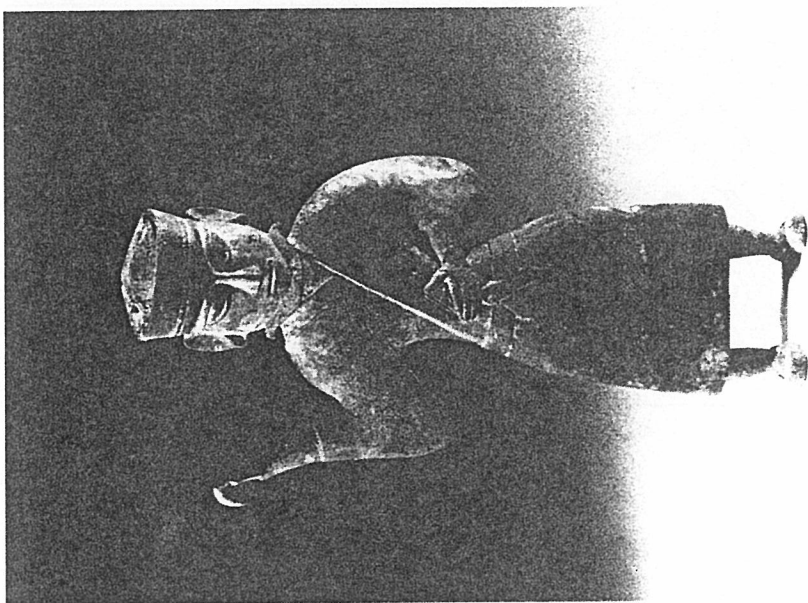


圖 19 《漢代文物大展》圖 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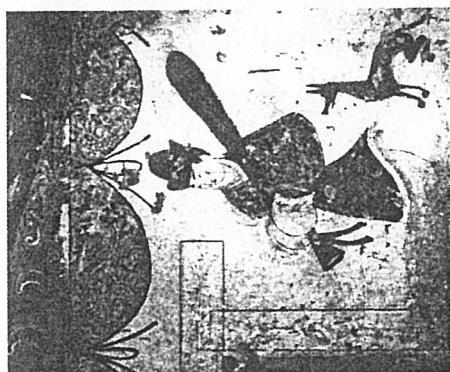


圖 18 之 1 《內蒙古中南部漢代墓葬》
彩色圖版參之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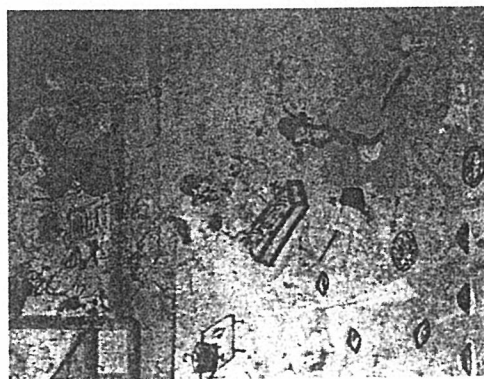


圖 18 之 2 《內蒙古中南部漢代墓葬》
頁 169 圖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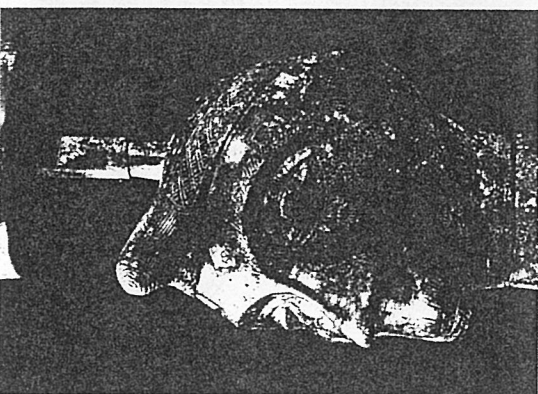


圖 20 《中國文物精華》圖 120
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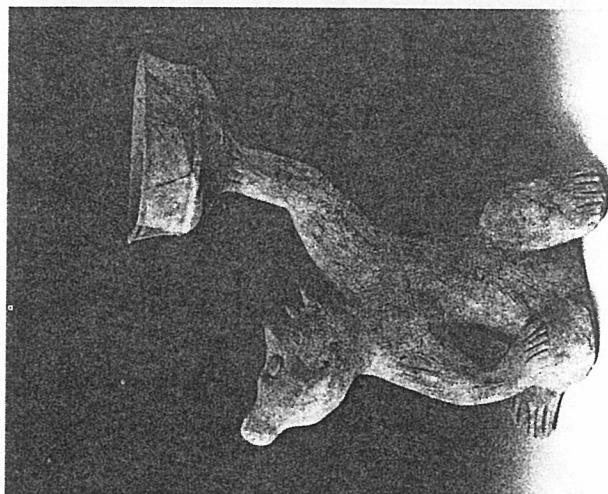


圖 21 《漢代文物大展》圖 86



圖 22 《周原與周文化》頁 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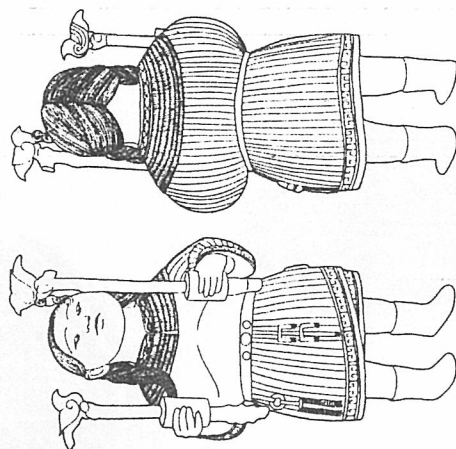


圖 23 《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圖 9



圖 24
《燕下都》彩版 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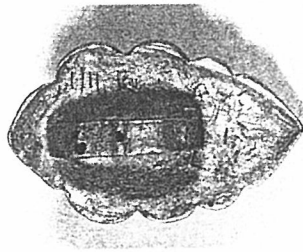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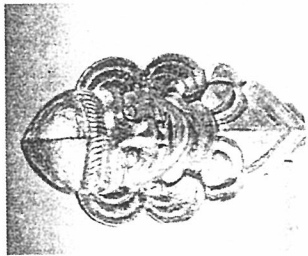


圖 25 《燕下都》彩版 32 之 1、2



圖 26 之 1 北京大學沙克樂博物館藏齊瓦當照片
黃沛榮攝 86 年 9 月 6 日



圖 26 之 2 北京大學沙克樂博物館藏齊瓦當
邢義田摹本



圖 26 之 3 《半瓦當の研究》頁 25、73 圖版 VII 之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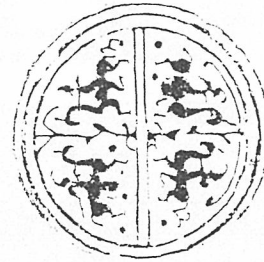


圖 26 之 4
《齊國瓦當藝術》圖 54



圖 26 之 5
《齊國瓦當藝術》圖 55



圖 27 之 1 陶範照片 《侯馬陶範藝術》
圖 12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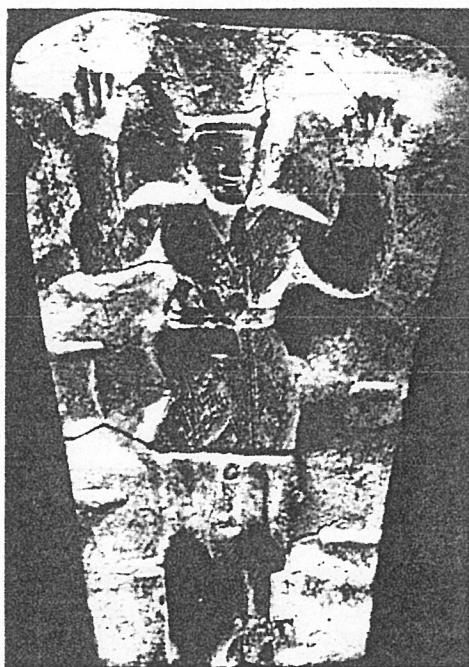


圖 27 之 2 陶範照片 《侯馬陶範藝術》圖 1287



圖 27 之 3 陶範照片 《侯馬陶範藝術》
圖 1289



圖 27 之 4 陶範照片 《侯馬陶範藝術》
圖 12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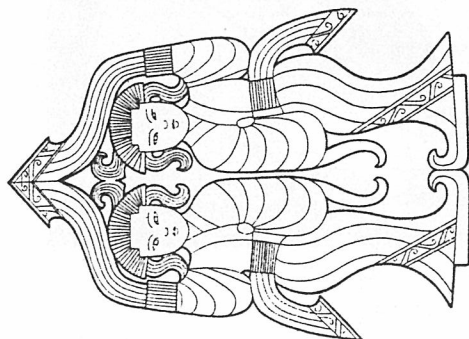


圖 28-1 沈從文摹本

《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圖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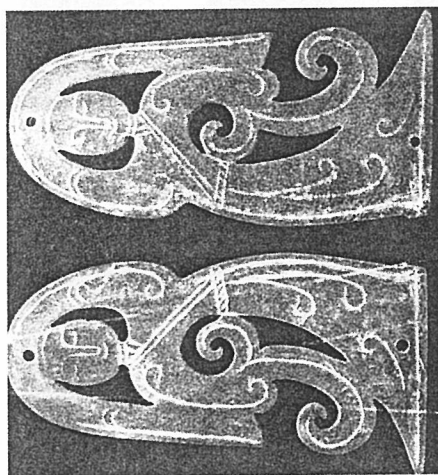


圖 28-3 《中國玉器全集》圖 2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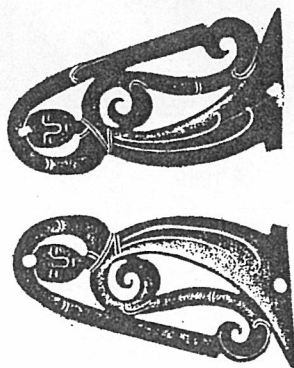


圖 28-2 《北京大葆台漢墓》圖 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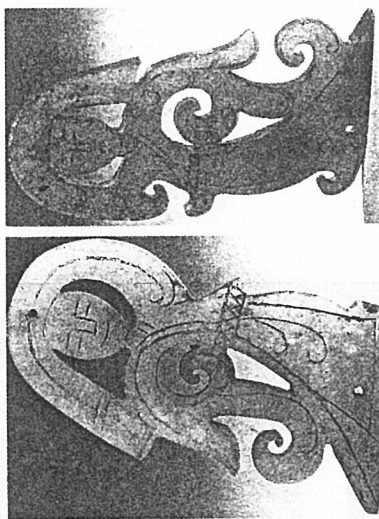


圖 28-4 《中國玉器全集》圖 185、1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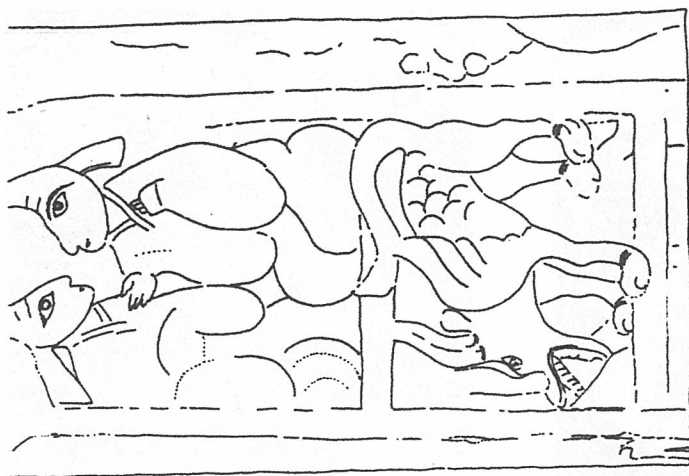


圖 29 山東臨沂 邢義田摹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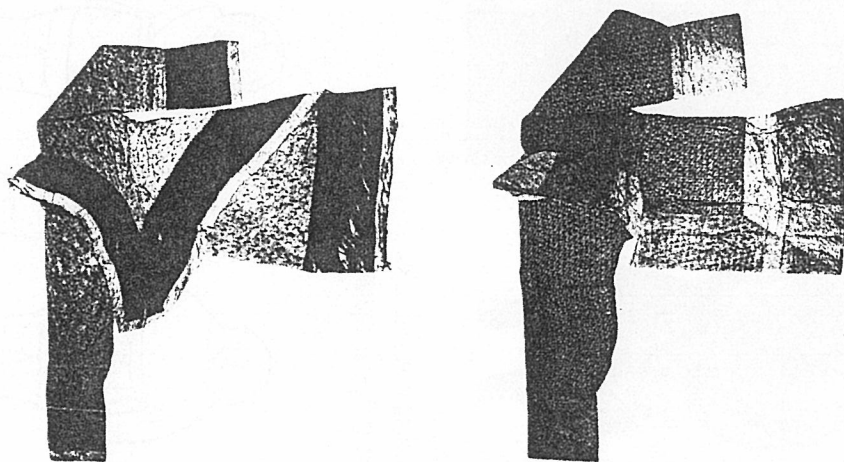


圖 30 《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圖 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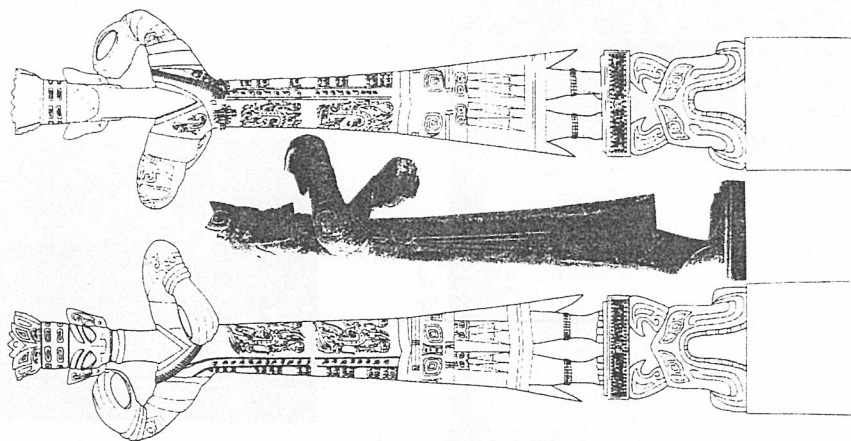


圖 31 《人間神國》頁 13、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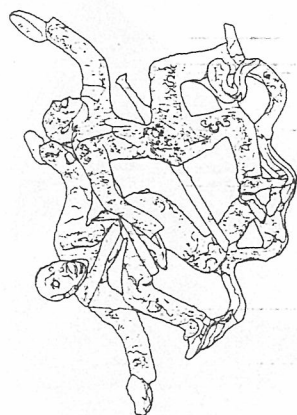


圖 32 《雲南晉寧石寨山古墓群發掘報告》

圖 68 之 1 林憲敏摹



圖 33

《戰國時代出土文物
の研究》頁 133 圖 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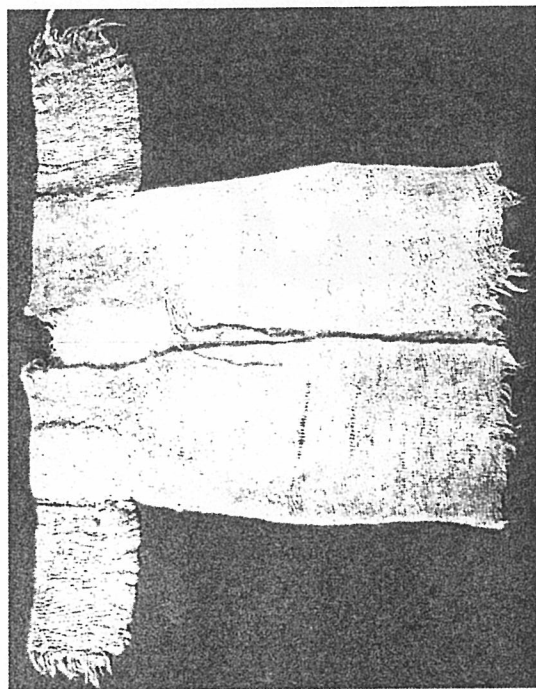


圖 35 《樓蘭王國と悠久の美女》圖版 2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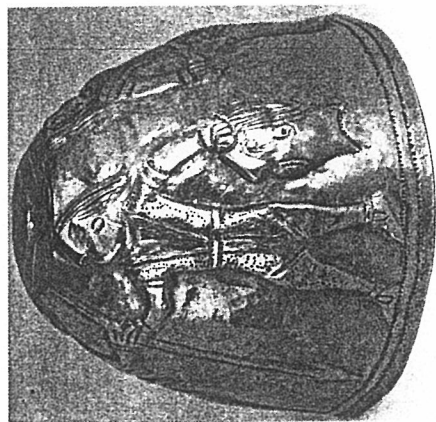


圖 37 之 1 *Les Scythes*, p. 432, pl. 3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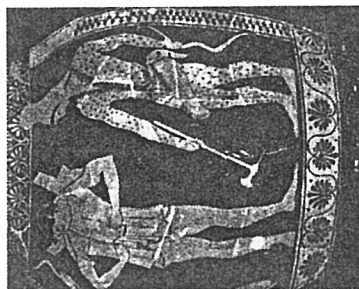


圖 36 *Les Scythes*, p. 393, pl. 3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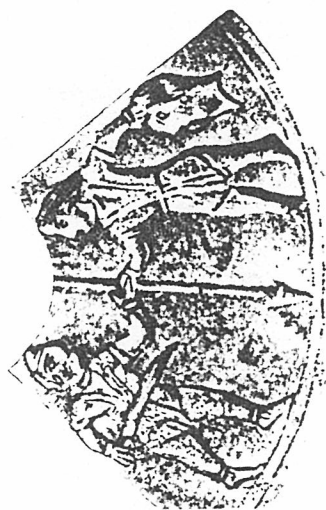


圖 37 之 2 展開圖 *The Royal Hordes: Nomad
Peoples of the Steppes*, p. 1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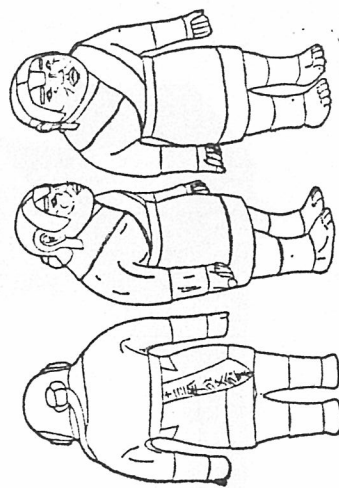


圖 34 《考古》1987 年 6 期頁 5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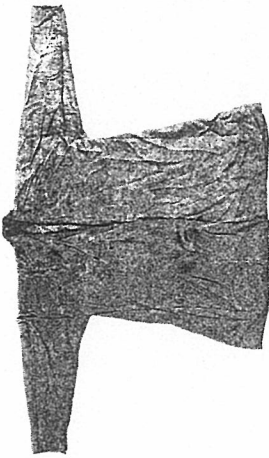


圖 38 《絲路考古珍品》圖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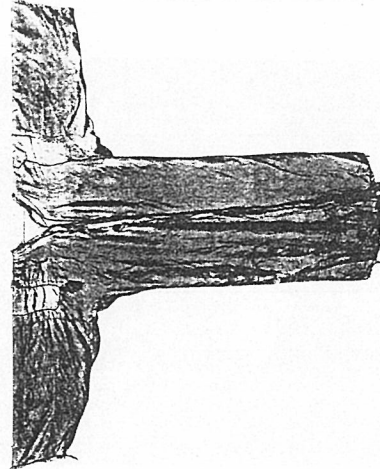


圖 39 《蒙古ノイン・ウラ發見の遺物》
頁 55 及圖版 53、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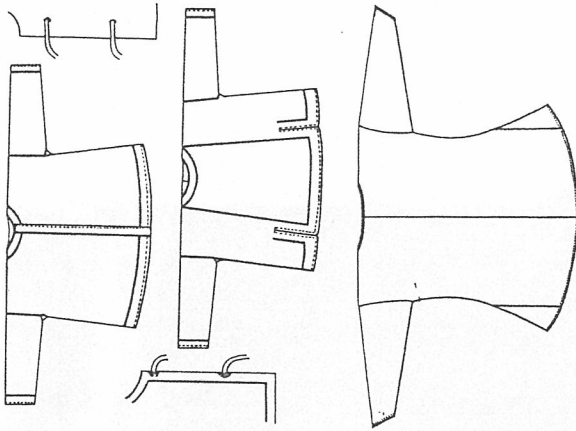


圖 40 *Frozen Tombs of Siberia*, pp. 83-86,
pl. 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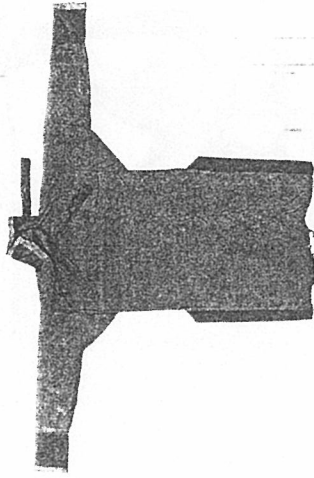


圖 41 《絲路考古珍品》頁 136 圖 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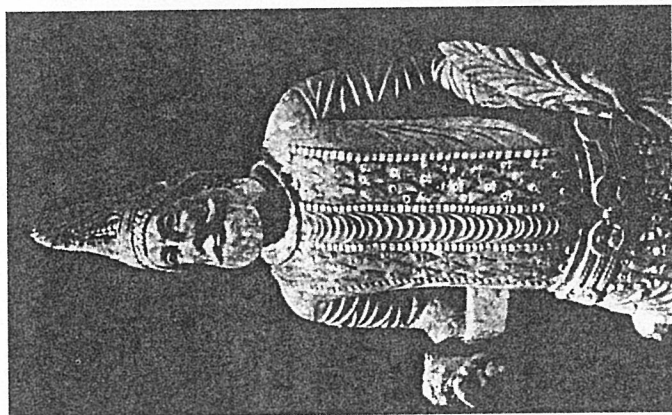


圖 42 之 1 *The Dynastic Arts of the Kushans*, pl. 22, Mathura 出土



圖 42 之 2 *The Dynastic Arts of the Kushans*, pl. 136, Hatra 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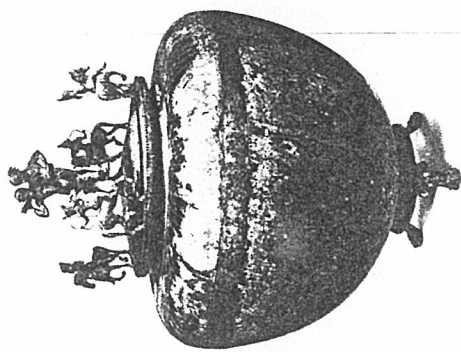


圖 43 之 1 *Etruscan Bronze Utensils* 圖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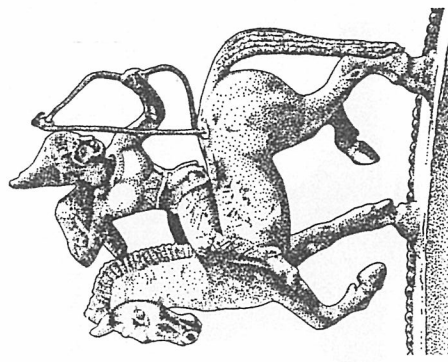


圖 43 之 2 *Etruscan Bronze Utensils* 封面
邢義田摹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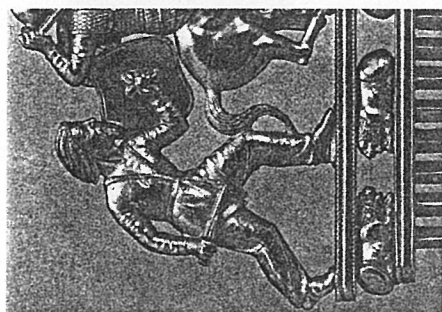


圖 44 之 1 *Les Scythes*, pp. 135-136, pl. 102



圖 45 之 1 *Les Scythes*, p. 192, pl. 142

圖 45 之 2 *Scythians and Greeks*, p. 197, fig. 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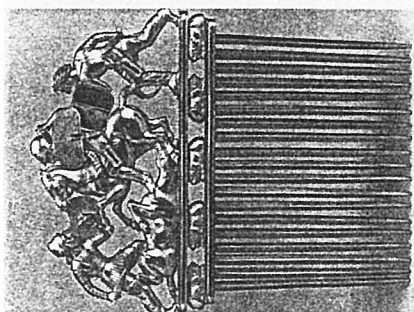


圖 44 之 2 *Les Scythes*, p. 144, pl. 3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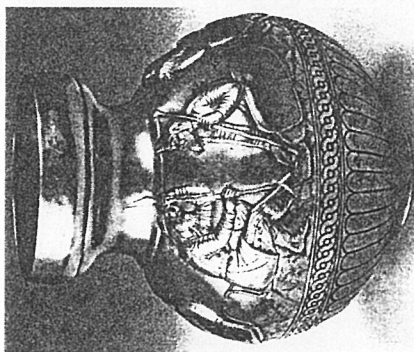


圖 47 之 1 *Les Scythes*, pp. 171-175, pls. 124-126



圖 46 *Les Scythes*, p. 120, pl. 163



圖 47 之 2 *Les Scythes*, pp. 171-175, pls. 124-126 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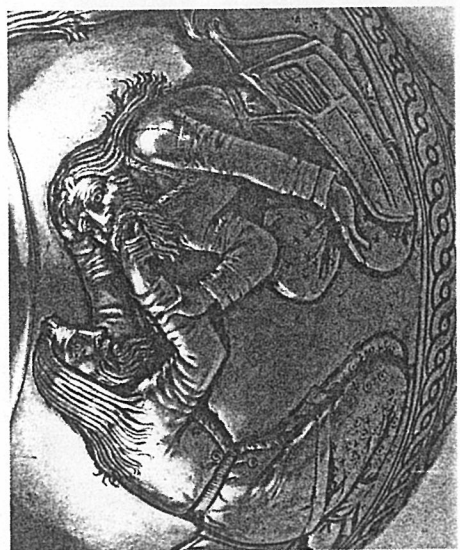


圖 47 之 3 *Les Scythes*, pp. 171-175, pls. 124-126 局部



圖 48 之 3 *Les Scythes*, pp. 390-391, pl. 312 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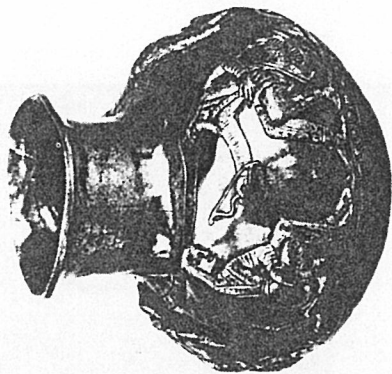


圖 48 之 1 *Les Scythes*, pp. 390-391, pl. 3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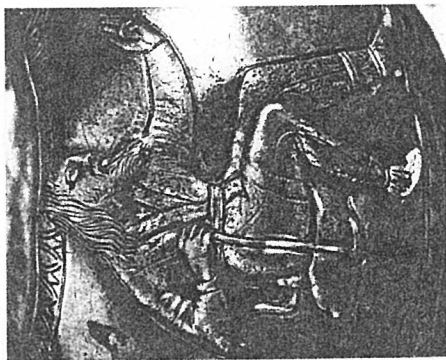


圖 48 之 2 *Les Scythes*, pp. 390-391, pl. 312 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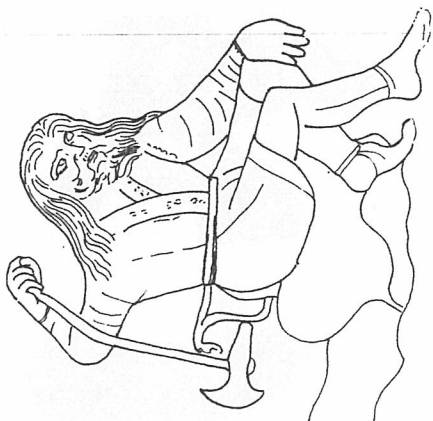


圖 48 之 4 *Les Scythes*, pp. 390-391, pl. 312 耶式田摹本



圖 49 R. Rolle 摹本
The World of the Scythian, p. 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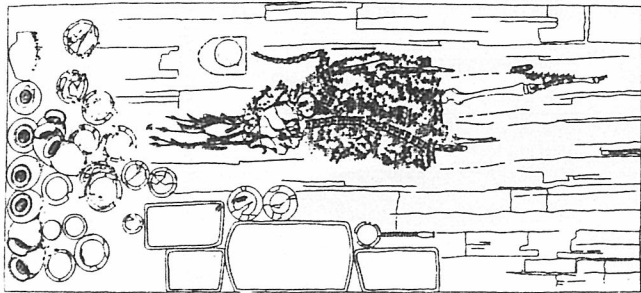


圖 50 之 1 *The World of the Scythians*,
p. 48

圖 50 之 2 《シルクロードの
遺寶—古代・中世
の東西文化交流》
圖版 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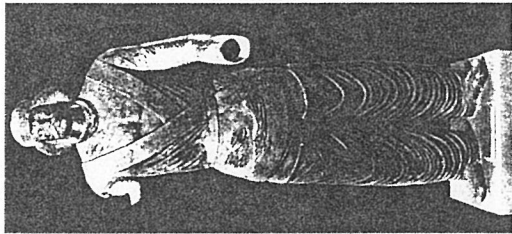


圖 51 *The Dynastic Arts of the Kushans*, pl. 1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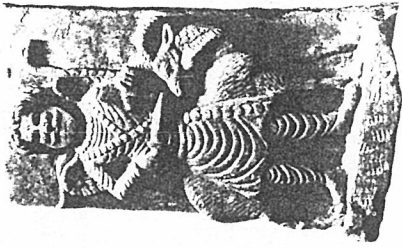


圖 52 *The Dynastic Arts of the Kushans*, pl. 1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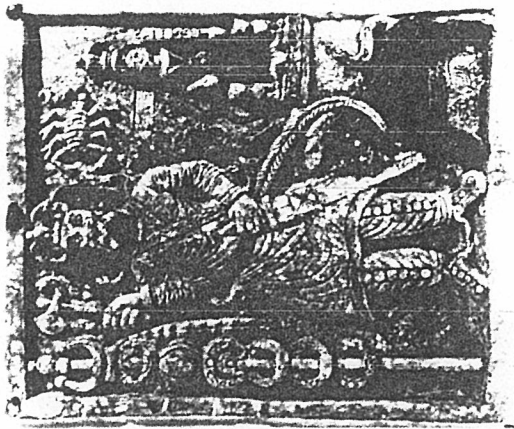


圖 53 *The Dynastic Arts of the Kushans*,
pl. 1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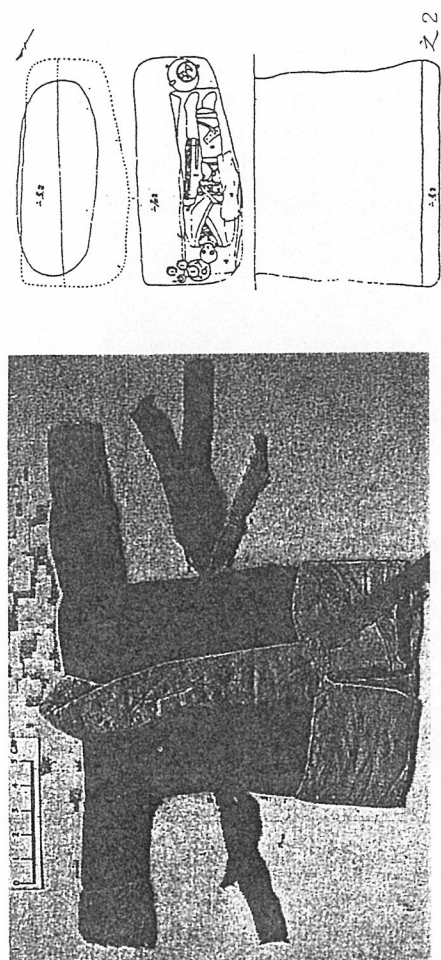


圖 55 《中國西域民族服飾研究》頁 78 圖 1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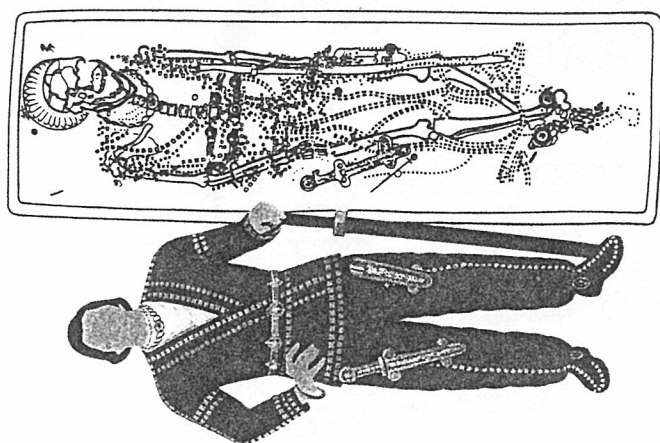


圖 54 *National Geographic*, vol. 177 (1990), p. 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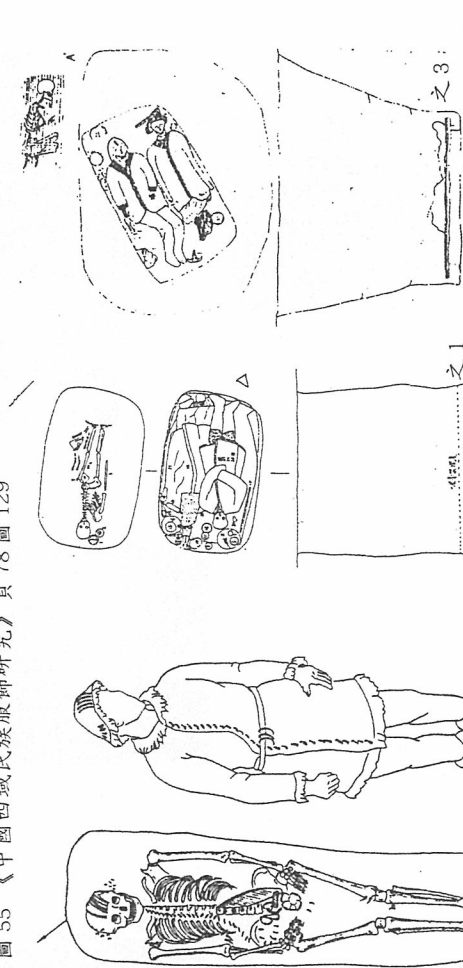


圖 57

- 之 1 《新疆文物》 1993 年 4 期 頁 2
- 之 2 《新疆文物》 1993 年 4 期 頁 3
- 之 3 《新疆文物》 1994 年 2 期 頁 4

圖 56 *Arctic Anthropology*, vol. 25, no. 2 (1988), p. 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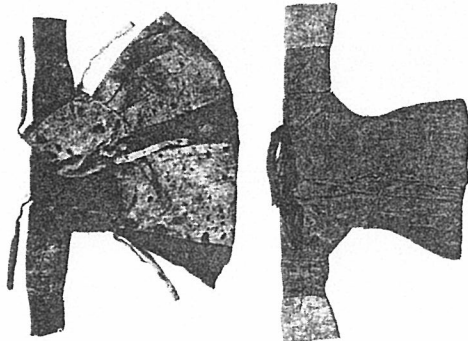


圖 58 《文物》1999 年 1 期
封底裡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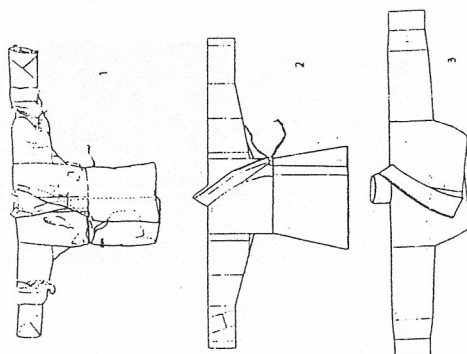


圖 60 《新疆文物》1999 年 2 期圖 13



圖 59 之 1 王炳華先生提供照片
1999 年 7 月 11 日 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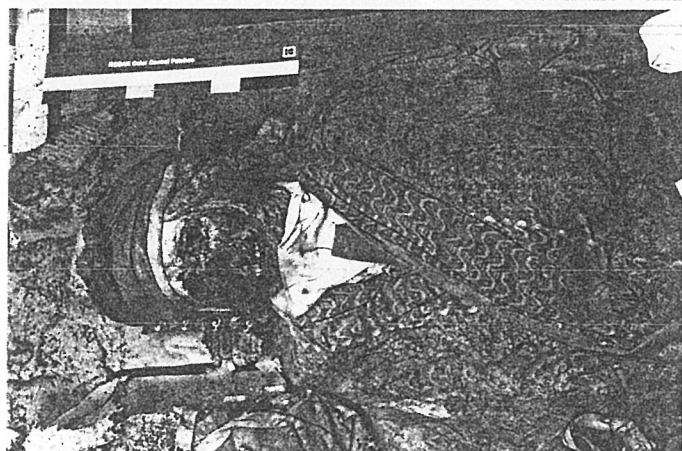


圖 59 之 2 王炳華先生提供照片
1999 年 7 月 11 日 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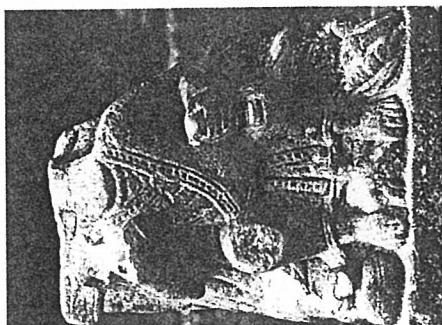


圖 61 *The Dynastic Arts of the Kushans*, pl. 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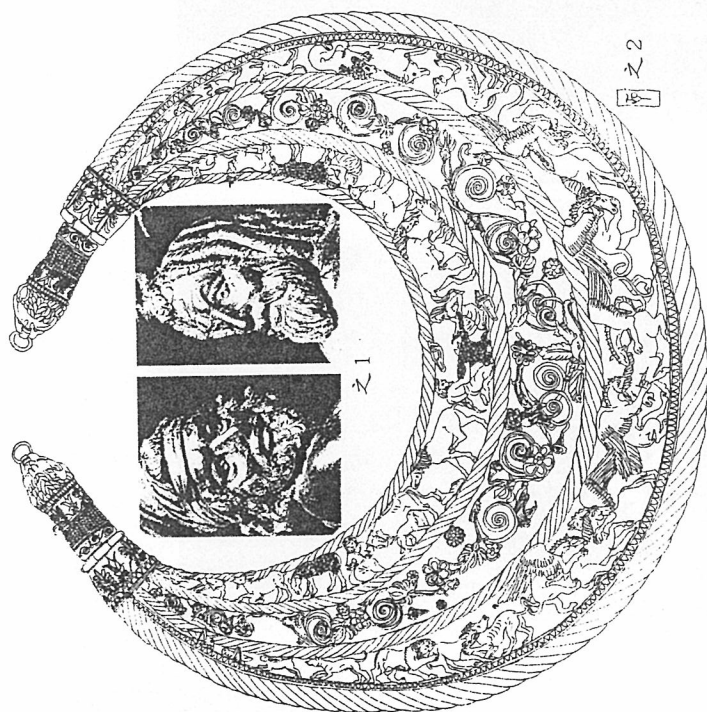


圖 62 之 1 *The World of the Scythians*, p. 55

之 2 *The Art of the Scythians*, fig.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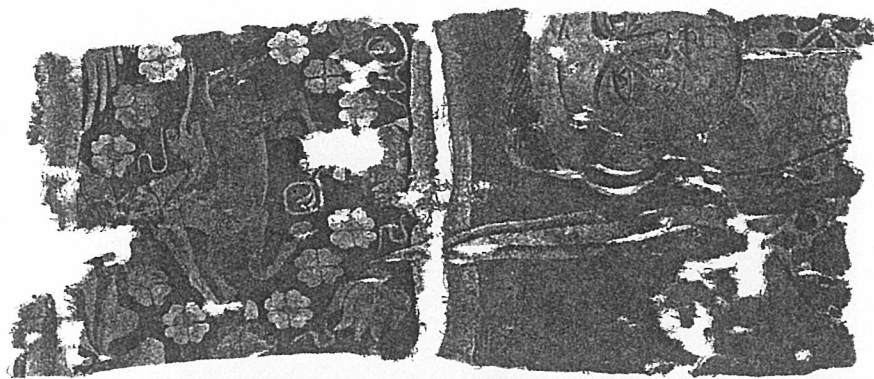


圖 63 《絲路考古珍品》頁 153 圖 65



圖 64 《蒙古ノイン・ウラ發見の遺物》圖版第二
邢義田摹本



圖 65 *Le Centre de L'Asie, la Russie, la Chine et le Style Animal*, pl. X,
楊依萍摹本



圖 66 *Les Scythes*, p. 180, pl. 1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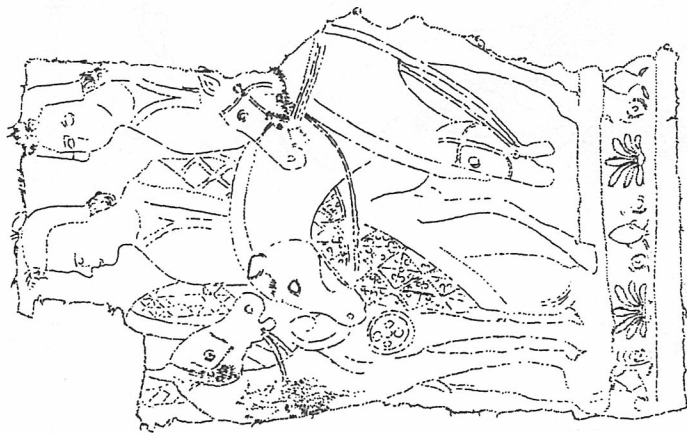


圖 67 《蒙古ノイン・ウラ發見の遺物》
圖版第二 邢義田摹本



之 2

圖 68 之 1 *Les Scythies*, p. 367, pl. 274 之 2 *Scythians and Greeks*, p. 59, fig.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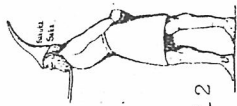


圖 69 《絲路考古珍品》頁 89 圖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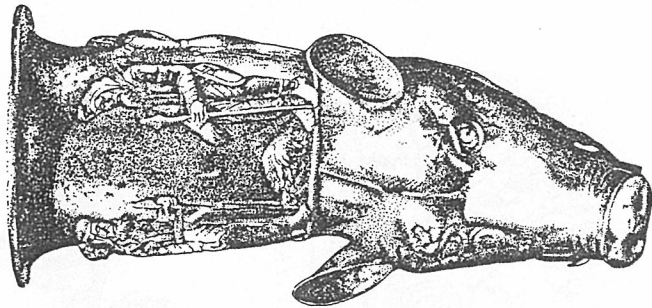


圖 71 法國羅浮宮藏

Michèle Pirazzoli T'serstevens 教授
提供照片影本 邢義田摹



圖 70 大英博物館藏 藏品編號 GR1856.
12.26 796 邢義田摹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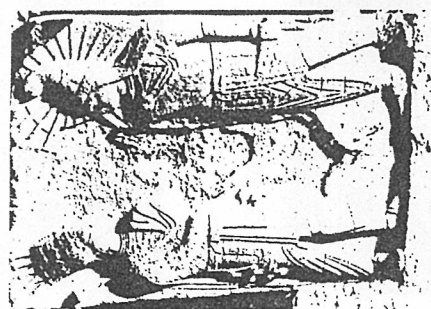


圖 73 之 1

The Dynastic Arts of the Kushans, pl. 1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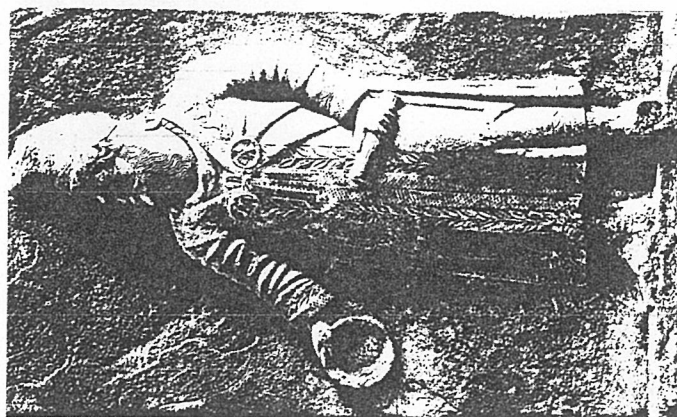


圖 73 之 2

The Dynastic Arts of the Kushans, pl. 1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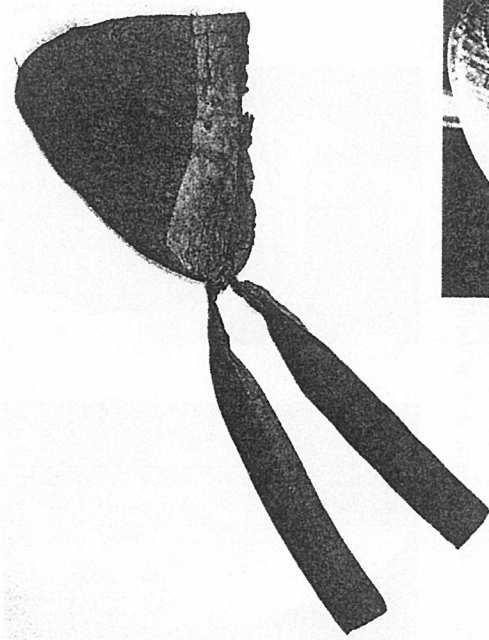


圖 72 《絲路考古珍品》頁 114
圖 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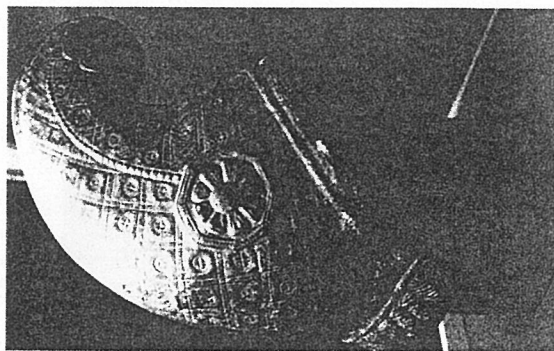


圖 74 波士頓美術館藏
Alain Thote 教授提供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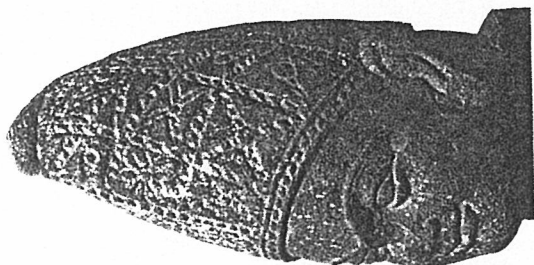


圖 75 *The Dynastic Arts of the Kushans*, pl. 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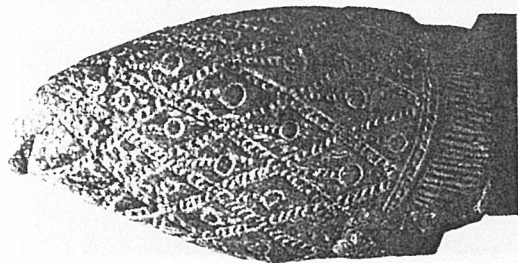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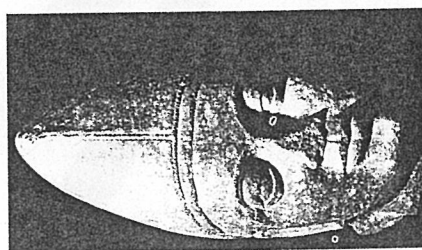


圖 76 之 1

The Dynastic Arts of the Kushans, pl. 14



The Dynastic Arts of the Kushans, pl. 19



圖 76 之 3 *The Dynastic Arts of the Kushans*, pl. 73

圖 76 之 4 *The Dynastic Arts of the Kushans*, pl.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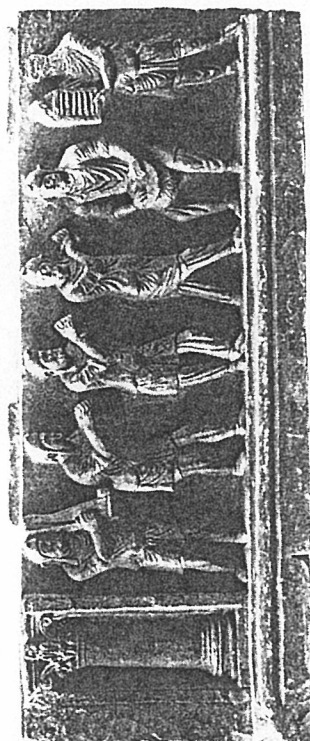


圖 77 *The Dynastic Arts of the Kushans*, pl. 58



圖 78 之 1 *Sarcophages en pierre d'époques romaine et paléochrétienne*, pl.



圖 79 之 1、2、3、4 Kushan Sculpture: Images from Early India, p. 137



圖 79 之 5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 p. 262, fig. 4



圖 78 之 2 Sarcophages en pierre d'époques romaine et paléochrétienne, pl. 14 局部 邢義田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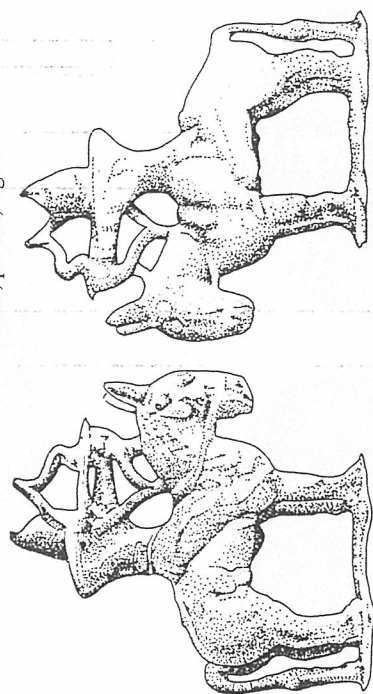


圖 80 《ユウラシア古代北方文化》圖版四 邢義田摹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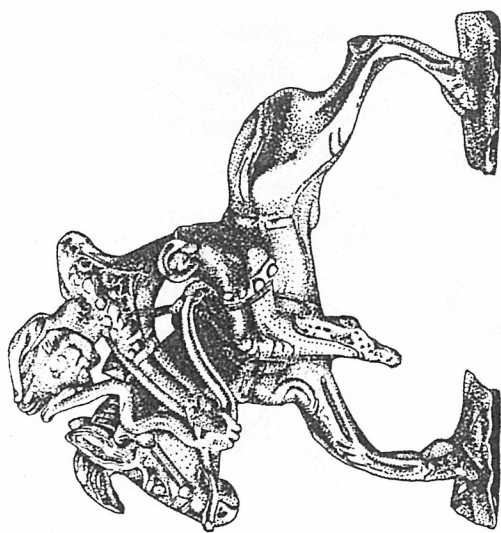


圖 81 *Les Scythes*, p.246, pl. 180, 邢義田摹本



圖 82 *Trajan's Column and the Dacian Wars*,
p. 40 邢義田摹本



圖 83 *The Dynastic Arts of the Kushans*, pl. XV, no. 281



圖 84 《鄂爾多斯式青銅器》頁 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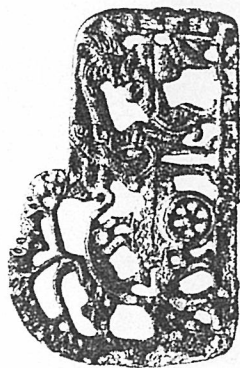


圖 85-之 1 *Sino-Siberian Art in the Collection of C. T. Loo, pl. XX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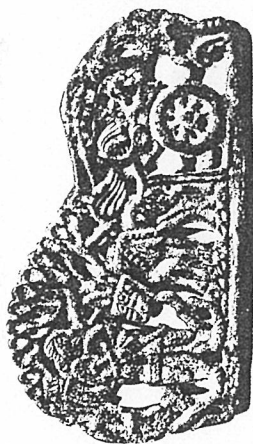


圖 85-之 4 *Sino-Siberian Art in the Collection of C. T. Loo, pl. XXI*



圖 85-之 2 《東北文化》圖 1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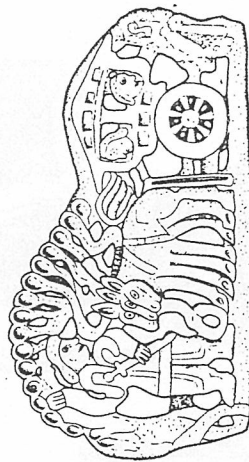


圖 85-之 5 《鄂爾多斯式青銅器》頁 96



圖 85-之 3 《鄂爾多斯式青銅器》頁 96



圖 85-之 6 *Ancient Chinese and Ordos Bronzes, pl. 228*



圖 86-之 4 《鄂爾多斯式青銅器》頁 83



圖 86-之 5 *Ancient Chinese and Ordos Bronzes, pl. 2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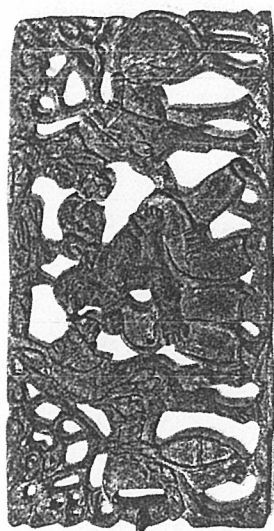


圖 86-之 1 *Art of the Steppes, pl. 52*



圖 86-之 2 《鄂爾多斯式青銅器》頁 83



圖 86-之 3 *Sino-Siberian Art in the Collection of C. T. Loo, pl. XXI*



圖 87 《草原文化》圖 321-3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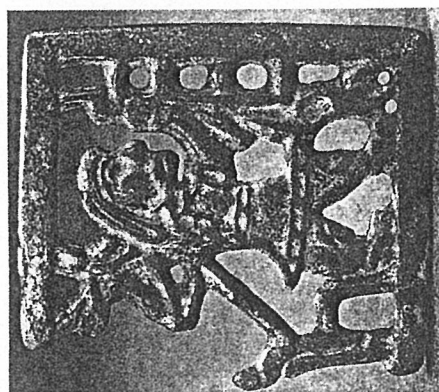


圖 88 《東北文化》圖 1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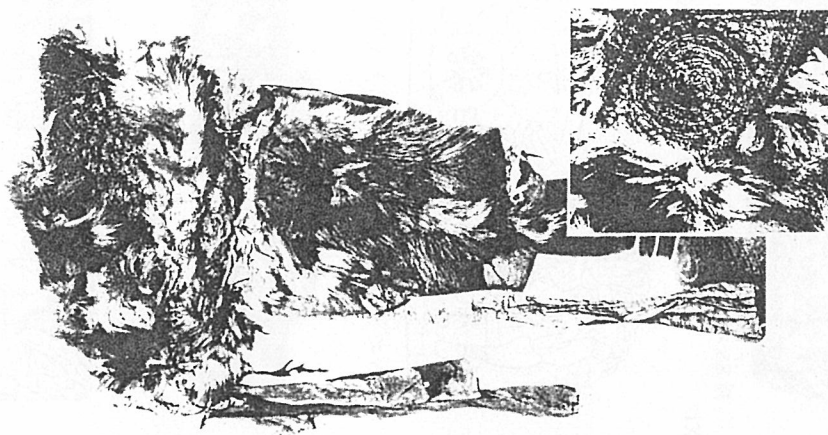


圖 89 之 1 《蒙古ノイン・ウラ發見の遺物》

圖版 LI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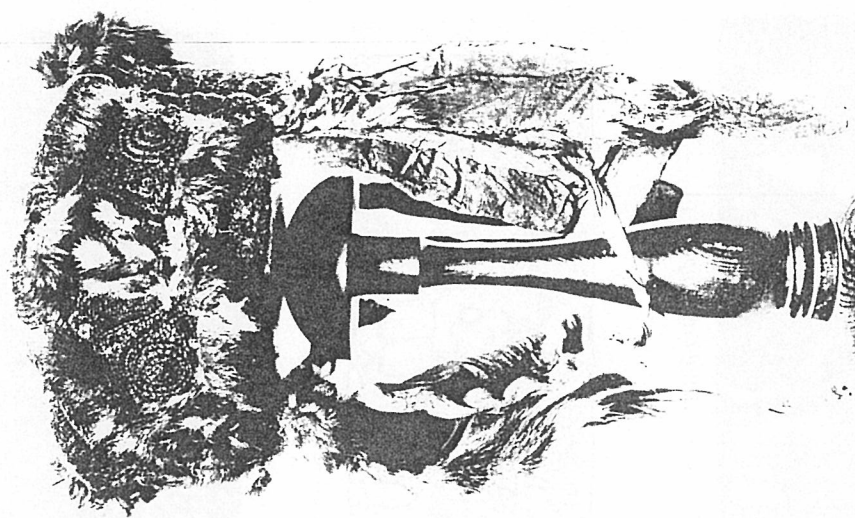


圖 89 之 2 《蒙古ノイン・ウラ發見の遺物》

圖版 L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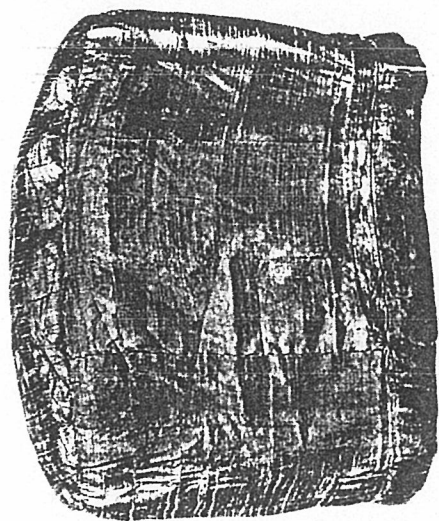


圖 91 《蒙古ノイン・ウラ發見の遺物》圖版 XLIX



圖 92 《鄂爾多斯式青銅器》圖版一(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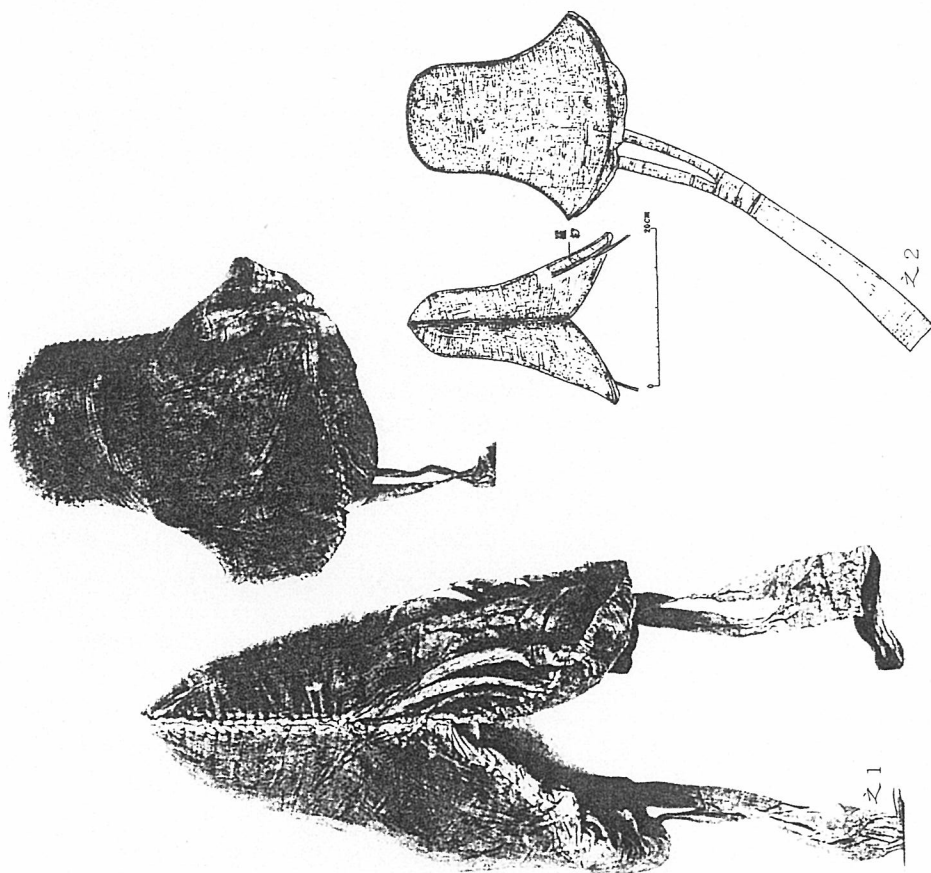


圖 90 之1 《蒙古ノイン・ウラ發見の遺物》圖版 L

之2 《蒙古ノイン・ウラ發見の遺物》頁 51

The Appearance of Northern "Barbarians" as Seen in Ancient Chinese and Non-Chinese Literary, Archaeological and Pictorial Sources

Hsing I-tien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The paper begins to compare descriptions of non-Chinese peoples, especially those of the northern nomadic tribes, in traditional literary sources and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for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Confucius's description of the *Jung* and *Ti*---"loose hair, folding left collar"---had some basis in fact, but the actual situation was far more complex. The appeal of the *Jung*, *Ti* and *Hu* had much to do with the nomadic tribal cultures of Central and Northwest Asia which were influenced by Scythian culture.
2. A kind of pointed cap, tight-sleeved short blouse, long trouser, "high nose, deep-set eye" barbarian became the pictorial archetype of barbarians from the Spring Autumn / Warring States to the Ch'in / Han periods although the "barbarians" had a myriad of different dress and appearance. This archetype also caused the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barbarian" pictorial image in Han art and literary descriptions by the educated elite of the time.
3. Moreover, contrast of the aforementioned literary and pictorial descriptions with actual archaeological artifacts show that both descriptions were impressionistic, simplified, fixed, and incorrigibly unchanging.

Keywords: appearance of northern barbarians, Scythian art, pointed cap,
hair dress style, folding left collar